



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

馬長壽 著

中華書局

## 目 錄

- 一 序言 ..... 1
  - 二 前秦《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所  
記的關中部族 .....12
  - 三 北朝前期的李潤羌和北魏造像題名的四種  
方式 .....39
  - 四 北朝後期鮮卑雜胡入關後的聚居和散居.....52
  - 五 渭河以北各州縣的羌民和他們的漢化過程 ...69
- 附錄一 關中北魏北周隋初未著錄的羌村十種造像
- 碑銘.....89
  - (一)《夫蒙文慶造像銘》北魏神龜二年.....89
  - (二)《雷漢王等造像記》(殘)北魏永安二年 .....90
  - (三)《雷樹等五十人造像銘》北魏無年月 .....90
  - (四)《邑主僕蒙□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記》  
北魏永熙二年 .....91
  - (五)《雷文伯造像銘》北周保定元年 .....92
  - (六)《邑主同瑀龍歡合邑子一百人等造像記》  
北周保定二年 .....93
  - (七)《雷明香爲亡夫同瑀乾熾造像記》北周天和六年 .....94
  - (八)《郭羌四面造像銘》北周無年月.....95

- (九)《邑主雷惠祖合邑子弥姐顯明等造像記》隋開皇二年 …96
- (十)《邑主弥姐後德合邑子卅人等造像記》隋開皇六年 ……97
- 附唐乾封元年《葛荀子等廿五人改造佛像題名》……98
- 附錄二 關於關中羌村羌姓的札記 ……………100
- 校後補記 ……………110

## 一 序 言

古代史志敘述關中部族者，以《史記·匈奴傳》、《後漢書·西羌傳》爲最早，其次是《晉書·北狄傳》和《江統傳》內的《徙戎論》。此外，在各史的四裔傳、列傳、地理志及若干類書、叢書內也可找到一些資料。但上述諸文獻都很散漫，求其能分區敘述、系統闡明關中古部族的專著是少見的。1963年寒假時，嘗以翻閱關中金石志爲事，每有所得，輒抄入日記簿上。所得略多，遂立意寫一論文，從碑銘推測關中部族的分佈和關係。然此意屢起屢仆。以爲自歐陽修以來，企圖以碑銘證史補史者何止數百十家，他們的地位條件雖較優越，所做工作則大抵費力多而成功少。而我於金石素無根基，又無力搜羅關中各縣的碑碣和造像題名，若效顰古人，豈不貽笑大方？因此，有一段時間頗爲銷沈。春節前偶到省博物館開會，武館長伯綸謂從渭南縣渭河北岸白居易故鄉運來北周武成二年造像題名一幢，題名中有白氏，未知與白居易有無關係。嗣後送來拓片四幅，其中羅列北鎮鮮卑雜胡姓氏數十種，殊形瑰異，得未曾有，讀後精神爲之一振。五月間往省圖書館碑帖檔案室參觀，借出舊藏關中羌村造像題名二十多種，十之八九皆爲前人所未著錄。在解放前，陝西省的碑碣造像一度歸圖書館管理，從各縣搜拓而來的碑銘拓本亦羅置其中。後來省博物館成立，碑碣造像皆移交博物館陳列，碑銘拓本則分別度藏於二館之內，造像題名一項在圖書館內所度藏者更多。碑銘之物，古人以去古未遠，應較今人所見既多且確。但上述二館所藏的碑銘，不特爲從前的外省人所不知，卽渭南

武樹善在修《陝西金石志》時(公元1935年)亦未曾寓目。我於不經意中得之,不禁狂喜移日,以為自解放以來,一切文物都隨從革命事業而獲得解放,今人所見又何曾多遜於古人呢;因不揣淺陋,草成《前秦至隋初關中部族的分佈和關係》一文,希望從題名的姓氏、官爵、里居和親屬關係,略以闡明關中古部族的名類淵源、地域分佈、姓氏變遷、婚姻關係、階級分化、部族融合以及其它關於北朝官制和地理沿革等問題。因為作者的水平限制,碑銘中有些問題或者看不出來,或者闡述錯了,都在所難免,希望專家同志們不吝賜教,給以糾正。同時,更希望各省市縣的文物機構,注意收集碑銘資料,供給學術界的同志們,使他們利用這些資料,對各地方史和民族史作出新的貢獻。

這篇論文所根據的主要碑銘為下列的二十五種:

一、前秦建元三年(公元367年)《鄧太尉祠碑》

碑今在蒲城縣城東北七十里之東河川,即洛水的西岸。碑原在蔡鄧鎮東南二十里之鄧公(鄧艾)祠內。祠側有鄧公墓,係衣冠塚。1927年宋哲元擬運此碑至西安,先移往東河川,後因事未果,遂擱置於此。碑文在陸耀遙的《金石續編》卷1、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卷10、毛鳳枝的《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9都有著錄。

二、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廣武將軍□產碑》亦名《立界山石祠碑》

碑在白水縣城東北三十里之縱目鎮。碑文載入王昶的《金石萃編》卷25,但缺少碑額題字和兩側題名。

三、北魏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

碑原在澄城縣城北寺村附近,1918年移置城內南門街初級中學內。碑文在武樹善的《陝西金石志》卷6、毛鳳枝的《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1都有著錄。

## 四、北魏神龜二年(公元 519 年)《夫蒙文慶造像銘》

碑在耀州。前人皆未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 五、北魏永安二年(公元 529 年)《雷漢王等造像記》

碑在耀州。前人皆未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 六、北魏永熙二年(公元 533 年)《邑主僕蒙□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記》

碑在今銅川市黃堡鎮。前人皆未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 七、北魏《雷樹等五十人造像銘》

碑在耀州。碑文無年月日,按像主之官銜和碑文字體,當爲北魏時的造像題銘。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 八、北魏《邑子羅暉造像題名》(殘)

碑在藍田縣。碑文無年月日,字體屬北魏。碑文在《關中金石文字新編》卷 1 中著錄。

## 九、西魏《焦延昌造像碑》

碑疑在富平縣。碑文無年月日,據王昶考釋當在西魏,載入《金石萃編》卷 32。

## 一〇、西魏大統十年(公元 544 年)《邑子廿七人造像記》亦名《僧晉等合邑子廿七人造定光佛寺記》

碑原在舊咸寧縣南關(在今西安市東城)社祭台村石佛寺(唐代名青龍寺)內。碑文載入《金石續編》卷 2 及《咸寧縣志》。

## 一一、北周武成二年(公元 560 年)二月《王妙暉等造像記》亦名《王妙暉等五十人造像銘》

碑在咸陽縣渭河南岸。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 36。

## 一二、北周武成二年(公元 560 年)九月同州延壽郡下邽縣

## 《合方邑子百數十人造像記》

碑原在渭南縣渭河北岸信義鎮西二里之泰莊村，今已移藏陝西省博物館。此碑未見著錄，拓本今存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

## 一三、北周保定元年(公元 561 年)《雷文伯造像銘》

碑在耀州。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 一四、北周保定二年(公元 562 年)《邑主同瑀龍歡合邑子一百人造像記》

碑在耀州。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 一五、北周保定四年(公元 564 年)《聖母寺四面造像碑(銘)》

碑在蒲城縣。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 36。

## 一六、北周保定四年(公元 564 年)《同瑀氏造像記》

孫星衍等《寰宇訪碑錄》謂在長安，不確。按其姓氏當在銅川縣或渭北的其它縣內。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 36。

## 一七、北周天和元年(公元 566 年)《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記》，亦名《邑子一百二十八人造像記》。

碑在蒲城縣北的堯山鄉。碑文在《八瓊室金石補正》卷 32，《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 1 都曾著錄。

## 一八、北周天和五年(公元 570 年)《宇文達造像記》

碑在咸寧縣，今西安市東郊。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 37。

## 一九、北周天和六年(公元 571 年)《雷明香爲亡夫同瑀乾熾造像記》

碑所在地不明。從題名中的建忠郡大學生雷鴻遠和宜州大學生雷海傍言之，當在渭北三原縣或耀州一帶。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 二〇、北周建德元年(公元 572 年)《邑子龔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記》

碑當在銅川、白水二縣間，詳細地點難考。碑文載入《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1。

### 二一、北周《郭羗造像記》(殘)

碑在耀州。按郭羗的官秩爲宜州從事，宜州的州治在華原縣，卽今之耀州，爲西魏廢帝三年(公元554年)所置，此碑當屬北周。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 二二、北周《荔非明達四面造像題名》

碑所在地不詳，或云在華州。造像亦無年月，唯題名中有“越公府行參軍”，越公府卽越國公府，乃北周封爵，此碑疑是北周造。此碑未見著錄，拓本今存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

二三、隋開皇二年(公元582年)《邑主雷惠祖合邑子弥姐顯明等造像記》

碑所在地不詳。此碑未見著錄，拓本今存陝西省圖書館。

### 二四、隋開皇四年(公元584年)《鉗耳神猛造像記》

碑所在地不詳。碑記和題名的一部分載入《陝西金石志》卷7。全石拓本在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和省圖書館。

二五、隋開皇六年(公元586年)《邑主弥姐後德合邑子卅人等造像記》，附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鬲荀子合邑子廿五人改造佛像記》

碑所在地不詳。此碑未見著錄，拓本今存陝西省圖書館。

上述碑記和造像題名共二十五種。其中十三種已爲前人所著錄，但有兩種著錄不全。不見前人著錄者十二種。未著錄的部分盡可能地都抄錄一份，有兩種收入本文內，其它十種編入附錄一內。已著錄的部分，或因紀錄不全，或因釋文錯誤，其中特別是《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以其關係重要，我把兩碑的全文詳細校勘一次，加以補正，亦收入本文之內。



從時間分配和地理分佈言之，上述二十五種碑銘，屬於前秦者二，北魏者六，西魏者二，北周者十二，隋初開皇年間者三。從前秦建元三年(公元 367 年)至隋開皇六年(公元 586 年)凡二百一十九年，前後包括了六個朝代。在此二百多年內有二十五幢碑銘作為研究的資料，而且除了後秦以外，每個朝代都有一些代表性的碑銘作為研究的對象，這一點是比較令人滿意的。碑的原在地，屬於蒲城縣者三，耀州者七，白水縣者一，渭南縣(渭河北岸)者一，澄城縣者一，富平縣者一，宜君縣者一，銅川縣者一，銅川、白水二縣間者一，以上十七碑石都在渭河以北。又屬於藍田縣者一，舊咸寧縣今西安市東城東郊者二，咸陽縣者一，以上四個碑石都在渭河以南。此外，尚有四碑所在地不詳，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唐代以前關中的羌村大都在馮翊、北地二郡，換言之，即羌民的造像題名碑應在渭河以北，不在渭河以南。直至唐時，這種情況仍然照舊，只有少數的羌族官吏將士從渭北移居長安一帶。關於此點，最後一節還要提到，在此不贅。

從前秦到隋初的二百幾十年內，關中部族的分佈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在公元 426 年北魏佔領長安以前為前期。在前期內，關中部族以氐、羌、匈奴為主。自公元 426 年以後，拓跋鮮卑和其它北鎮雜胡相繼入關，特別是公元 528 年爾朱天光率領賀拔岳、侯莫陳悅兩軍圍壓關西各族人民起義和 543 年魏孝武帝率領六坊之眾及文武官吏入關以後，關中遂成為鮮卑雜胡政治活動的集中地區。西魏和北周的兩代政權就是以徙入關中的鮮卑雜胡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此為後期。但無論如何，自東漢迄於隋唐，關中的少數部族始終是以氐、羌、匈奴為先為主出現於中國的歷史舞台的。關中之氐在西晉時即列入編戶，與西羌、匈奴直接統率於部落大人之下者有所不同。氐人和漢人的融合約在北朝時期。北魏北周雖

亦出兵征伐氐族，但這些氐族分佈在南秦州、梁州等地，不在關中。羌族的融合比較遲些，約在中唐以後。次於氐羌者為匈奴。匈奴於漢時入關，十六國時稱“東西曹”，盤踞在貳城（黃陵縣西北）的東西。北魏滅赫連夏以後，其族更以“稽胡”之名出現於上郡一帶。直至唐代中葉始銷聲匿跡，與延河流域的漢人相互融合。北鎮鮮卑雜胡入關者多，來勢亦洶，但一至隋唐便不成其為部族集團，而僅以一種少數部族的成分出現於朝廷、戎伍、閭里之間。有些北族的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之流，外人尚能指出其為某某部族的後裔，但他們自己却儼然以漢胄自居，不復承認自己的少數部族成分了。這種情況正可反映鮮卑雜胡的漢化比較更早一些。關中古代部族的始末，大致如此。

下文即圍繞着上述前後兩期關中少數部族的情況加以敘述。但如衆所知，只靠碑銘資料是很難反映出部族歷史的全貌的。即使比較簡單的部族分佈和關係，只靠碑銘也很難反映出來。因此在每節之內或多或少必須援引一些其它文獻以佐說明。下節敘述《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所反映的關中部族情況。但此兩碑只能反映馮翊護軍、撫夷護軍和□產所管轄地區的部族種類、區域劃分、官吏兵士的設置等等，至於從漢到晉關中部族的由來，前後二趙與關中部族的關係，則必須事前加以說明。現在藉序言尾端，略補述苻秦建元以前關中部族的由來如下。

漢代以來，匈奴、氐、羌及其它雜胡以不同時期徙入關中。匈奴入徙有兩大波瀾：一在漢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 年），昆邪王殺休屠王，率衆四萬餘人降漢，武帝置五屬國以居之。此五屬國在安定、上郡、五原、天水、西河五郡的塞外。當時匈奴已遷到關中東、西、北三邊的周圍，其中上郡、安定二郡都屬於關中範圍。二在東漢建武二十六年（公元 50 年），南匈奴降漢，光武帝處之緣邊八郡，

其中朔方、西河二郡與關中密邇相接，北地郡在安定的蕭關以東，其屬關中更無疑義(注一)。西羌之入關始於東漢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當時馬援爲隴西太守，鎮壓西羌，徙置三輔，於是扶風、馮翊，遠及河東空地皆有羌族與漢民雜處(注二)。越到後來，西羌之入關者越多，除三輔外，安定、北地、上郡等地無不有羌。氐人原來分居在漢代武都郡的武都(甘肅成縣西北)、隴西郡的氐道(甘肅秦安縣西南)、天水郡的略陽(秦安縣西北)和清水(甘肅今縣)等地。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武都郡，原居武都的氐人一部分被排斥在汧水、隴山之間(在陝西隴縣西北)(注三)，此爲氐人西入關中之始。東漢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略陽興國城的氐王隨馬超起兵。後氐王從超入蜀(注四)，所遺部民數萬落，曹操徙之於扶風之美陽(陝西扶風縣北)(注五)。氐人入關中者至此益衆。到西晉前葉，關中各地的少數部族在原来的基礎上更有所擴展。郭欽上武帝書云，上郡、安定、北地、馮翊四郡都有匈奴，京兆郡有雜胡(注六)。江統的《徙戎論》謂馮翊、北地、新平、安定四郡都有羌，扶風、始平、京兆三郡都有氐(注七)。關中的少數部族既多，所以《徙戎論》云“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戎狄的人口多到與漢族的人口相等，這在當時顯然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了。部族雜居的問題，第

(注一)關中以在函谷、武關、散關、蕭關四關之中得名。蕭關在隴東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其地古屬安定郡。北地郡更在其東，治富平，今慶陽縣。

(注二)《後漢書·西羌傳》、《晉書·江統傳》。

(注三)《三國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

(注四)同上。《三國蜀志·馬超傳》注引《典略》云氐王入蜀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注五)《三國魏志·張既傳》云：“太祖(曹操)乃自到漢中，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其事當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注六)《晉書·北狄匈奴傳》。

(注七)《晉書·江統傳》。

一是容易產生部族衝突，第二是糧食供給不足。自曹魏以來，漢族士大夫如鄧艾、郭欽、江統之流相繼痛陳戎狄內徙之害，建議徙戎實邊之策，端由於此。但此時關中的人口稀少，縱百餘萬口尚不及漢盛時戶口的十分之一，因此在統治階級看來，若不許戎狄內徙，則不特田賦課稅無所出，即征兵徭役亦感覺萬分拮据。所以當時建議者雖憤慨陳詞，而朝廷在咸寧、太康間仍不斷允許匈奴等族入塞。這樣，關中的少數部族跟着就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了。

十六國前趙時，劉曜都長安，并州的五部屠各從此大量徙入關中。屠各一稱“休屠各”，原係匈奴休屠王及其部衆的後裔。其降衆之居五原、河西二郡者，東漢時歸南匈奴管轄，後來便成爲并州的五部屠各。其居安定、上郡、金城三郡者，則在晉初進入關中。所以在前趙時長安和渭河以北的許多郡縣成爲屠各匈奴盤據之所。劉曜又常出兵攻打上郡、隴西的氐羌和略陽仇池的氐王楊氏，氐羌附降者三萬多口，隨從他們的酋帥權渠氏、楊氏、姜氏都被徙入長安(注一)。後來劉曜在咸陽的渭城置單于台，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爲之(注二)。可知當時所謂“五胡”已經有不少麇集在關中地區了。前趙之亡，石虎雖然把秦、雍大族徙於襄國，又把關中的氐羌十五萬落徙於司、冀二州(注三)，但率領氐族東下的是前秦的始祖苻洪，擁有秦、雍氐羌十多萬戶居於枋頭；而後秦的始祖姚弋仲亦率羌族數萬人居於清河之灑頭(河北棗強縣)。當後趙末年發生了冉閔所領導的宮廷事變以後，苻洪和姚弋仲之子襄把原來率領的氐羌又遷回了關中(注四)。

(注一)《晉書·劉曜載記》。

(注二)同上。

(注三)《晉書·石勒載記》。

(注四)參考《太平御覽》卷121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晉書·姚弋仲載記》、《姚襄載記》及《魏書·苻健傳》等。

在前秦苻堅之時，關中除氐羌外還有不少的其它部族。《太平御覽》卷 363 引車頻《秦書》云：

“苻堅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爲之題目，謂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闊頰，北狄爲匡脚面，南蠻爲腫蹄。方，方以類名也。”

按“側鼻”即高鼻，指高鼻的西域胡。東夷廣面、闊頰，頰與額通，指夫餘等。北狄匡脚面，匡之義爲方，指屠各、鮮卑諸族。南蠻腫蹄，言其脚厚腫，指巴、蜀人等。十六國時已經置有“六夷大都督”，此所謂“六夷”，解說不一，大致和上述的部族多少總有一些聯繫。但前秦時關中的部族，除漢人外，人數最多的是氐、羌，其次就是屠各。關於氐的分佈，《晉書·苻堅載記》記述最爲詳細。《載記》云，建元十六年（公元 380 年），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願分三原、九嚙（今醴泉縣）、武都、泝（今泝陽、隴縣）、雍（今鳳翔縣南）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從苻堅的話證明了關中的氐人居於長安的西北偏，即涇水至泝水流域的三原、涇陽、醴泉、扶風並西至泝陽、隴縣一帶，而其戶數，擬分往關東者十五萬戶，那麼原有的戶數至少當在二十萬戶以上。二十萬戶以上的氐族，每戶以五人計，即其人口當在百萬以上。這個人口數字，現在看來不算什麼，但據江統《徙戎論》云晉初關中的人口只百餘萬，而此時長安西北偏各地的氐族人口便與晉初關中全部人口相同，可知前秦時關中的氐戶是十分衆多了。當時屠各在關中的分佈，《苻堅載記》亦有記載：“興寧三年（公元 365 年），堅又改元爲建元。……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杏城（在舊鄭州中部縣西，今黃陵縣境內）巴南郡縣，屯於馬蘭山（銅川縣北）。……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於長安。……轂尋

死，分其部落：貳城以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以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從此記載知當時涇河上游至洛水上游的五百里地區駐有匈奴四萬多落，每落以五口計，共有人口二十多萬。此外，移往長安者六千餘戶，約合三萬多口。可知當時匈奴的戶口數目也是十分可觀的。羌族在關中的分佈，以前後文獻記載，應較氐及匈奴爲廣，戶口數目亦應較多，然《晉書載記》對此問題語焉不詳。且關中部族，除氐、羌、匈奴外，種類繁多。當時有哪些部族，居住何處，諸部族間的關係如何，這些問題在《晉書》和《十六國春秋》裏並不會有所敘述。因爲如此，所以我們不得不於正史之外，求助於碑銘和造像題名這一類文獻，以期對於上述問題得到比較妥當的解決。又五胡十六國史之所以難治者，部族之外，卽爲疆域問題。清代洪亮吉著《十六國疆域志》，對此問題貢獻很大，但有些重要問題仍未徹底解決。卽以前後二秦的疆域言之，杏城、貳縣所在，諸家說法已不一致，而李潤、邢望諸堡，更難得其端倪。至在疆域之內，郡縣如何劃分，護軍如何設置，這些問題更非洪亮吉的《疆域志》所能解決的了。因爲這些緣故，我們應當利用地方碑銘，加以研究，縱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就是從中探出一些線索，也是好的。

## 二 前秦《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所記的關中部族

前秦留在現在的碑銘只有兩幢：一幢是建元三年(公元367年)的《鄧太尉祠碑》，又一幢是建元四年(公元368年)的《廣武將軍□產碑》。《鄧太尉祠碑》的全文前人已有著錄，但其中有些文字解釋頗有出入。今從陝西圖書館借到舊拓片一幅，又從省博物館借到一幅比較清晰的新拓片，再參考前人著錄，重為校正如下：

“大秦苻氏建元三年，歲在丁卯，馮翊護軍(注一)、建威將軍、奉車都尉、城安縣侯、華山鄭能進(注二)，字宏道，聖世(注三)鎮南參軍、水衡都尉、石安令、治書侍御史、南軍督都水使者，被除為(注四)護軍。甘露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官。以北(注五)接玄朔，給兵三百人，軍府(注六)吏屬一百五十人，統和甯戎、鄜城、洛川、定陽五部領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涼西羌，盧水，白虜(注七)，支胡，粟特，音水，雜戶七千，夷類(注八)十二種。兼統夏陽治。在職六載，邈(注九)無異才，履性忠孝，事上

(注一)《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衍“將軍”二字。

(注二)《八瓊室金石補正》以“進”字漫漶，解為“邈”。可備一說。

(注三)《存逸考》解“聖世”作“望出”，大誤。下文仍有“聖世”，與此同。

(注四)《存逸考》“為”誤為“右”。

(注五)《金石續編》“北”誤作“地”。

(注六)《金石續編》與《金石補正》“府”並誤作“而”。

(注七)《金石續編》《虜》誤作“盧”。

(注八)《存逸考》“類”誤作“類”。

(注九)《金石續編》“邈”誤作“進”。“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作“邈”。然字典無此字，應作“邈”。

恪勤，夙夜匪懈。以太尉鄧公祠張馮翊所造，歲久頹朽，因舊脩飭，故記之。以其年六月左降爲尚書庫部郎、護軍司馬、奉車都尉、關內侯。始平解處，字臣文<sup>(注一)</sup>，聖世水衡令、蒲子北掘令、安遠將軍司馬、都水參軍，被除爲司馬。

軍參事北地靈武孟□、完廣。

軍參事和戎鉗耳□、□龍。

軍門下督和戎鉗耳引、世虎。

軍功曹和戎鉗耳叵當、世興。

軍主簿河西臨晉楊萬、世和。

軍主簿和戎雷夫龍、道藏。

軍主簿河西重泉范高、延思<sup>(注二)</sup>。

軍主簿和戎雷道、子安。

軍主簿和戎雷川、玉光。

軍主簿和戎雷永、景文。

軍主簿和戎西羌騎、世龍。

軍錄事和戎雷顏、道□。

軍錄事和戎雲陸、道陸。

軍錄事和戎僂蒙琿、子諒。

功曹書佐和戎雷陵、道進。

功曹書佐和戎僂蒙龍、彥詳。

軍參事北地富平楊洸、少論。

軍門下督馮翊朱進、超石。

軍功曹寧戎蓋周、彥容。

(注一)《金石續編》“字臣文”誤作“安宇文”。

(注二)《金石續編》誤“思”爲“思”。



軍主薄寧戎郝子星(注一)、永文。

軍主薄寧戎屈男道詵。

軍主薄寧戎甍共(注二)、永萇。

軍主薄寧戎雷樹、進夔。

軍錄事馮翊呂騫、愼菘。

軍錄事寧戎甍投、欽詳。

軍功曹書佐寧戎利非閭(注三)、永達(注四)。

治下部大鉗耳丁比。”

上《鄧太尉祠碑》在蒲城縣東北七十里東河川(洛水西岸)(注五)，為前秦馮翊護軍鄭能進建立。碑文敘述到馮翊護軍所轄的五部城堡和部族名類，最後還詳記軍府吏屬的姓名，對於我們理解馮翊護軍所轄的少數部族關係至為重要。馮翊護軍所屬的五部，一曰和戎，二曰寧戎，碑文合稱之為“和寧戎”。《晉書·苻登載記》云：“登征虜馮翊太守蘭慎率衆二萬自頻陽(富平縣東北六十里)入於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時姚萇據長安，苻纂屯敷陸(鄜城)，蘭慎自頻陽居首，苻纂繼之南下，慎兵經和寧而圖長安，則和寧在頻陽與長安間自明。從前人們對於和寧戎的所在地，說法不一。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卷4謂“在嶺北杏城之東南。”古代以九巘山以北為嶺北，在今醴泉縣北。蘭慎由頻陽而攻長安，當無紆迴假道於嶺北之理。顧祖禹《方輿紀要》卷53云：“和寧堡在三原縣北，或云和寧在嶺北杏城之東南，似誤。”顧氏此說近於真實。

(注一)《金石續編》“郝子星”誤為“郝子靈”。

(注二)《金石續編》誤“共”為“世”。

(注三)“利非”下《金石補正》作“閭”，《雪堂簿錄》作“騰”，茲從《補正》。

(注四)原文作“達”，《金石續編》誤釋為“遠”，應為“達”，《蜀郡造橋碑》有此字。

(注五)謝燾《碑刻紀存》云《鄧太尉祠碑》在蒲城東北四十里之阿村，不知所據。碑原在鄧公祠內，1927年宋哲元移置於祠附近一土窖中。鄧公祠及衣冠塚皆在，西北距蔡鄧鎮二十里。

然和戎與寧戎是二城二部，不當混而爲一。其分立情狀，從《鄧太尉祠碑》的題名人之籍貫固足以知之，即《姚泓載記》記孫暢勸姚懿“招引和戎諸羌，樹立私惠”；而不言寧戎，亦知和戎與寧戎非一城一部。三曰鄜城，在今洛川縣東南七十里。四曰洛川，西晉無此縣，後秦因漢鄜縣置洛川縣。前秦時之洛川當在馮翊郡界，洛水之東。五曰定陽，在今洛川縣東，至宜川縣西北界。總之，前秦馮翊五部的位在馮翊郡的東偏，即從今三原縣北部起，經富平、蒲城、洛川至宜川西界一線以東之地。碑文又云“兼統夏陽治”，夏陽即今之韓城，正屬此線極東之地。五部之內統治的部族：一曰屠各，二曰上郡夫施的黑、白羌，三曰高涼西羌，四曰盧水胡，五曰白虜即鮮卑，六曰支胡，七曰粟特，八曰苦水人。總稱之爲“雜戶七千，夷類十二種。”“雜戶”說明這些少數部族的身分，他們的身分在一般平民以下；“夷類十二種”總計少數部族的數目，前述數目雖不夠十二種，但能够敘述到八、九種，已經比古代的任何文獻敘述得詳細的多了。

屠各的來源，前文已有敘述。《苻生載記》云，羌帥姚襄到關中不久，便“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以此知洛水以東的鄜城、定陽皆有屠各匈奴。前文敘述，苻堅把匈奴分置於貳城的東西，各二萬多落。鄜城和定陽皆在貳城以東，這一帶的匈奴在《姚泓載記》內稱之爲“定陽貳城胡”。可知定陽等地的屠各匈奴是很多的。貳城以東的匈奴共二萬多落，即十萬口以上，合鄜城、定陽、洛川三部的屠各言之，其戶口數目，估計當有貳城以東匈奴總戶口的一半，即一萬多落或五萬口以上。

“上郡夫施黑羌、白羌”，“夫施”即古膚施縣，在今陝北綏德縣東南五十里。此縣漢時屬上郡，前後秦時屬長城郡，不屬馮翊郡。以馮翊護軍而統領上郡夫施之黑白羌者，乃指從上郡膚施縣徙入

馮翊之黑白羌而言。上郡之有羌始於東漢。《後漢書·西羌傳》云，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合攻并、涼及三輔。十六國的初年，《劉曜載記》記上郡氐羌十餘萬，爲曾大虛除權渠所領，自號秦王。又記“石勒將石它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勾除，俘三千餘落……而歸。”此皆言羌族集團之在上郡。然在十六國以前，當西晉中葉以後，上郡的黑白羌已經擴展到馮翊、北地二郡北部之馬蘭山，史稱之爲“馮翊、北地馬蘭羌”。關於此點可引《晉書·惠帝紀》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下一段事爲證，云：“匈奴郝散弟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攻北地。”此馬蘭羌卽碑文所云之“上郡夫施黑白羌”。直到後趙石勒末年，這些羌族仍盤據馬蘭山而南攻北地、馮翊二郡。《石勒載記》下紀其事云：

“〔延熙元年（公元前334年）〕，長安陳良夫奔於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擒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於馬蘭山。郭敦等懸軍追北，爲羌所敗，死者十七八。”

以此知黑羌等對馬蘭山的據點始終未曾放棄。但上文只言黑羌和北羌，而無白羌。白羌之名或因與“北羌”同音，致生訛傳，亦未可知。總之，上郡夫施之黑白羌，就是馮翊、北地的馬蘭羌，前者紀其所從出，後者記其新佔地。其酋長大姓，如上所述，有虛除、盆、薄等，在《苻丕載記》中還有金姓的黑羌。這些羌姓與西羌大姓顯然是有區別的。

《高涼西羌》之“高涼”頗費解。漢、魏、晉三朝無以高涼爲郡縣之名者。《魏書·地形志》，晉州有高涼郡高涼縣，係分龍門所置，在河東稷山縣南。東漢時，西羌固已至河東。至西晉末年，《劉曜、石勒載記》亦記河東平陽有羌。河東之羌重返馮翊，雖然可能，但第一，晉代河東尙無高涼郡縣之名；第二，馮翊的西羌主要來自天水、隴

西，而非來自河東。江統《徙戎論》謂“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比合《後漢書·西羌傳》觀之，西羌初至天水、隴西、扶風，繼至馮翊、河東甚明。意者，碑文中之“高涼”或係“涼州”之誤。《西羌傳》“建武九年（公元33年），司徒班彪上言：今涼州皆有降羌。”惠棟《後漢書補注》引杜佑云：“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原郡之西，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天水、隴西等郡之屬涼州，自兩漢以來深入人心，前秦時人之稱涼州西羌與上郡黑白羌同，皆由其所自地而立言的。在此碑題名中以西羌軍吏為最多，姓雷者七人，姓鉗耳者四人，姓薨者三人，姓僂蒙者二人，姓屈男、利非、西羌者各一人，共十九人，佔軍吏全數二十九人的68%以上。姚薇元教授在《北朝胡姓考》中考證雷氏為西羌累姐種的後裔，鉗耳氏為西羌虞人種的後裔，皆屬可信。薨氏，《閩姓類集儷語》認為是党項之裔，恐無根據。《西羌傳》中有當煎、當闐諸種，“當”與“薨”同音；而宕昌之名又早於党項，《舊唐書·西戎傳》云：“自周氏（即北周）滅宕昌、鄯至之後，党項始強。”那末為什麼說薨氏一定起源於党項呢？僂蒙氏，《廣韻》云：“西羌複姓有僂蒙氏。”屈男氏，《氏族略》五謂為關西複姓。《元和姓纂》屈男又作“屈南”，以為屈原之裔，自南方來，出仕後魏。此乃望文生義之說，不可置信。利非氏，北周《聖母寺四面造像碑》及《昨和拔祖等造像記》皆作“荔非”，譯音相同。最惹人注意的一個姓氏就是西羌氏。題名中有“西羌騎世龍”。以文例言，此人西羌是姓，騎是名，世龍是他的字。他所以姓西羌者乃由於此人入居馮翊後，尚無漢譯的姓氏，故以西羌為姓。上述十九人分住於和戎、寧戎二城。其居於和戎者十三人，寧戎者五人，其餘一人籍貫不可考，稱為“治下部大鉗耳丁比”。“部大”即部落大人之義。從此尚可推測十六國時的關中西羌已經分化為編戶和部落兩種。有民籍的

如題名中的某城某氏是也。無民籍的就是部大所管理的部落之民。編戶和部落之分主要表現在組織系統上，其次也表現在剝削關係上。此話甚長，留在後面再說。

盧水即盧水胡。盧水胡起源於張掖郡臨松山下的盧水之濱。盧水亦名沮渠川，以沮渠蒙遜的祖先居於此而得名。沮渠蒙遜的祖先原來是匈奴，以居於盧水之濱，亦稱為盧水胡。盧水胡的祖源，主要的是匈奴，然亦雜有月氏胡和羌族的因素。此族東遷約在東漢末年。《三國魏志·梁習傳》注引《魏略》云，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關中池陽（涇陽縣西北）以北已有盧水胡，駐紮的地點在馮翊、北地二郡之間，所以《三國魏志·文帝紀》及注引《魏書》皆記“馮翊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到了西晉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匈奴郝散弟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攻北地”（《晉書·惠帝紀》）。此皆可為盧水胡居住於馮翊、北地之證。到北魏時，渭北盧水胡的分佈中心在杏城一帶。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杏城的盧水胡爆發了兩次反魏運動。領導的首領，一個是郝溫，一個是蓋吳。而這兩位首領的姓氏恰巧與《鄠太尉祠碑》題名的寧戎郝子星和蓋周相同。郝溫和蓋吳，還有一位縣吏蓋鮮，據《魏書·世祖紀》說他們的部族成分是盧水胡，而《晉書·惠帝紀》則說郝散、郝元度是匈奴，二說似有矛盾。但上面我們已經說過，盧水胡是以匈奴為主而又融合其它成分的一種部族，所以謂之為匈奴，或謂之為盧水胡，皆無不可。

白虜就是鮮卑。《苻堅載記》下云：“秦人呼鮮卑為白虜。”但此鮮卑指原居東北的“徒何鮮卑”，拓跋鮮卑不應包括在內。《魏書·帝紀序紀》記拓跋部人稱徒何鮮卑為“白部”，可以證明拓跋鮮卑不能稱為白虜或白部了。白部或白虜的大量入關是苻堅滅燕以後的事，建元三年尚未滅燕，白虜從哪裏來的呢？《晉書·傅玄傳》記玄上

疏云：“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此事爲《三國魏志》所不載。《通鑑》卷 79 記晉泰始五年（公元 269 年），“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胡烈爲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爲患，以烈素著名於四方，故使鎮撫之。”胡三省注云：“此河西鮮卑也（注一）。”若以《通鑑》爲說，鮮卑由塞北而遷居雍涼之間，再遷雍州之關中，並非不可能的。然胡注以爲此鮮卑乃日後建立南涼的河西鮮卑，亦即禿髮鮮卑。禿髮鮮卑與拓跋鮮卑同源，史志只能稱之爲“胡”，而不能稱之爲“白虜”。所以鄧艾所徙之鮮卑應與碑文中的“白虜”無關。又晉時的朔方鮮卑以居黃河之西亦稱“河西鮮卑”。《石勒載記》上有石季龍破河西鮮卑日六延於朔方，俘其三萬餘人以歸的事。《石季龍載記》又有石宣破朔方鮮卑斛摩頭之事。朔方郡既有鮮卑，此鮮卑由北而南入關中，是十分便利的。然此朔方鮮卑是拓跋鮮卑，抑是白虜鮮卑，疑莫能明，不能由此得出結論，碑文中的白虜就是從朔方郡遷來的。還有《苻堅載記》記苻秦甘露二年（公元 360 年），“烏丸、獨孤、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又降於堅”。此事發生於建立《鄧太尉祠碑》之前七年，苻堅把這些降人處之塞外，那麼碑文中的白虜是否鮮卑沒奕于的降衆呢？但又不是。主要理由有二：一，鮮卑沒奕于的部衆從塞外只徙入安定郡的北部，並未到達關中的馮翊郡內。二，《通鑑》卷 106 云：“沒奕于，鮮卑多蘭部帥也。”多蘭部帥沒奕于在《魏書·太祖紀》內稱作“破多蘭部帥木易于”，以此知“破多蘭部”就是“多蘭部”。《官氏志》作“破多羅”，云：“西方破多羅氏，後改爲潘氏。”《官氏志》所說的西方，乃以拓跋氏之居於盛樂或平城而言。

（注一）晉書·禿髮烏孤載記云：“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盡有涼州之地。”然則《通鑑》與胡注的說法都是有根據的。

但破多羅氏是遼碣鮮卑(白部)之裔,抑是塞北鮮卑之裔呢?目前尚不能下一定的結論。有此二因,所以我們不能說關內馮翊郡的白虜與多蘭部有必然的關係。跟鮮卑多蘭部帥相互為鄰而居的,還有平涼的金熙。《苻丕載記》云:“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奕于與葦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金戰於孫丘谷(隴東平涼之東南),大敗之。”關於金熙的部族成分,《通鑑》卷106云:“金熙本東胡之種。”胡注云:“秦謂鮮卑之種居遼碣者為東胡。”居於遼碣的鮮卑亦即拓跋部所稱的“白部”,中原各族所稱的“白虜”。此種鮮卑居於平涼,與北地、馮翊二郡密邇相連,碑文中的白虜可能與此有關,但他們如何遷往馮翊郡的直接史料尚未找到。總之,馮翊郡白虜的來源,在苻堅征服前燕以前,從何地徙入關中,一時很難下結論的。關中的白虜鮮卑,除了劉曜時從關東帶來的少數豪傑外,後趙末年已經有許多鮮卑兵參加了關中的內戰。《石勒載記》下云:“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進師攻長安,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瑣部衆二萬為前鋒,距之。鮮卑密通於季龍,背生而擊之。”此涉瑣所率領的二萬鮮卑,從當時部族關係看,似乎不是拓跋鮮卑,而是白虜。後趙末年已經有二萬關中鮮卑參加了石氏的內戰,那麼苻堅建元三年馮翊郡內有若干白虜便毫不足為奇了。

支胡是月氏胡的簡稱。月氏胡初居甘肅的河西走廊,從敦煌到祁連山之間皆有其族。在西漢前葉,一部分月氏胡降漢,入居安定郡。《漢書·地理志》云,安定郡有月氏道。其地在隴東鎮原縣的東北。錢坫《新纂注地理志》云:“此以月氏國降人所置也。”關中之有支胡當由安定郡的月氏道徙入。《晉書·懷帝紀》,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漢後,誑惑羌、戎,僭帝號於馬蘭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衆數千為亂,屯新豐(陝西臨潼縣西南),

與茫蕩合勢。”劉茫蕩起兵於馬蘭山，支胡五斗等數千人自渭河以南的新豐應之，其活動範圍自然在馮翊境內。前秦馮翊郡內之有支胡由此可見其端倪。

粟特人原居中亞以撒馬爾罕為中心的阿母河以東北地區。在錫爾河以北古有康居國，其國人民為康居人（亦稱康里人），屬阿爾泰語族。後來康居國統一了錫爾河以南諸地，統治的王族為康居人，人民則以粟特人為主，屬於伊蘭語族。康居王統一此區以後，分為數小國，如康、石諸國是也。各國之人至中國者即以國名為姓，晉代西域胡之石、康諸姓皆出此國。《晉書·石勒載記》稱石勒為“羌渠之胄”。“羌渠”與“康居”同音（注一），石勒之祖為康居人，故稱為羌渠之胄。又因其原居石國，故以石為姓。其次為康姓。《梁書·康絢傳》載康姓之來源云：

“康絢，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為黔首，其後即以康為姓。晉時隴右亂，康氏遷於藍田。絢曾祖因為苻堅太子詹事。”

此言關中藍田康姓出自康居甚明。我們於此當注意者，即康絢祖先若以少數部族成分居於關中，原不足異。而同傳記當姚秦時，絢之祖父穆“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晉書·姚興載記》又記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藍田康姓之族動輒以三千家或數百家計，其人數之多可以想見了。藍田的康姓初出自康居，西漢時進入河西，西晉末由河西又遷入藍田。這一段淵源至為明顯，無庸多說。藍田於晉屬京兆郡，渡渭河而北即為馮翊郡，我想馮翊郡的康姓等族係由藍田徙來的。

（注一）《史記·大宛傳索隱》康居下云，居音渠。康、羌音近。“羌渠”當為“康居”之別譯。



十六國時渭北康姓尚無所聞。到北魏時，《魏書·源子雍傳》記康維摩擁羌、胡守錮谷（在韓城縣境），斷斲棠橋以拒魏兵。其事發生於馮翊郡，其人及其所擁有的羌、胡，大致也是居於同郡之內了。十六國時，《石季龍載記》附冉閔部分記降胡中有“粟特康”其人。此人和《鄧太尉祠碑》裏的“西羌騎”相同，皆以族為姓，前者並以國為名，頗為別致，大可說明粟特人原是康居國統治下的百姓。

最後還有一種苦水人。苦在碑文中作“音”，以北周《王妙暉等五十人造像記》等文證之，其為辛苦之“苦”無疑。《魏書·太祖紀》云：“登國八年三月，車駕西征侯呂鄰部。夏四月至苦水，大破之。”同書卷 103 亦附載此事。《水經注·河水注》云：“苦水發（高平）縣東北百里山，流注高平川。”高平川在隴東鎮原縣南。《方輿紀要》卷 58 謂高平川一名苦水，以水味苦而名。又云，苦水即高平川之上源。然則苦水在高平甚明。十六國時，高平為雜胡所居地，很難確指苦水為何族。其地漢時屬北地郡，有匈奴、月氏降人及西羌。三國時，禿髮鮮卑亦徙居於此。又有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二千餘家至高平（注一）。十六國時，其地為鮮卑沒奕干及金熙所統治，沒奕干的勢力尤強，直至北魏天興五年（公元 402 年）始被拓跋遵等所破（注二）。因此，從此遷入馮翊郡的苦水人究為何族頗難斷定。《廣武將軍□產碑》正文內亦載此族。可知十六國時一些人已經把苦水當作一個部族看待了。

前秦建元四年（公元 368 年）《廣武將軍□產碑》的拓本全部有碑陽正文及題額一幅，碑陰題名一幅，還有左右兩側題名的兩個狹幅。從前碑文拓本齊全的很少，有的缺少碑額，有的缺少碑左右兩側的題名，所以著錄不全。碑額既有《立界山石祠》題字，那末如

（注一）《三國魏志·郭淮傳》。

（注二）《魏書·太祖紀》。

《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卷 1 稱之為《立界山石祠碑》是對的。但因為許多人不會看到碑額，只根據碑陽正文內第一行有“廣武將軍”，於是稱之為《廣武將軍□產碑》了。其實這一官銜是□產的，抑是其祖父的，很難確定。《金石萃編》的作者王昶，既不會看到碑額題字，又不曾看到碑左右兩側的題名，題名不全且不說，自《萃編》行世以後，《廣武將軍□產碑》之名已為一般人所通用，現在似亦不必再作變更了。碑主的姓氏，至今尚無人考證得出。從前武威人張澍，曾推測碑主姓張或弓。許多人對此說加以駁斥，不能成立。碑的所在地，畢沅《關中金石記》謂在宜君縣，一時亦靡然信之，不以為非。直至 1920 年，澄城人雷文棠（召卿）於白水縣訪得（注一），碑在白水始成定論。然當時人謂碑在白水史官村倉聖廟（注二），此說亦誤。以我們所知，在史官村倉聖廟的為《漢蒼頡碑》，苻秦之《廣武將軍□產碑》則在縣東北三十里之縱目鎮（注三）。我所見的拓本是 1920 年以後的新拓，清晰異常、且碑額、正面、碑陰、兩側俱全，可以彌補舊拓本的殘缺不全之憾。現以新拓本為主，參考《萃編》和《八瓊室金石補正》的釋文，照原式抄錄如次：（見第 24 頁後）

此碑陽面的下部和中部，陰面的下部和左側，俱漫漶過甚，以致許多事實辨別不清，誠為憾事。過去金石家只注重碑主姓氏之考訂，無明確結果，今日我們對此問題亦無能為力。但此碑除碑主姓氏外，所反映的問題，如前秦渭北疆域之劃分、職官之設置、部族的分佈以及碑主所統治的吏民數目，都有研究的必要。碑陽正文大致可分為三段：首段敘述碑主的家世、履歷和事業；中段敘述會同當地顯要與馮翊護軍、撫夷護軍(?)劃分疆界的經過和自己疆域

(注一)參考顧燮光《夢碧移石言》卷 1《苻秦廣武將軍碑》一文。

(注二)同上。

(注三)參考李子春《陝西碑碣》，內云廣武碑在縱目鎮小學內。

內的部族、吏民實況；末段是銘文。按碑文所記，碑主是廣武將軍、使持節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上黨公之元孫，建忠將軍、撫夷護軍、扶風太守之胤子，初爲池陽縣令，繼授大將軍左司馬，最後爲渭河以北一城鎮之顯官。他會同□□司馬卽默欽、廣武司馬杜益臣、□節將軍董□、建□將軍楊□、建武將軍王柴、鷹揚將軍□□等等，與馮翊護軍苟輔“參分所部”（依王仁俊所釋），樹立界石，並建“立界山石祠”爲證。碑主所管轄的地區，如正文所云，是“西至洛水，東齊定陽，南北七百（里），東西二百（里）。”洛水自鄜城來，南入宜君、白水二縣，在馮翊郡西境。定陽在定水之陽，故城在今宜川縣西北。據此則知碑主的管轄地區是從洛水流域東至定陽西界之一狹長地帶。其地在馮翊護軍的西北，撫夷護軍的東北，三方劃界立石，端由於此。撫夷護軍，據《元和郡縣志》是三國魏時司馬懿廢舊雲陽縣而建立的。舊雲陽縣在涇陽縣西北，前秦時屬馮翊郡，仍稱撫夷護軍。碑文中的“參分所部”，撫夷護軍當爲參與劃分疆界的三個單位之一。但“立界山石祠”的西南有土門護軍（治頻陽，今富平縣），西北有銅官護軍（治銅官，今銅川縣）。參加此“參分所部”者究爲哪一護軍，尙許進一步考證。從《鄧太尉祠碑》知原來的馮翊護軍是鄭能進，於建元三年去職，繼任者卽此碑文中的苟輔。苟氏爲氏秦望族，苻堅的母親和妻都姓苟，苟輔當係苻堅的外戚。《苻堅載記》下記苟輔在建元二十年（公元 284 年）遷新平太守。

· 碑文和題名內所提到的文武官秩頗多。從這些官秩，我們不只有可以看出苻秦官秩與晉代官秩有何異同，而且可以看出碑主□產與參加分界諸官秩的關係以及碑主是否卽是廣武將軍之一問題。碑內所羅列的官秩約可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屬於軍事系統的，其中有各級將軍，各級將軍司馬、參軍、功曹、主簿、軍監、軍督、軍禁、都統等。第二類是屬於郡縣系統的，其中有主簿、錄事、行事、參事、

功曹、金曹、兵曹、賊曹、戶曹、租曹、寺門、書佐、幹、丁議等。參事、主簿、功曹、錄事、書佐等官在軍事系統中亦有，一般前面都加一“軍”字，如在《鄧太尉祠碑》內可以看到。此碑題名中所列的上述官秩前面都無“軍”字，無法辨明其是否屬於軍事系統。第三類是屬於部落系統的，如大人、部大、酋大等。

軍事系統中，將軍的名號在碑陽有廣武（碑主之祖）、建忠（碑主之父）、建武、鷹揚等將軍，在碑陰有立節、建節、廣威、建威、揚威、立義、寧遠等將軍。上述諸將軍名號可考者，建威、鷹揚之名始於東漢，揚威、廣威、建武之名始於曹魏，廣武、寧遠之名始於晉（注一）。按晉官品，廣武、廣威、建威、建忠、建節等將軍為第四品，鷹揚、寧遠等將軍為第五品（注二）。前者的俸廩是二千石，後者比二千石（注三）。從此可知前秦的將軍官品大部分是承襲東漢、魏、晉的。後來北魏的將軍官品大致同前秦的上述情況相似，只把第四品的將軍分作四品和從四品兩種（注四）。從此又知北魏的將軍官品又是承襲前秦的。碑銘的武秩，除將軍外，還有軍督、軍監、司馬、參軍等秩。軍督疑即軍督，是“軍門下督”之簡稱。《晉志》四品將軍以上皆置軍門下督。《鄧太尉祠碑》馮翊護軍鄭宏道部下有軍門下督，正因宏道是第四品的建威將軍之故。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記太守府屬有門下督，但不稱軍門下督。軍監疑是“護軍監軍”的簡稱，亦第四品。碑銘中有三司馬，有兩司馬是屬於第四品將軍下的，皆為第七品。參軍隸屬於護軍將軍。《晉志》護軍將軍的“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軍，則置參軍。”護軍將軍

（注一）《宋書·百官志》。

（注二）《通典》卷 37《晉官品》、《五代史志》。

（注三）《北堂書鈔》卷 56 引《晉百官表》注。

（注四）《通典》卷 38《後魏官品》。

始於秦漢，魏晉因之。魏晉時護軍的地位很高，《魏略》稱“司馬景王代夏侯玄爲護軍，總統諸將，主武官選事。”《晉志》記護軍有兩種：資望重者爲護軍將軍；資望輕者爲中護軍。前者爲第三品，後者爲第四品，見《宋志》。馮翊護軍鄭宏道爲第四品建威將軍銜，實際上只能叫作“中護軍”。

郡縣系統的官吏，特別是郡守以下的官吏，《晉志》敘述太略，不足爲法。《晉志》只記郡守以下有主簿、主記史、功曹、賊曹、議生、門下史、錄事史、書佐、循行、幹、五官掾等，於諸曹敘述最略。《南鄉太守司馬整碑》有金曹、倉曹、左右兵曹掾。《金石錄》所收的《彭祈碑》有田曹史、鎧曹史、法曹史、兵曹掾。《建寧太守爨寶子碑》有“西曹陳勃”。西曹就是法曹。上述諸曹皆《晉志》所無。此外，《司馬整碑》又記有門下督和府門亭長。凡此皆可補《晉志》之不足。晉代的郡縣官制大部分承襲自漢魏，前秦碑銘中的功曹、賊曹、戶曹、兵曹、法曹、金曹以及主簿、參事、書佐、幹等又皆承襲自魏晉。所不同者，碑銘中的租曹、行事、寺門、丁議、里禁諸秩皆爲晉官名中所無。晉代有倉曹而無租曹，與宋、齊官秩略同；前秦有租曹而無倉曹，與北齊官秩略同(注一)。行事無所聞。寺門是縣衙門的守卒，一稱“寺門卒”。漢時郡太守衙門的守門吏稱府門亭長，縣衙門的守門吏稱寺門卒。晉與前秦皆沿其制，故寺門爲寺門卒的簡稱。丁議可能就是晉代的議生。里禁是鄉里中的里吏。《晉志》：“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另外，還有左尉。《漢官儀》云：“大縣(置)左右尉，小縣一尉。”《晉志》，尉亦是“大縣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可知左尉是大縣的官吏。總之，碑銘中的文官，有的屬於郡太守的，有的屬於縣

(注一)參考《宋書·百官志》及《五代史志》。北齊州鎮有倉曹，郡縣無倉曹，只置倉督員。

令長的，情況相當複雜。

部落系統的官，大人原是匈奴的官號，後來被北方、東北、西北各族所沿用。碑銘中只有一人即白平君爲大人銜，白姓爲龜茲人。酋大和部大之名前後凡六十餘見，其中稱酋大者，西羌的酋帥佔絕對多數，前後約二十五人，另外只有一個龜茲人稱酋大。稱部大者多係氐酋和雜胡的酋帥，前後近三十人。《後漢書·西羌傳》云：“強則分種爲酋豪。”《宋書·沮渠蒙遜傳》云：“羌之酋豪曰大。”西羌酋帥之稱酋大者以此。《晉書·石勒載記》記稱部大者二人，即羯胡張匄督與莫突。此爲雜胡稱部大的先例。

從上述三個系統的官秩名，再結合碑銘中的事實，我對碑主□產的政治地位略提一點初步的假設。□產初爲池陽縣令，以“輯和戎翟”之“功”，被擢爲征西大將軍左司馬。旋以成績“茂著”又調往洛水流域一城鎮，做了“統戶三萬，領吏千人，大將三□”之顯宦。此顯宦爲何秩，因銘文脫落，很難復原。一個方法就是按照他統率的將軍品級、官吏名稱、戶口數目以及部族成分，加以推測。碑銘中第四品將軍共十餘人，第五品二人，無名號者三名，我想□產的軍秩當在四品以上。又因部下的軍官有軍督、軍監、司馬、功曹、主簿、參軍等秩，所以我疑他是第三品的護軍將軍。此護軍的駐兵地區在洛水以東、定陽以西，這裏原有的部族很多，所以他的將吏和戶口很多都是西羌、雜胡、氐族及苦水人。護軍駐軍地區的東邊和南邊與馮翊護軍的駐兵地毗連，所以這次□產“躬臨南界，與馮翊護軍苟輔”等劃界立石。但□產的官階，不限於護軍，而且兼領郡秩。第一，因碑銘記載他“統戶三萬”，又記“君臨此城，漸再累紀。”晉制，統萬戶以上者爲郡太守，將軍並不直接統戶的。第二，碑銘中有很多功曹、賊曹、兵曹、金曹、法曹、主簿、參事等官，大部分屬於郡級官吏。所以我想□產的文職是兼郡太守。兼哪一郡的太守

呢？按碑銘和護軍的所在地區，當爲馮翊太守。前秦苻堅時，馮翊太守可考者只二人：一爲韋華，在建元末由僕射外調爲馮翊太守，見《北史·寇讚傳》。一爲仇騰，建元二十年（公元 384 年）慕容冲起兵後，由甘松護軍內調爲馮翊太守，見《苻堅載記》。而□產則是建元初年由征西司馬上陞爲護軍並兼領馮翊太守的。《通典》卷 33 云：“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爲恥。”苻堅時前有□產，後有仇騰，都是以護軍兼領太守，可知這種兼職並不爲奇了。另外，還有許多縣級官吏，如左尉、寺門、幹、丁議、里禁等，我想是“立界山石祠”所在縣的官吏，他們是參加劃界立石的現場人員。以上所述，只是一種推測，一種假設，希望進一步得到證實。

從碑文裏理解洛水以東、定陽以西有哪些少數部族是我們的主題。但碑陽中這一段（即第十四行）缺了十四個字，使我們知道只有苦水一族，誠爲憾事！爲了彌補這一缺陷，想出一種辦法，就是從大人、部大、會大的姓氏加以推測。凡是大人、部大、會大的姓氏應該就是少數部族的姓氏。但是有些姓氏一望而知其爲部族的姓氏，有些姓氏雖然冠以部大等銜但與漢姓相同，這就必須下一番考證工夫。下面列了一個統計表，第一欄是題名之前冠以大人、部大、會大的少數部族姓氏；第三欄是原來不曾冠以部大等銜的姓氏，但與冠有部大等銜的姓氏相同，那麼，此類姓氏可能是少數部族的姓氏，也可能不是，所以別爲一欄。（表見 29 頁）

從統計表中可見，以部大等爲銜的少數部族姓氏有十六個，包括的人數共七十六人。在題名中此七十六人確定是少數部族，佔殘碑題名總人數一百三十四的 50% 以上。題名中的姓氏與上述十六姓中的王、楊、秦、董、張、李、韓相同的，有三十八人。連同上面的七十六人，共計一百一十四人，佔殘碑題名總人數一百三十四的 84% 以上。總之，少數部族在殘碑題名的人數，比例上顯然是很

少數部族姓氏	人 數	與前姓氏相同的人的人數	合 計
夫蒙	29		29
王	8	6	14
白、帛	6		6
楊	6	11	17
僕蒙	4		4
張	4	1	5
雷	4		4
同蹄	3		3
李	3	1	4
爪	2		2
秦	2	11	13
樊	1		1
董	1	7	8
井	1		1
韓	1	1	2
司馬	1		1
總 計	76	38	114

大的。

碑陰題名中有些稀見的姓氏，例如馮翊相氏、扶風歷氏、馮翊維氏，是否少數部族的姓氏，無法確定。這些姓氏並未計算在統計表內。

上述十六個少數部族姓氏中最多的是西羌姓：一曰夫蒙氏，共二十九人，數目最多。二十九人中曾大夫拔蜀和曾大夫錯述二人，“夫”下並漏“蒙”字。“夫蒙”在《魏書》中作“不蒙”。《魏書·太宗



紀》記“秦常五年四月，河西羌酋不蒙娥遣使內附。”《羌姚萇傳》有安遠將軍不蒙世。《唐書·突厥傳》及《高仙芝傳》皆記“安西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贊。”《王摩詰詩集》有《送不蒙都護歸安西詩》，此不蒙都護卽《唐書》之夫蒙靈贊也。古無輕唇音，“夫”讀如“不”，故“不蒙”卽“夫蒙”。馮翊郡之有夫蒙羌姓至唐世仍然。《元和姓纂》云：“夫蒙，今同、蒲二州多此姓。”二曰僂蒙氏。《鄧太尉祠碑》題名中姓僂蒙者二人，此碑題名中又有四人。以此知僂蒙氏亦是馮翊郡西羌的大姓。三曰雷氏。《鄧太尉祠碑》題名中雷姓最多，共七人。此碑姓雷的四人。雷姓羌在馮翊郡亦是大姓。四曰同蹄氏。《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銅鞮縣。故城在今山西沁縣南十里。《後漢書·西羌傳》云：“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江統《徙戎論》云：“（西羌）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此東漢永初二年至五年（公元108—111年）間事也。滇零爲西羌先零之別種，此次起義，從北地郡東出，渡黃河至魏、趙二郡，然後南出軹關（河南濟陰縣北）至河內郡。其種人留居上黨郡者尙多，故《西羌傳》又記永初五年，“復以任尙爲侍御史，擊衆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誘殺降者二百餘人”。羊頭山在長子縣東南五十六里，爲沁水東源所由出；銅鞮山在沁州南四十里，爲沁水北源所由出。後者爲西羌屯聚之所，前者爲任尙擊殺降羌處。西羌以同蹄爲姓者，正以其族久屯聚於銅鞮山一帶之故。此羌經河東而至馮翊，疑與晉元康四年（公元294年）的郝散起義有關。《徙戎論》云：“近者郝散之變發於谷遠（今沁源縣）。《晉書·惠帝紀》，“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八月，郝散率衆降，馮翊都尉殺之”。此言郝散降後率衆至馮翊界而被殺。上黨在魏晉時爲匈奴、羯、羌雜居之地，郝散所領導的羣衆大都是這一帶少數部族。馮翊郡的同蹄姓羌可能卽從此時遷入。五曰井

氏。此碑只一人，卽井琕。“井”原作“开”或“元”，應劭音羌肩反，今關中音讀如“其”。《漢書·趙充國傳》，充國上書云：“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唐代顏師古注《趙充國傳》時據此二條判斷罕羌和开羌原來爲不同的姓族，至唐罕、开二姓合而爲一。從《廣武將軍口產碑》的井琕可以說明在前秦時，罕、开二姓仍然分離。到北周保定四年（公元 564 年），《聖母寺四面像碑（銘）》罕、开二姓已合而爲一，稱爲“用井”，卽罕开。凡此皆可補師古注之不足。按《趙充國傳》，开羌的原居地在金城郡的湟中和黃河之南，降漢以後他們被移置在天水郡的罕开縣（甘肅秦州南、或謂在秦安縣東北）。馮翊的罕、开羌當係東漢時從天水郡遷入的。

其次爲氐姓：一曰楊氏，爲仇池氐。《宋書·氐傳》云：“略陽清水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族。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始徙仇池。”《三國魏志》卷 30 注引《魏略》云：“至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從馬超爲亂。超破之後，（氐王）阿貴爲夏侯淵所攻滅，（楊）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陝西扶風縣北），今之安夷、撫夷二護軍所典是也。”按《魏志·張既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曹操命既徙氐人五萬多落出居於天水、扶風界中，卽指此事而言。此爲楊氏氐入關中之始。苻秦時，氐人楊安爲都督，鎮仇池；楊定爲領軍；楊璧爲苻堅寵臣，擢爲南秦州刺史（注一）。碑陰側題名，稱部大者六人，卽楊小方、楊赤平、楊秀、楊洛平、楊口、楊光香，其部族成分當爲氐族。此外，稱將軍者四人，參事者二人；錄事、寺門、功曹、賊曹、丁議者各一人，共十一人。其中不一定都是氐人，但其中有些是氐族則無疑。二曰樊氏，只一人，卽部大樊良奴。《苻堅載記》云：

（注一）《晉書·苻堅載記》。

“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勳于苻氏。”苻生氏將強懷，其妻爲樊氏。可知樊氏爲氏族大姓。三曰韓氏。碑陰部大韓秉世一人，當爲氏族。此外，還有參事韓榮一人，丁議韓友生一人，此二人可能也是氏族。苻堅時有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鎮代郡平城。此人正是苻秦分封族類於諸方要鎮時的大將，當爲氏族。此外，試讀《苻堅載記》上以下一段分封族類支胤於諸方要鎮一段，便知尚有許多姓氏，表面雖似漢姓，但實際是族類支胤，爲氏姓。原文云：

“堅以關中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變、武都、洮、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於代郡之平城。中書梁謙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槍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

上文“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記載不詳，當參考《通鑑》卷104及胡注。《通鑑》云：“長樂公丕領氏三千戶，以仇池氏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九變氏酋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樂世卿。……膺，丕之妻兄也。午，膺之妻父也。”此楊、齊二氏當爲氏族大姓無疑。可爲上述楊氏爲氏姓之證。又云：“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氏戶三千。興、

騰，並苻氏婚姻，氏之崇望也。”又知毛、王二氏亦爲氏姓。碑陰題名王氏稱部大者八人，如王卯多里、王稠兒、王先多等皆不似漢人名。南安王准，從地望言，更有氏族的嫌疑。因此我們把王姓亦當作氏族大姓而加以論列。但王氏不特爲漢族大姓，馮翊羌族亦有以王爲姓者，如北魏的鉗耳王氏世家卽其一例。題名中有馮翊王買，此人是漢，是氏，還是羌族，很難辨別。《通鑑》對平州刺史石越及幽州刺史梁讜二氏的來源未加敘列，然《呂光載記》云光妻石氏，光之甥名石聰；《苻生載記》立妻梁氏爲皇后，《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以爲梁氏卽左僕射梁安之孫女，其它仕至高位者尙有梁楞、梁平老、梁殊等，那麼石、梁二氏亦是苻呂氏的婚姻之家，並是氏之崇望了。碑側題名中有石靈，疑亦氏族姓氏。

再次爲起源於龜茲國王姓氏之白氏或帛氏。白氏爲龜茲王姓氏，在後漢建初、永元中（公元76—104年）有白霸，其後裔有白英、白純等（注一）。龜茲人之入關中始於西漢。《漢書·地理志》上郡有龜茲縣。師古注云：“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漢代的龜茲縣在今陝北米脂縣，其地與南面的馮翊郡密邇相接，一部分龜茲人南徙進入馮翊是可以推知的。此碑陰題名以白或帛爲姓者六人：白安、帛初、帛大谷、白禽、白國、白平君。白安的官銜是“翊（或翊）威將軍曾大”；白平君的官銜是“大人”。曾大和大人都是少數部族首領的官銜。帛初和帛大谷的上銜已經脫落，按前後文例當是部大。《苻登載記》，新平胡空堡（邠州西南）以東有帛蒲堡，時爲屠各所居。然此堡爲帛蒲所築，按其姓氏，帛蒲亦應是龜茲人。又按《魏書》紀傳，白氏爲稽胡大姓，汾河以西的白亞粟斯可能亦是從上郡一帶遷過去的。稽胡本由匈奴、龜茲等族融合而成，所以白氏在北魏前稱龜茲胡，北魏及以後稱稽胡，並不矛盾。

（注一）《後漢書·班超傳》、《班勇傳》及《晉書·龜茲傳》。

最後，還有一些以部大為頭銜的姓氏，例如董、張二姓似為屠各族。由《苻登載記》貳縣屠各董成、張龍世可證。但《華陽國志》卷8稱氐叟中亦有董姓。又如李氏，碑側中李姓為部大者三人。此姓極為普通，巴氐中李姓甚多，匈奴、高車中亦有此姓，很難甄別其為何族。爪姓亦是稀姓，是一少數部族的姓氏。又碑陰題名內秦氏很多，居第四位。有二人稱部大，即秦度地、秦道成，當係少數部族，但不知其為何族。

總上《鄧太尉祠碑》及《廣武將軍□產碑》所述，結合《晉書·載記》等文獻記載，大致可以看出，當前秦前期，即公元四世紀七十年代苻堅滅前燕以前（公元370年以前），關中少數部族的分佈：氐族集中屯聚在三原、九鸞、汧、雍一帶，在長安的西北偏，正當涇水以西南的汧水流域。關中羌族的分佈主要在馮翊郡。前秦時馮翊郡領縣八，護軍四，大致都有羌族。在諸縣和護軍之內，馮翊護軍和郿城等縣的羌族最多。簡言之，即在長安的東北偏，今渭河以北至洛河中下游之地為羌族分佈的中心所在。在中部縣的西北有貳城，貳城的東西為屠各匈奴的分佈所在，各二萬多落，史稱之為“東、西曹”。在貳縣的西境有彭沛谷堡，彭氏為盧水胡大姓。新平（邠州）西南有胡空堡，其東為姚奴、帛蒲二堡，前秦末年並為屠各帥所據。此外，還有新平羌雷惡地。以此知涇河以東北，盧水胡、屠各、西羌皆分堡而居，情況頗為複雜。北地、馮翊二郡間的馬蘭山，部族種類亦多。有馬蘭羌，亦稱北羌，即《鄧太尉祠碑》所云之黑白羌。有屠各胡，亦稱“定陽、貳城胡”。又有盧水胡，晉元康六年以郝度元為首所領導的各族起義，盧水胡當為其中的主要部族之一。

十六國時關中的少數部族皆集中在渭河以北各地。氐族集中在扶風郡和咸陽郡的西北，羌族集中在馮翊郡，北地、新平二郡和馮翊郡的西部則為屠各、盧水胡、西羌、北羌所雜居。以實力言之，

氐、羌人數最多，實力亦最強。其次為屠各和盧水胡。自此而外，都居於少數部族的少數了。以氐與羌相較，氐在關中的戶口，如《苻堅載記》敘述，至少在二十萬戶以上，而西與氐族的根據地之略陽、武都、仇池三郡相連毗，故能東西呼應，伸縮自如。氐豪苻氏早年既稱霸於關中，晚歲更藉此而統一華北，其部族形勢奪人，遂至如此。且漢代的武都氐居關中通蜀漢的要道，氐人生息其間受漢族的影響最深，語言多已漢化，姓氏亦模仿漢族，又“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着衽露，……衽露有似中國袍”（注一）。從此便可理解苻堅執政時為什麼典章制度多法魏晉，又為什麼容易與三秦大戶經常合作，共同統治北方的各族勞動人民了。羌入關中雖為時甚早，但一入關內便與湟中、南安的西羌隔絕，其經濟文化條件皆不如氐。苻堅自澗水戰敗後，姚萇求傳國璽，堅叱之曰：“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注二）此雖苻堅憤辭，不足為據，然當時羌的地位不如氐，亦昭然若揭。但當時羌的地位僅次於氐，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前秦之治關中，文物制度雖宗魏晉，而將帥吏屬則多憑羌人。這種情況在《鄧太尉祠碑》及《廣武將軍□產碑》都充分反映出來。在馮翊護軍鄭宏道的部吏下面，西羌人為軍參事者一人，軍門下督一人，軍功曹者一人，軍主簿者八人，軍錄事者四人，功曹書佐者三人，部大一人，共十九人，占軍吏總數二十九人的 68% 以上。《廣武將軍□產碑》內，西羌人稱將軍者六人，稱酋大、部大者三十五人，共四十一人，佔少數部族將吏總數七十六人的 54%。不只地方政權如此，就是前秦的國家政權亦有不少的羌人參加其中。苻堅的祖先苻洪，其母姜氏（注三）。

（注一）《三國魏志》卷 30 末注引《魏略·西戎傳》。

（注二）《晉書·苻堅載記》下。

（注三）姜氏一般認是羌姓。但氐族中亦有姜氏為大姓。《梁書·武興國傳》云：“其大姓有苻氏、姜氏。”《周書·氐傳》有氐酋姜多。

《御覽》卷 361 引《三十國春秋》云：“其母姜氏，因寢產洪，驚悸而寤。”苻健之母姓羌氏。《晉書》本載記稱“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此姜氏與羌氏應皆為羌姓，可知氏羌早為互婚之族。苻生之時有侍中丞相雷弱兒，《晉書》本載記云：“弱兒，南安羌也。”苻堅時，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益州刺史歛岐（注一），並是羌人。又《前秦錄》有南巴校尉姜宇，為天水冀人，少為人牧羊。由姓氏、郡望和職業言之，亦似一羌人。姚萇為苻堅之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姚興為太子舍人。從上述種種可以證明，前秦一代氏、羌的上層階級自始至終聯合起來共同統治關內外廣大的各族人民的。羌族的統治階級繼苻秦之後，成立後秦政權，又統治了西北三十多年。這一事實也可說明羌族的勢力僅次於氐族。

最後略述前文所提到的一個問題，即苻秦時關中的編戶與雜戶。西晉上承漢魏，把民戶分作編戶和雜戶兩種。編戶包括士籍、民籍等，正式編入一定的郡縣城鄉，對政府有納租義務，一般稱為正戶。雜戶普通包括營戶（兵家）、雜工戶、醫寺戶等；在有少數部族雜居的地區又包括“雜胡”（注二）戶。他們一般沒有耕地，對政府只有服役的義務，如兵役、工役、差役等。這般人雖然也有戶籍，但其身分較低，故以雜戶為名。關中的“雜胡”戶有羌戶、氐戶以及鮮卑、盧水、西域胡、苦水等戶。如《鄧太尉祠碑》所云，在馮翊護軍的管轄區內，就有“雜戶七千”。若以關中各地言之，“雜胡”戶的總數更為龐大。但並非所有“雜胡”或“夷類”都是雜戶。同一部族之內，有編戶，也有雜戶。即如比較落後的羌族，如《鄧太尉祠碑》內的諸

（注一）苻堅載記云：“羌歛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可知歛為羌姓。

（注二）雜胡在晉代往往總括各少數部族而言。《晉書·姚興載記》，“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當作貳城）雜胡皆應之”。上郡、貳城雜胡應包括匈奴、盧水、北羌、西羌而言。

軍參事、功曹、主簿、錄事等等都隸屬於一定的城鎮，當然就不能稱為雜戶。只有隸屬於部大之下的羌戶，始為雜戶。欲說明此點，雖無直接的史料，我們可引《三國魏志·梁習傳》所敘述的并州胡為例。三國時留在并州的胡人仍然保留着部落的形式，直接歸他們的部落大人管轄，但同時也受地方官的統治。平時對官府“服事供職，同於編戶”，戰時則“發諸丁強，以為義從”，分別以大人和胡戶為“勇力吏兵”在各處打仗。十六國時關中部大統率下的“雜胡”戶大致也和三國時的并州胡一樣。但由於各部族的來源不同，同時又因為他們的政治條件和生產發展水平也不一樣，所以有的部族比較早就變為編戶了，有的部族大部分仍然停留在雜戶狀態。例如關中的氐、羌，羌族入關雖然很早，但不是跟着部族首領在各地起義，便是聽從統治階級的命令出外打仗，所以在前後秦時羌族的雜戶和營戶都很多。反之，氐族的入關比較遲些，但在晉初已成為編戶。咸寧三年（公元 278 年），《晉書·扶風王駿傳》記“徙封扶風王，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扶風國的封戶主要是漢族編戶，傳裏特別提出以氐戶增封，我看和《苻堅載記》裏以“毛興為河州刺史，王騰為并州刺史，二州各配支戶二千”相同，當時的氐戶還是雜戶。但成為封戶以後，不受安夷、撫夷二護軍的重兵役壓迫，很快就變為編民了。隔了近二十年光景，到元康六年（公元 296 年）關中發生了氐帥齊萬年的稱帝事件。潘安仁在《關中詩》的《詩表》上說：“齊萬年編戶隸屬，為日久矣”（注一）。在《馬汧督誅》裏又說：“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民之氐又肆逆焉”（注二）。可知作為關中氐分佈中心的扶風氐在晉咸寧中就成為編戶了。馮翊郡是西羌分佈的中心。《晉書·地理志》稱馮翊郡八縣的戶只七千七百，僅及扶風

（注一）《文選》卷 20 潘安仁《關中詩》李善注引。

（注二）同上書卷 57 潘安仁《馬汧督誅》。



國六縣戶二萬三千的三分之一略多，想是未把羌雜戶計算在內。直到苻堅之時，少數羌人從雜戶中分化出來，成為城鎮的編戶，大部分的羌族雜戶仍在本族大姓部大的統治之下，過着落後的部落生活。因此可以看出，政治壓迫和兵役剝削是使羌民落後並與漢族難於相互融合的主要原因。

### 三 北朝前期的李潤羌和北魏 造像題名的四種方式

在北魏前期，即太和年間以前，關中也和其它地區一樣，沒有造像題名之風。在太和年間最初首創建寺造像題名之風的，就是出身於馮翔李潤羌曾大姓的宦官王慶時（遇）。他在李潤鎮的北鄉（今澄城縣北寺村）造暉福寺三級佛圖。建寺造像的目的，第一是為“二聖”（文明太后和孝文皇帝）祈福，第二是為父兄子弟消災，總之，這是一種佞佛、媚主而又浪費的行為。但此風一開，關中州郡的不少貴族和平民都仿效之而在寺廟裏造像題名了。有的一人或一家造一像，把自己和家屬的姓名刻在佛像的背上和下面；有的是數十、百家合造一像或數像，把造像人的姓名（有時連家屬的姓名）刻在佛像座或碑陰、碑側上面，有時把造像人的像也刻在姓名的旁邊。造像的盛行是由國內階級矛盾和部族矛盾所爆發的多年戰爭而發生的。各階級階層的人們在現實的政治、經濟生活上得不到滿足，因而希望釋迦幫助，在來世得到快樂。從北魏太和年間到隋初所有造像銘文都反映這一點。但我們研究造像題名的目的並不在此。我們的目的，是想通過造像題名，看出古代部族在某一地區的分佈，部族階級階層在一定時期的分化，各部族的聚族而居的情況和各部族之間的雜居情況、婚姻關係以及各族姓氏的變化等等。上述各種事實如果能够弄得清楚，我想對於部族遷徙史、部族關係史、部族融合史的理解，會有或多或少的幫助。

自王慶時建暉福寺之後，關中各部族的上層人物亦漸興造像

之風。最初的造像人是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 年）在北雍州（今耀縣）造像的姚伯多（注一）。南安姚氏爲羌族大姓，唯姚伯多究係漢人，或係羌人，皆無法證明。此後從北魏神龜二年（公元 519 年）至西魏大統十年（公元 544 年），我們收集到的造像題名碑文共有八種。此八種造像題名可以分爲四類：第一類是家屬造像，如《夫蒙文慶造像銘》、《雷漢王等造像記》、《焦延昌造像碑》等都屬於此類。通過這一類的題名可以看出各個家庭成員的組成，婚姻的關係和一部分成員的官爵。第二類是同邑同族同姓人的造像，如《雷樹等五十人造像銘》是。從此可以看出同族同姓人聚族而居的情況。第三類是同邑同族異姓人的造像，如《邑主儁蒙□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記》是。第四類是同邑異族異姓人的造像，如《邑子羅暉造像題名》、《邑子廿七人造像記》都屬於此類。從上述二類，不只可以看到同族和異族各姓的雜居情況，而且可以看出各姓之中和諸姓之間的階層分化關係。

現在我們首先論述一下關中李潤羌的重要和李潤堡的所在地問題。

前節已經說過西羌入關最早，戶口分佈最廣，他們的實力在前秦時僅次於氐人。關中的西羌主要集中在馮翊郡所屬諸堡，而馮翊郡的諸羌又以李潤羌爲中心，故自前秦以來，李潤堡的得失往往關係於長安之安危。姚萇在滅苻堅以後，佔據長安，爲了監視北地、馮翊二郡酋帥大姓對長安的威脅，遣其親信安北將軍姚當成鎮杏城，鎮東將軍姚漢得鎮李潤堡，以爲關中根本之計。但當時苻秦的殘餘勢力尚未消滅，苻氏的故將魏弼飛率氐胡數萬人圍攻杏城，新平羌豪雷惡地與弼飛相應，同時又圍攻李潤堡。姚萇看到形勢危急，所以說：“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弼飛，東結董成，若得

（注一）陝西金石志卷 6 有《姚伯多造像記》。

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注一)。從這段話可知當時的李潤堡是非常重要的。此堡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由於它是西羌分佈的中心。在姚興時，看到李潤羌的豪族大姓始終不附於己，於是乾脆把這一帶的羌人遠徙於安定等地。但是不久之後，羌酋党容率領所部東還，重新又佔領了李潤。姚興出兵征伐，徙其豪右數百戶於長安。到姚泓時，李潤堡終不能守，由姚宣率領一部分兵民離開李潤，南保邢望(在李潤堡南四十里)(注二)。後秦時李潤羌兩次被徙，一次被征伐，實力並未削弱，終於迫官兵南遷，可知這一帶的西羌實力是如何雄厚了。

姚秦亡後，劉裕和赫連勃勃爭奪關中。勃勃佔領了長安，分關中郡縣爲數州，以豫州牧坐鎮李潤(注三)。此堡仍是統萬與長安間一軍事政治的要鎮。

在北魏建國的初期，馮翊和杏城的羌豪紛紛投降北魏。如泰常四年(公元419年)六月，“司馬德文建威將軍河西太守馮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內屬”。五年(公元420年)四月，“河西屠各帥黃大虎、羌酋不蒙娥遣使內附”。十二月，“杏城羌酋狄溫子率三千餘家內附”。但至始光三年(公元426年)魏將奚斤占領長安時，史稱“秦雍氐、羌皆叛”。(注四)這次秦、雍二州的“叛羌”大致包括李潤羌在內。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杏城爆發了盧水胡蓋吳所領導的反魏運動。《世祖紀》云：此年九月，“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十月，“長安鎮副將元紇率衆討之，爲吳所殺，吳黨遂盛”。十有一月，“蓋吳遣其部落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夷酋皆聚衆應之，殺濟城守

(注一)《晉書·姚萇載記》。

(注二)《晉書·姚泓載記》。

(注三)《晉書·地理志》雍州條。

(注四)《魏書·太宗明元帝紀》。

將，吳遂進軍李潤堡，分兵掠臨晉”。杏城，《元和郡縣志》云“在中部縣西南五里，坊州西七里”。中部縣即今之黃陵縣，坊州舊治在縣治東南。李潤堡更在其東南，故《世祖紀》謂蓋吳進兵李潤堡後，便分兵取得臨晉。因為李潤羌在此時參加了蓋吳的反魏運動，所以拓跋燾於次年（公元446年）二月肅清了渭河南岸的“與蓋吳謀者”，三月便北渡渭河、洛水，“分軍誅李潤叛羌”。李潤羌既下，即於其地置澄城郡，領縣四，即澄城、五泉、三門、宮城是也（注一）。《魏志》謂澄城有杏城，無李潤堡，乃魏收不明當時關中地理沿革之誤。北魏初，澄城郡屬秦州，至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始分秦州之華山、白水、澄城置華州。華州的州治仍在李潤堡。關於華州設治於李潤堡的沿革，景明初年（公元500年）的華州刺史元燮於奏表中曾詳言之云：

“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成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鎮立郡，依岳立州，因藉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翔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惟西蕃輿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乃至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譟諍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翔面華潤，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為己，不以為勞。……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注二）。

從此華州的州治始移於今同州大荔城南之馮翔廢縣。北魏華州之在李潤堡設治，我想與鎮壓當地西羌的豪右大族有密切關係。

被鎮壓後的李潤“叛羌”，如何處理，史無明文。唯《魏書·閹官

（注一）《魏書·地形志》謂領縣五者，太和十一年又置南五泉縣。

（注二）《魏書·安定王休附子燮傳》。

王遇傳》(與《北史·恩倖王遇傳》略同)記載李潤羌原來的盛況以及王遇父子的遭遇頗堪玩味。傳云：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俱為羌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改為王焉。自晉世已來恆為渠長。父守貴(注一)為郡功曹，卒。遇既貴，追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澄城公。遇坐事腐刑，為中散，遷內行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拜尚書，轉吏部尚書，仍常侍例降為侯，出為安西將軍、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王遇是北魏太和前期的宦官，曾監修文明太后陵廟及新都洛京的太極殿等，傳稱其“雖在耆老，朝夕不倦，卒於官”。王遇的卒年當在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遷洛的前後。上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只四十八年，則王遇的“坐事腐刑”，顯然和拓跋燾的征服李潤有關。傳稱王原姓鉗耳氏，“與雷、党、不蒙俱為羌中強族”。又云“自晉世以來恆為渠長”。然則鉗耳氏之在李潤鎮，正如上文所述馮翊羌酋黨道子、不蒙娥之倫，對北魏有所不滿、起兵反抗者，正是此輩。北魏鎮壓他們以後，闕王遇為宦，與唐代之征嶺南，闕嶺南豪族子弟楊思勳、馮潘州、高力士(注二)為宦者亦復相同。遇父守貴曾為“郡功曹”，係北魏前的官秩，疑即赫連夏或姚秦時之馮翊郡功曹。郡功曹的官秩雖微，但由《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證明往往由部大、酋大所兼任。《王遇傳》稱守貴為郡功曹，而不言其為渠長、部大、酋大者，或與掩蓋北魏出兵之誅李潤

(注一)《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碑陰題名云“父佛弟子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澄城公王□隆”，與守貴之名不合。參考民國十五年(公元1926年)《澄城縣附志》卷10。

(注二)參看唐《楊思勳墓誌銘》、《馮潘州墓誌銘》、《高力士碑》等。前二種墓誌銘存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後一種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100。

羌和腐闐王遇爲宦者的事實有關。

從文獻資料，我們所知的李潤羌止於此。再比合太和十二年（公元 488 年）的《宕昌公暉福寺碑》言之，又可解決多年以來我們所不易解決的一問題，即關中李潤堡之所在地是也。《北史》以李潤鎮在馮翊東；《方輿紀要》卷 3 及卷 54 皆以李潤鎮在同州之東北，里距皆不能指出。《晉書·姚萇載記附注》論證李潤堡的所在地云：“《曉讀書齋雜錄》曰：《陝西圖經》李潤鎮在大荔縣西北，而無里數。今考《北史·魏安定王休傳》，子燮，除華州刺史。州時居李潤堡，燮請移馮翊古城。案馮翊舊治高陵，此云古城，蓋即高陵故城，在今縣西南者也。《北史》又云：馮翊東有李潤鎮。是李潤在馮翊之東。臨晉之西北不出百里，自李潤鎮西北，則洛川縣界矣。”此注所述，模稜兩可，莫衷一是。諸說之所以紛紜，乃由於對馮翊古城的解說不確。西漢的左馮翊治所在長安城中，見潘岳《關中記》。東漢定都洛陽，馮翊郡出治高陵。此一變也。至三國魏時，魚豢《魏略》云：“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此言建安初馮翊郡移治臨晉，魏、晉因之（注一）。此又一變也。《魏書》華州刺史元燮所說的“馮翊古城”，乃指魏晉時之臨晉，非東漢時之高陵。臨晉西北五十里有許原，西五里有洛水，所謂馮翊古城在“許、洛水陸之際”者以此。高陵在渭水北岸，距離許原、洛水俱遠，顯然不是元燮所說的“馮翊古城”了。若以東漢馮翊之治高陵而論，《北史》以李潤鎮在馮翊東之說可以成立；若以魏晉馮翊之治臨晉而論，《陝西圖經》以李潤鎮在大荔縣西北亦能成立。《方輿紀要》昧於馮翊郡治有東漢及魏、晉之別，簡單以爲馮翊郡治在同州，因而得出結論謂李潤鎮在同州之東北，則全然不合於事實了。

（注一）參考《晉書·地理志》及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雍州馮翊郡部分。

古籍中最初指出李潤鎮的方位者，為唐代賈耽的《郡國縣道記》。此書在宋初猶存，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28，關西道四，同州條記北魏置華州事云：“按《郡國記》云，自今奉先縣東北五十里李潤鎮，分秦州置華州，理於此”（注一）。賈耽分秦州之華山、澄城、白水置華州之說，本自《魏書·地形志》；治李潤堡則本自《安定王休附子變傳》。賈氏更能結合唐代地理現狀指出李潤堡在奉先縣東北五十里。這種貢獻為前後數百年諸治地理沿革者所不及。唐代的奉先縣建置於開元四年（公元 716 年），以葬睿宗於蒲城縣西北三十里之豐山，為橋陵，故改縣名為奉先。由縣治而東北五十里入澄城縣境之李潤鎮，則鎮在澄城縣治之西南明矣。欲證實此說，太和十二年的《宕昌公暉福寺碑》為絕好資料。清代光緒年間揚州毛鳳枝著《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在第八卷內企圖以《宕昌公暉福寺碑》的所在地澄城，證明古代的李潤鎮即在澄城縣內，這種說法顯然是有見地的。然他對《寰宇記》的引文表示懷疑，並認為澄城在同州府城的東北，俱屬錯誤，今不可不辨。按《宕昌公暉福寺碑》云：“於本鄉南北舊宅上為二聖造三級佛圖各一區，規崇爽塏，擇形勝之地，臨沃衍，據脩剛（注二），面脩嶽而帶洛川，佩黃河而負龍門。伐良松於華嶽之陰，掇文瑤於荆山之陽，旌功銳巧，窮妙極思。爰自經始，三載而就。”碑文所云造像地區，“面脩嶽（即華岳）而帶洛川，佩黃河而負龍門”，與澄城的地勢完全相合。暉福寺在澄城縣何方，碑無記載。據李子春先生云，此碑現在澄城縣南門內一初級中學內。這已經不是碑的原在地了。舊《澄城縣志》云：“暉福寺在澄城縣北北寺村，宋太和十二年建。”“宋太和十二年”顯係“北魏太和十二

（注一）今中華書局出版的《漢唐地理書鈔》收入王謨所輯《賈耽郡國縣道記》，正缺此條，宜補入 297 頁同州條的後面。

（注二）“剛”為“岡”或“崗”之誤。



年”之誤，唯云暉福寺在縣北北寺村則頗堪注意。若以《郡國縣道記》為準，李潤鎮在奉先縣東北五十里，今蒲城縣距澄城縣一百一十里，則李潤鎮的治所在澄城縣的西南和蒲城縣的東北甚明。但李潤堡自十六國前秦時即為長安東北重鎮，赫連夏既設豫州牧於前，拓跋魏更置華州刺史於後，其範圍當不限於澄城和蒲城間的幾個村鎮，所以王慶時雖世居澄城縣北亦不妨以李潤羌見稱了。幸而上述若干文獻對李潤鎮的地形都有所描繪。如《暉福寺碑》云：“臨沃野，據脩剛。”又如《安定王休附子傳》云：“居岡飲潤，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希望考古工作者能在澄城縣進行若干時的地形考察，我想李潤堡、李潤鎮的城郭當不難大白於世。

敘述李潤羌和李潤堡既盡，跟着敘述一下北魏時造像的四種類型，即家屬造像、同族同姓人的造像、同族異姓人的造像、異族異姓人的造像等四個類型。

北魏的家屬造像碑銘，導源於太和十二年的《宕昌公暉福寺碑》。在碑文後面羅列了王慶時的父一人、兄三人、兄子二人和自己的長子、次子二人的姓名和官秩。這一風氣一直為關中諸部族的家屬造像所承繼。《夫蒙文慶造像銘》是像主夫蒙文慶為追薦其亡父道明和亡妹光姬而造像的，但題名內牽涉到他的高祖以下的祖妣和當時的合家大小。從這幢碑銘上看到的，是祖父、父和自己的三代婚偶的姓氏。祖父的妻覺氏，母的姓雷氏，妻的姓雷氏，這說明北魏時的關中西羌仍保持着同族異姓的婚姻習慣。《雷漢王等造像記》因漫漶過甚，許多字形無法辨識。唯題名中若干地名頗足引起我們的注意。像主的祖父雷支油，北地郡□令，□作“弔”，不識何字。父雷漢王，雲陽令，亦屬北地郡。像主的官爵為“□州建忠郡安□(作‘晃’)縣侯，年七十六，今□(作‘啟’)忠部(確係部字，非郡字)太守”。按建忠郡在今三原縣，北魏永安元年(公元528年)所

置。《太平寰宇記》卷 31 三原縣下引《周地圖記》云：“孝明孝昌三年（公元 527 年）蕭寶夤逆亂，毛洪賓立義柵捍賊。永安元年於此置北雍州。以洪賓爲刺史，俗謂之洪賓柵。其年又割北地郡之三原縣於此，置建忠郡，屬北雍州。”據此，則雷漢王等之造像乃在建忠郡成立之後一年，碑銘“建忠郡”以上當爲“北雍州”。安□縣爲建忠郡內之一縣，在三原縣內或其左近。此碑銘之發現並可以證明《隋書·地理志》建忠郡爲北周所置之說爲無稽。像主之祖若父於《魏書》皆無徵，然《北史·毛遐傳》云：“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爲酋帥。與弟鴻賓聚鄉曲豪杰，遂東西略地，氐羌多附之，共推鴻賓爲盟主。”則雷支油、雷漢王原皆羌中之酋帥，至像主乃歸附毛鴻賓，故得封爲北地郡安□縣侯，又假以忠部太守。《焦延昌造像記》據王昶在《萃編》卷 32 中考證，焦氏爲關中富平縣的大姓，故斷定此碑出自富平。我們所注意的是焦延昌男系家屬的官秩和女系家屬的姓氏。延昌的祖父是“故曹烏勾雷平眞將軍、第一領民酋長”；父拔拔是“西夏朔方郡功曹”。從祖父的官秩和父名拔拔的官秩言之，焦氏爲北朝少數部族無疑。祖母和母親皆姓呼延。此姓在漢時爲匈奴的大姓，即呼衍氏，到了隋唐成爲鮮卑的姓氏。妻張氏，雖似一漢姓，但名“安姬車”，又是一少數部族的名字。祖父爲北魏的第一領民酋長，父爲朔方郡功曹，二人又與呼延氏通婚，則焦氏頗像一鮮卑姓或鮮卑化了的胡姓。但焦氏爲《魏書·官氏志》所不載，可知《魏志》中的漏失是很多的。焦氏在富平縣者，除焦延昌一家外，還有沙彌焦法清、焦法顯、焦法興、焦雙洛和比丘焦法玉等，見《曹續生造像記》。可知此鮮卑姓焦氏在富平縣爲一大族。

同邑同族同姓人的造像以《雷樹等五十人造像銘》最爲典型。此碑雖無年月日記載，然由字體言之，其爲北魏造像無疑。碑

上題名者共四十五人，作五十人，皆爲雷姓。此碑題名的特點，只有男性，無女性，若婚配的女性參加其間，就不成其爲同族同姓的造像題名了。此碑的貢獻，在於它提供了許多關於北魏官秩和地理的知識。像主雷樹的官銜是“前將軍左銀青光祿淮州苻壘縣令、汝南郡丞、假懷州刺史都督”。《魏書·官氏志》云，前將軍與光祿大夫銀青者爲第三品；上州刺史亦第三品。雷樹是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淮州刺史下之苻壘縣令，其秩品當在第八至第六品之間。汝南郡丞，屬河南郡一級，亦第六品。懷州刺史都督，官品大致相當。題名之有官秩者，除雷樹外，還有趙州功曹雷伏敬和魯陽郡守雷□周。

現在敘述一下上述諸州、郡、縣的沿革和位置，便可推測《雷樹等五十造像銘》碑建立的朝代。依《魏書·地形志》，苻壘縣屬於廣州汝南郡。苻壘縣下注云：“太和中置，有沙水。”沙水即今河南中部魯山縣南五里之沙河。從此知苻壘縣在今魯山縣境內甚明。汝南郡以在北汝河之南得名，《地形志》云，“永安元年（公元 528 年）置，治苻壘城”。廣州初置於太和二十三年（公元 499 年），見《魏書·高祖紀》。在此以前，曾置荊州；以後又改置魯陽郡；至永安二年（公元 529 年）復置廣州。由此知從太和至永安間，苻壘縣或屬荊州，或屬廣州，從未屬於淮州者。考北魏時淮州有二：一淮州治淮陰城，此淮州在今江蘇北部，當無遠轉河南中部的汝南郡苻壘縣之理。又一淮州爲西淮州，治白狗堆，在今河南南部眞陽縣（正陽）之東南，對苻壘縣較前一淮州爲近。故管轄苻壘縣的淮州當指西淮州而言。但《地形志》西淮州下只有一郡，即淮川郡，無苻壘縣。苻壘縣何時屬於淮州，史無明文。按西淮州的鄰縣新息縣北魏曾置東豫州。《魏書·張普惠傳》記正光中（公元 520—524 年）普惠出爲東魏州刺史。時“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部異縣之民錯

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普惠減括之政似只及淮南，然從正光迄於魏末，河南州郡土曠民稀，十羊九牧，紛散之狀至為繁曠。苻壘之屬淮州或亦類此。此外，趙郡屬殷州，魏明帝時置，治平棘，即今河北趙州。懷州，魏獻文帝天安二年（公元 467 年）置，治野王，在今之河內。以上二地俱在華北東方，自北魏分裂後便歸入東魏、北齊。若關中造像人雷伏敬和雷樹為西魏、北周時人，當無出仕趙郡與懷州之理。據此推斷，雷樹等之造像應在北魏分裂以前無疑。

同族異姓人的造像在北朝、隋、唐各地甚為普遍，不足為奇。唯全部是羌族婦女，無一男性邑子（除僧衆沙彌外）參加其間，那只有北魏永熙二年（公元 533 年）北雍州宜君郡黃堡縣（在今銅川縣）的《邑主佛蒙口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記》了。按一般史志對北雍州宜君郡的建置皆閃耀其辭（注一），黃堡縣之名更不見於著錄。今銅川市南十里公路上有黃堡鎮，此鎮距古代北雍州的州治華原（今耀州）為近，我想今之黃堡鎮就是北魏時的黃堡縣。一般造像題名，實際題名的人數少於造像記所說的人數。此造像題名相反，實際題名者五十七人，比造像記所說的人幾乎多了一倍。多的原因，一部分是佛寺的僧尼官，有十六人；一部分是死亡了的清信婦女，有六人。去掉這些人，餘三十五人，便與造像記所說的人數相近了。她們既是村邑中的婦女，大部分是從外村外姓中娶來的，所以姓氏非常龐雜。其中姓同瑀者二十三人，人數最多。其次，姓佛蒙、夫蒙、覺者各四人，姓荔非、雷、鉗耳、王者各一人。以上皆為羌族的姓氏，共三十八人，佔題名者全數的 66%。此外郭、朱、田、于、劉、成、楊等姓各一人，可能都是漢姓。另外還有姓氏被磨滅不清的八

（注一）《魏書·地形志》，宜君縣屬北地郡。《方輿紀要》卷 57 云：“太平真君七年改置宜君縣，屬北地郡。尋置宜君郡。”其它史志提到宜君郡的很少。

人，這八人大多數應係羌姓。總之，黃堡縣的上述造像是由多數的羌姓婦女和少部分的漢姓婦女建立的。因此可以推測黃堡縣的這一村邑是以羌族為主而又與少數漢族雜居的一個地區。有漢姓的婦女參加造像，只能說明羌、漢兩族的宗教信仰相同，並不能進一步推測漢羌聯婚。因為在村邑之內既有漢族雜居，上述參加造像的漢姓婦女可能都是嫁給村裏的漢族男子的。

同邑異族異姓人的造像有二幢：一是北魏藍田縣的《邑子羅暉造像題名》；又一是西魏長安東郊的《邑子廿七人造像記》。《邑子羅暉造像題名》石已殘缺，無年月可考。從姓氏言之，與十六國前後秦時的氐羌大姓關係密切，一般人皆稱之為北魏遺物。全碑題名可省識者約五十餘人。其中屬於羌姓者三：一為姚姓，共十五人；二為雷姓，只一人；三為姜姓，亦只一人。屬於氐姓者四：呂姓二人，苻、石、楊等姓各一人。其餘則皆為漢姓。藍田本非氐羌集中分佈之區，然以北近馮翊，西臨長安，故氐羌大姓往往有之。

《邑子廿七人造像記》碑出自舊咸寧縣南關，今西安市東郊。碑左有書“邑師比丘僧習”，習係古辯字，亦作審。碑右角已毀，只餘“太歲在甲子六月八日造訖”。陸增祥《金石續編》根據字體款式與《曹續生、吳神達造像記》相同，斷定碑上的甲子為西魏大統十年（公元 554 年）。碑上題名連同僧習共十六人。其中康姓三人，即康萇、康元口、康元高；支姓一人，即支曜。康、支並是西域胡的姓氏。《晉書·姚興載記》記：“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氐、胡數百家，奔上洛。”此言白鹿原有西域胡及氐。《水經注》云：“白鹿原在霸川西。”此霸川即今之灞水。古代的白鹿原東西南北俱長。《方輿紀要》引《雍勝錄》云：“白鹿原者，南山之麓，坡陀為原也。東西十五里，南北二十里。霸水行於原上，至於霸陵，皆此原。”《咸寧縣志》謂“縣東互韓森、元興、狄寨、曹家堡四社之境，其東西接藍田”，

皆爲此原。碑題名中之康、支二姓固然原來皆是白鹿原上的大姓，就是《羅暉造像題名》中的呂、苻、石、楊諸氏姓亦在原之東南的藍田縣境內。載記所云康宜驅略白鹿原氏胡南奔上洛正由於此。碑題名除康、支外，有袁姓四人，張姓二人，賀、劉、韓、魏各一人，大致都是漢姓。還有一人姓弋，不知是何族姓氏。

北魏、西魏關中造像題名的四種方式大致如此。

關中在此時期的造像人主要是漢人和羌人，沒有新從關外來的鮮卑以及其它北鎮雜胡參加這種活動。一直到北周時，鮮卑和雜胡的造像之風始逐漸開展。此點就是我們下一節敘述的主題。

## 四 北朝後期鮮卑雜胡入關後的聚居和散居

自始光三年(公元 426 年)北魏佔領長安以後，拓跋鮮卑的文武官吏和一部分兵丁不斷向關內移居，但這些遷徙是少量的。北方鮮卑諸族的大量入關，在東西魏分裂的前後。分裂的前七年，即建義元年(公元 528 年)，爾朱天光奉命鎮壓關隴各族人民的起義，率領賀拔岳軍團和侯莫陳悅軍團入關，這是北方諸族大量入關的第一次。賀拔岳軍團是由武川鎮的軍官和兵丁組成的，軍官有賀拔岳、念賢、寇洛、宇文泰、趙貴、侯莫陳崇、梁御、若干惠、王德、韓果等，他們的部族成分雖各不同，然都出身於武川鎮的軍人，鮮卑化的程度很深。另外還有些軍官如劉亮、達奚武、王雄等，不出身於武川，但其祖先或為領民酋長，或為北鎮守將，其鮮卑化的程度與賀拔岳等殊無二致。侯莫陳悅軍團的組成人物較為複雜。悅的祖先係出鮮卑別部的侯莫陳部，世居庫斛真水流域。此水在拓跋部的南方，故《魏書·官氏志》稱其地居民為“次南侯莫陳氏”。悅的部將李弼、豆盧寧、豆盧光都是遼東人，豆盧氏且是白部鮮卑的姓氏。悅的女婿元洪景，按其姓氏應是拓跋鮮卑。此兩軍團的將領如此，其所屬吏兵的部族成分可知。兩軍團的兵士約合三、四萬人，除了一小部分跟爾朱天光回到關東外，大部分都留居關中了。其次，永熙三年(公元 534 年)分裂為東西魏，魏孝武帝元修帶了文武官僚與所謂“六坊之衆”的禁衛軍來到關內長安，此為北方諸族大量入關的第二次。在入關的前二月，元修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騎官廂別二百人，關內部曲數千人，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與王

思政等統之”(注一)。到了永熙三年七月，元修親統六軍十餘萬準備入關。中途六軍逃亡者過半，《隋書·食貨志》云“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當時入關的貴族官僚，有南陽王元寶炬、廣平王元贊、扶風王元孚、廣陵王元欣等(注二)，有異姓大臣斛斯椿、越勒肱(特)、長孫稚(一名承業)、獨孤信及賀拔勝等，先後都來到關中。這些貴族大臣大部分都帶有家屬、吏丁、部曲，有的如賀拔勝等還帶有大量的軍隊。總的來說，入關的北方諸族之人數是很多的。除此以外，河西和隴東原來就駐紮有很多的北方鎮兵和牧民，當關隴各族起義時，大部分參加了起義的隊伍。當賀拔岳、侯莫陳悅入關後，各族的起義軍相繼失敗，如万俟醜奴的部隊、尉遲菩薩的部隊、侯幾長貴下的部隊和牧民大部分都被官軍解散，編入官軍之內駐紮在關內各地。這是北方部族進入關內的又一淵源。

西魏和北周的軍事政治集中之區，也就是來到關中的北方部族的分佈之區。長安為國都所在，西魏和北周的貴族官僚和禁衛軍均集中於此。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以置府兵(注三)。前三城在長安以西和南山北麓，後三城在南秦州，即沿關中通蜀的西南大路各縣。此外，西方的平涼和秦州，東方的華州和同州都是當時的軍事重鎮。其中特別是華州和同州，東臨潼關、蒲津，正是北齊爭奪關中的咽喉。故北周的重兵麇集於此，內而保衛長安，外出則拊河洛之背以凌北齊，形勢上是十分重要的。

不幸在上述若干軍事政治的要鎮之內，沒有發現北方部族所立的碑碣和造像題名。立碑造像首先與部族的信仰和文化有關；即

(注一)《北史·魏孝武帝紀》及《斛斯椿傳》。勳府庶子廂及騎官廂營宿衛軍之名。

(注二)元氏貴族入關者，據《周書·元偉傳》所記，尚有元子孝、元季海、元玄、元寶、元儉、元則、元羅、元正、元顏子、元壽、元審等等。

(注三)《周書·武帝紀》。



使有了佛教的信仰，沒有文化和其它生活條件，也難辦到造像立銘。我想西魏、北周的駐軍地區立碑造像很少，與此有關。但是一旦生活安定下來，駐軍成家立業，並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跟着便有立碑造像的事實發生。例如長安西郊天和五年（公元 570 年）的《宇文達造像記》、秦州建德三年（公元 574 年）的《建崇寺造像記》和華州渭河北岸武成二年（公元 560 年）的《合方邑子百數十人造像記》都可代表這種傾向。

北朝後期北方部族在關中的造像題名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家族造像題名，如《宇文達造像記》、《建崇寺造像記》皆屬於此類。《建崇寺造像記》在秦州，不在關中，今附述於此。第二類是散居在關內的北方諸族隨所在村邑的漢族或羌族建立佛像，所以他們的姓名亦隨各地的造像記留到現在。第三類是聚居在一個地區的北方諸族集體造像，如華州渭河北岸的《合方邑子百數十人造像記》便是最典型的實例。茲分言之。

《宇文達造像記》前段官銜有脫泐，很難考證。記內提到宇文康和宇文達，二人似為父子關係，與《周書》文帝之子代嬰王達及閔帝之子厲王康無關。除康、達父子外，家屬尚有母張女畢，妻紇□咳，大妹高妃，中妹越妃，□妹阿咳，□妙□妃。妻之姓似一北方部族的姓氏。《建崇寺造像記》在秦州秦安縣鄭家川，全文載《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及宣統年間修的《甘肅通志》。像主宇文建崇，原姓呂，係一氐人，宇文泰始賜姓為宇文。祖父呂帛冰，為秦州一大酋長。父興進，官龍驤將軍都督浙州刺史。母元要，男娥、僧委，共三人。建崇妻王光容，伯父王阿松，兄妻忤時妙（注一），弟妻王還輝，弟婦權帛妙。從其娶婦的姓氏，可知氐族早與漢族、鮮卑通婚。宇文崇建雖是氐族改姓，然其母姓元，而天水有《宇文廣墓誌銘》，岷州又

（注一）《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忤”作“彌”。

有《宇文貴紀功碑》(注一)，可知北周時散居在秦州、南秦州各地的北方鮮卑族是很多的。

散居在關中各地的北方部族，隨各地所發現的造像題名而為我們所知者甚多。茲略舉數例。在咸陽縣發現的《王妙暉等五十人造像銘》(注二)有邑主呼延蠻獠、邑子慕容妃、邑子蘭買女三人。呼延氏、蘭氏在漢代為匈奴人的名族大姓，到隋唐時成為鮮卑。慕容氏則為白部鮮卑或遼東鮮卑。此北方部族之在咸陽者。在蒲城的《昨和拔祖等一百廿人造像記》有都維那賀蘭元吉、南面邑主賀蘭□。賀蘭氏在古時為匈奴，在北朝時為鮮卑。此北方部族之在蒲城者。涇陽縣的《顏那米等造像記》，係天和四年(公元569年)的造像(注三)，有邑子拓拔男，其為拓跋鮮卑無疑。地區不曾考定的保定二年(公元562年)的《邑主同瑤龍歡合邑子一百人等造像記》有吐盧氏一人，即邑子吐盧長彌；普六茹氏二人，即邑謂普六茹興龍和香火普六茹岳洧。吐盧和普六茹二姓皆為鮮卑姓氏。上述咸陽和涇陽二例是北族散居在漢人村邑之內，蒲城和地區不明的二例是北族散居在羌人村邑之內。每個漢村和羌村之內只有二、三家北方部族點綴其間，這是北族分佈最稀的地方了。

最體現北族在關中的集中聚居者，即近年在渭南縣渭河北岸所發現的北周武成二年九月之《合方邑子百數十人造像記》是也。此碑在渭北下邽鎮的正南二十餘里、信義鎮的正西二里之秦莊

---

(注一)《宇文廣墓誌銘》庾信所作。銘文謂其父久官沂隴，而本人於武成初年開國天水郡公，食邑二千戶，又兼秦州刺史。武成六年死，葬於秦州。《宇文貴紀功碑》在岷縣栗坂，是紀念他在大統十六年平梁企定之功的。上述二人在《周書》皆有傳。參考張維《隴右金石錄》。

(注二)《金石萃編》卷36，《關中金石文字新編》卷1題為《邑子五十人造像記》。

(注三)《金石萃編》卷37。

村(注一)。此村爲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故里，亦稱南白村。村裏唐時有“紫霞蘭若”，後簡稱爲紫蘭寺，相傳明代仍稱此村爲紫蘭村(注二)。這一帶地方在南北朝時歸下封縣(北魏以“邽”與道武帝名珪同，故改下邽爲下封)所管。下封屬於同州延壽郡，地當沙苑之西偏，正是宇文泰與高歡的鏖戰所在。許多北方鮮卑和雜胡聚居於此，顯然具有政治的歷史意義的。造像碑分北東西南四面，主文在北面的中央。文曰：

“武成二年九月十五日，合方邑子等百申(注三)人敬造釋加像一區，爲法界衆生普同妙洛(注四)。先(？)方无量壽國(注五)。願黃帝(注六)比下(注七)延祚無窮，離苦享洛。”

主文的兩側和其它東西南三面都有造像者的姓名和刻像。造像者可分爲兩類：一類是軍事、政治、宗教上有官銜的，鐫其姓名於碑的上列，並把自己的形像刻在旁邊。男子頭戴武士弁，短衣胡袴，足著長筒皮鞞，腰繫荷包等物，下垂至股膝間。婦女挽髻而冠，腰束長裙。男女的旁邊，都有僕婢一人侍立，手持華蓋，遮護在主人的頭上。又一類是普通的邑子和上述貴人的子弟，他們無像，只鐫姓名於碑的下列。僧人皆有名有刻像，薙髮着袈裟，作誦經模樣，亦鐫在碑的上列。這種情況正可反映北朝中等以上各階層人物。

北面上列有官銜和宗教稱呼的人物八人：

“合邑主呼延觀（女像） 北面像主統軍賀蘭寧 北

(注一)此據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李子春先生告我。

(注二)此說據陝西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部李敬泰先生所云。李係該村人。

(注三)“申”爲數的簡字。

(注四)“洛”爲樂的簡字，北魏以來，各地墓誌造像銘多以“洛”代樂。下文及題名同此。

(注五)“國”爲域的別體字。

(注六)“黃帝”卽皇帝之誤寫。

(注七)“比下”卽陛下。

面像主侯永洛 典錄都督若干禹 □□□洪緒 維那  
尉靜妙(女像) □□男賀蘭葭洛 典坐齊普照(女像)”

下列邑子男女二十八人,有的具有官銜:

“都督乙弗阿師 賀蘭羌 酖斯黃頭 酖斯景祥  
釵唾元葦 乞伏菩超 若干老憲 揄拔夸千 如羅  
道明 若干天生 若干道洛 賀蘭廣常 賀蘭益  
冑(注一) 酖斯子祭 揄拔長顯 李貴妃(女) 卜  
阿妃(女) 彭洛咨 賀拔元妃(女) 劉阿勝 親信  
城陽(注二)男若干何 破洛汗阿拔 烏六渾烏地歸 張  
歸好 若干雙妃(女) 薛 菴 薛迺男 屋引女  
(女)”

東面上列有官銜或宗教稱呼的人物和僧侶九人:

“東面邑主都督揄拔慶 香火主趙妙菓 邑師比丘  
法師道政 邑師比丘僧滅 典坐謝禧 裏主揄拔祭  
裏主揄拔僧 □□□廣洛 東面化主酖斯相貴(女像)”

下列邑子男女三十二人:

“宇文敬妃(女) 周洪暈 呂 妃(女) 程黑女  
(女) 酖斯定妃(女) 酖斯阿足 樂金銀 韓伙化  
師都督揄拔纂 纂妻揄拔女子(女) 親信揄拔子靜  
成阿連 未紫綵 王阿妙 酖斯迴孃(女) 屋引景  
妃(女) 梁織成 梁阿妃(女) 山顏嬰 權洛周

(注一)“冑”同富,北朝碑亦作“冑”。

(注二)北周時的城陽有三,一為鄆州的城陽郡,在今湖北省。二為永州的城陽郡城陽縣,在今河南省。三為華山郡城陽縣,在今陝西省東部。此城陽男似指華山郡的城陽縣。按北周·西嶽華山廟碑記載大統七年(公元541年)“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西兗州大中正、華山郡城陽縣開國公、恆農楊子所”初修華山廟。此可為華山郡有城陽縣之證。

邊狼女(女) 牛媚(注一)妃(女) 王廣親 陳阿姜(女)  
 裴洛容(女) 支舍妃(女) 岐娥王 李阿迴 宇文  
 似璣 曹小璣 張清妃(女) 屋引洛妃(女)”

西面上列有官銜和宗教稱呼的人物和僧侶九人：

“西面邑主師都督郃鄉縣(注二)開國子庫汗宗 邑師比  
 丘玄照 邑師比丘僧佛 都齋主平原縣(注三)男趙觀相  
 維那周容嬰(女像) 都典坐宇文拔陵 維那斛斯溫  
 顏老(?) 西面像主□妻馮炭(?) (女) 送(?)化主高陵  
 縣(注四)開國子大都督宇文永”

下列邑子三十四人，少數人列有官銜：

“宇文平周 屈突褥 和督阿郎 郃鄉開國世子  
 (庫)元慶 次子前待上士(庫)道洛 謝冨和  
 普毛(注五)磨廝 若干元安 高小慶 斛斯元和  
 斛斯伯隴 斛斯野(?)义 和督堂夫 斛斯子恭  
 若干子略 別將斛斯成 先都督俟奴俟尼 宇文俱桃  
 周子慶 斛斯子襲 揄拔平洛 宇文康儒 斛  
 斯貴興 斛斯子元 斛斯子□ 宇文天保 宇文洛  
 保 乙旃洛生 吐知勤相貴 普毛阿并 王洛  
 江子歸 費連迴憲 若干迴生”

南面上列有官銜和宗教稱呼的人物和僧侶八人：

“邑師比丘道先 邑師比丘僧和 都像主都督白

(注一)“媚”是“智”字的別體。

(注二)北周無郃鄉縣，疑卽郃陽縣，屬同州澄城郡。

(注三)北周平原縣屬魏州平原郡，今山東聊城縣。

(注四)北周高陵縣屬雍州京兆郡。

(注五)“毛”，按《周故開府儀同賀毛植墓誌》，當卽屯之簡字。

停(注一) 男普毛富 邑主親信城陽男酖斯祥 邑主白演  
 妃(女像) 像檀越主師都督六、洋二州(注二) 刺史永寧(注三)  
 子賀蘭婁 都邑主師都督三原縣(注四) 令華陰(注五) 男屋引  
 洛 都化主都督范縣(注六) 伯掄拔怡”

下列邑子男女二十八人：

“香火主高僧慶 吐浴渾談光 董貴妃(女) 掄  
 拔俱羅 劉潘妃(女) 白停男世子(普屯)興集 次子  
 (普屯)三歡 長息吐胡比 禮舍香 城陽男世子(酖  
 斯)僧通 酖斯願輝 酖斯相妃(女) 宗元妃(女)  
 乙弗子暢 宇文子祭 趙觀遠 酖斯相勝 酖斯景  
 祭 酖斯桃枝 永寧子世子(賀蘭)士遠 次子(賀蘭)  
 僧安 次子(賀蘭)僧達 酖斯子尙 屋引進達 屋  
 引元達 郁朱長願惠 俟奴突貴 酖斯相貴”

上述北東西南四面造像題名共一百五十六人，與主文所云“百數人”相合。“合方邑子”似可以解釋為合各方邑子。邑子之分刻於北、東、西、南，從四方邑主、四方化主的不同名稱言之，似與邑子諸姓之四方分佈的不同有關。例如酖斯姓多分佈在西南，掄拔姓多分佈在北，宇文姓多分佈在西，匈奴、高車諸姓多在北方等等，可為例證。

(注一)《太平寰宇記》姑臧縣有白亭海。在今甘肅民勤縣以北內蒙阿拉善旗。唐代於此設白亭守捉，又置白亭軍。北周的白亭似即白亭。

(注二)《太平寰宇記》：“西魏廢帝二年於今西鄉縣置洋州。”在今陝西西鄉縣。六州無考。

(注三)永寧在今陝西宜川縣東。《元和郡縣志》成寧縣下云：“後魏太和十八年，於白水川置永寧縣，屬義川郡。在今縣東二十里永寧故縣是也。”此北魏之永寧縣。又《魏書·地形志》，南汾州定陽郡與朔州太平郡皆有永寧縣。此永寧子賀蘭婁之封爵不知為何一永寧。

(注四)北周三原縣在今陝西三原縣。

(注五)華陰陝西今縣。

(注六)范縣無考。漢代范縣在今山東范縣東南。

由部族成分言之，題名上可以看到北周時渭南北部至少有少數部族姓氏二十六種。其中姓斛斯者共二十五人，掄拔者十一人，宇文者十人，若干者九人，賀蘭者八人，屋引者六人，普毛者五人，庫者三人，乙弗、費連、和督、俟奴者各二人，呼延、釵啞、賀拔、乞伏、如羅、破洛汗、烏六渾、支、屈突、乙旃、吐知勤、白、吐胡、郁朱等十四姓各一人。以上確知其為少數部族姓氏的共二十六姓。此外，北面薛姓二人，《魏書·官氏志》云：“叱干氏後改為薛氏。”又侯姓一人，同書云：“胡古口引氏後改為侯氏。”又尉姓一人，同書云：“尉遲氏後改為尉氏。”東面未氏一人，《官氏志》云：“渴燭渾氏後改為味氏。”《氏族略》、《元和姓纂》等書皆謂“後改為朱氏”。此碑東面未紫綵一人，此姓確為“未”，不為朱。未與味同音，《氏族略》等書所云改朱之說，恐有錯誤。東面又有山氏，《官氏志》云：“土難氏後改為山氏。”上述五姓——薛、侯、尉、未、山雖為單姓，然在北魏太和改姓之後，它們可能還是少數部族的姓氏。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 554 年），宇文泰曾經提倡過賜複姓和恢復太和以前代北複姓的運動，但成效並不太大，例如北周時的拓跋氏子仍姓元及上述諸代北單姓即其例證。反之，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 年）的改鮮卑複姓為漢姓單字，雖然比較澈底些，但《官氏志》已記“吐谷渾氏依舊吐谷渾氏”，“賀若氏依舊賀若氏”，“奚斗盧氏後改為索盧氏”。而孝文以後，至恭帝以前，各史志以代北複姓出現者恆盈紀屢傳，屈指難計。從此可知此碑上述代北諸複姓，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是宇文泰及北周其它皇帝的賜姓。當然其中也許有個別的人屬於《周書·文帝紀》所謂“所屬軍人亦改從其（諸將功高者）姓”，但絕大部分仍姓其本姓是毫無疑義的。

從部族分類學的觀點看，第一，祖源係出匈奴而向北方鮮卑轉化的部族姓氏，有賀蘭氏、宇文氏、費連氏、呼延氏、破落汗氏、吐胡

氏等。賀蘭氏原出晉初北狄十九種作為匈奴部落之一的賀賴部。《晉書·慕容儁載記》：“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於儁，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於代郡平舒城。”北魏初，賀蘭部被匈奴鐵弗部征伐，于登國五年（公元 390 年）降魏。從此，與拓跋鮮卑相處，逐漸鮮卑化。宇文氏係出南匈奴，後東出征服白部鮮卑，在西晉末年與段部及慕容部鼎足而三，雄長于遼碣一帶。宇文氏被慕容燕所滅，成為白部鮮卑。其一部分西徙武川鎮，與拓跋鮮卑相處，又與北方的鮮卑同化。賀蘭氏與宇文氏相同，其祖源皆出自匈奴，至北朝時皆拓跋鮮卑化。呼延氏的祖先係出匈奴呼衍氏，至北朝亦逐漸鮮卑化，至隋、唐則直變為鮮卑（注一）。“破落汗”在《北齊書》及《北史》作“破六韓”。《北齊書·破六韓常傳》云：“常，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此言破落汗為匈奴之裔甚明。吐胡疑即吐京胡之簡稱。此族初居吐京鎮，在汾州。此鎮之南，漢時稱蒲子縣，三國及晉初並為南部匈奴都尉所在，其為匈奴之裔亦明。

第二，屬於北方鮮卑者，有撿拔氏、若干氏、普屯氏、如羅氏等。撿拔即拓跋之異字。“撿”在碑文中或作“撿”，“拔”或作“扞”，皆當時簡字。“扞”之為“拔”在苻秦《廣武將軍□產碑》題名中即屢見不鮮。撿拔氏出自拓跋部，其為北方鮮卑無疑。若干氏亦出自北方鮮卑。《周書·若干惠傳》云：“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與魏氏俱起，以國為姓。”《魏書·官氏志》，“若干氏後改為苟氏”。《北史·苟頹傳》，“代人也，本姓若干”。《南齊書·王融傳》，融上書謂北虜“設官分職，扶任種戚，侯台鼎則丘頹、苟仁”。武漢大學姚薇元教授以為丘頹即苟頹（注二），當無疑義。苟頹、苟仁皆魏之“種戚”，當然也是北方鮮卑了。普屯氏，“屯”在碑文中作“屯”，據北周《開府儀同賀屯植墓

（注一）《漢書·匈奴傳》顏注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

（注二）《北朝胡姓考》58—59 頁。



誌》之屯亦作“𡗗”，其當爲“屯”無疑。唯《魏書·官氏志》無普屯氏，只有普氏，云：“次兄爲普氏，後改爲周氏。”普氏原來是否一單姓，在各文獻內頗不一致。《宋書·索虜傳》有北魏交州刺史普幾。《隋書·周搖傳》稱“初爲普乃氏，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清代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謂當作普適氏。姚薇元教授以爲普乃之“乃”爲衍文，普適之“適”爲謬失，然此碑中有姓普屯者五人，即普屯磨蝨、普屯阿井、普屯富及其二子，那麼普氏原來是否普屯氏又值得我們重新考慮一番了。如羅氏，《官氏志》列入內入諸姓，亦當爲北方鮮卑的姓氏。

第三，西方鮮卑有和稽氏、俟奴氏、費連氏等。碑文“和稽”作“和瞽”，“瞽”即稽之俗字。《官氏志》云：“西方和稽氏，後改爲緩氏；俟奴氏後改爲俟氏；費連氏後改爲費氏。”《宋書·索虜傳》有魏尙書滑稽。“滑”與“和”同音，此亦南人誤以姓氏爲名之一例。薛氏在北魏時亦西方姓氏，《官氏志》：“叱干氏後改爲薛氏。”

79

第四，屬於高車部的姓氏有斛斯氏、屋引氏、賀拔氏、乞伏氏、乙旄氏等。“斛斯”之“斛”即“斛”。北朝人以百升爲斛，故“斛”從百升。此姓原出高車的斛薛部，“薛”、“斯”音近，故稱爲斛斯。最初居大漠以北，北魏出征高車，掠其牧民南歸，一部分居於河西，稱爲“牧子”。斛斯椿的父親原來就是作河西牧帥的，這件事後面還要提到。屋引氏，《官氏志》：“屋引氏後改爲房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虜俗謂房爲屋引。”屋引改爲房氏的原因在此。唯屋引氏爲何族，尚不十分明確。按《官氏志》所記，屋引氏似爲北部鮮卑。然《晉書·乞伏國仁載記》及《十六國春秋·西秦錄》言西秦有右相屋引出支和刺史屋引破光。西秦爲高車部人乞伏氏所建（注一），其宰相刺史亦當爲高車部人。又《魏書·高車傳》：“彌俄突遣其莫

（注一）參考拙著《烏桓與鮮卑》32—34頁。

何去汾屋引賀眞貢其方物。”彌俄突爲高車主，“莫何去汾”是高車大官，非貴族不能當此秩，此亦可爲屋引氏出自高車部之旁證。賀拔氏，《官氏志》：“賀拔氏後改爲何氏。”《元和姓纂》賀拔氏下云：“北人謂地爲拔，謂其總有其地，時人相賀，因氏焉。”此說不可靠。《周書·賀拔岳傳》記：“先是鐵勒斛律沙門、斛拔彌阿突等並擁衆自守，至是皆歎附。”此斛拔彌阿突在《北齊書·神武紀》作“斛拔俄彌突”，《北史·神武紀》作“賀拔彌俄突”。據此知斛拔氏卽賀拔氏，又知賀拔氏爲鐵勒部人的姓氏。隋唐所修史書中的鐵勒，卽《魏書》中的勅勒或高車，故賀拔氏爲高車部人。乞伏氏，據《北史·孝行傳》云：“乞伏保，高車部人也。”“乞伏”之音頗似《魏書·高車傳》十二姓中的“泣伏利”氏。乙旃氏亦係出高車部。《魏書·高車傳》十二姓中有乙旃氏。北魏祖先拓跋部命姓之時，獻帝鄰以叔父之胤爲乙旃氏，太和改姓時爲叔孫氏，見《官氏志》。以此知拓跋鮮卑和高車部並有乙旃氏了。

第五，屬於白部鮮卑的姓氏有吐谷渾氏、乙弗氏、庫氏等。吐谷渾初爲白部鮮卑的人名，慕容廆之兄，因與廆不協，西行至甘松之南、白蘭山之北、洮水之西，建吐谷渾國。此國人降魏，隨魏人入關，仍姓吐谷渾。吐谷渾之“谷”古音讀“浴”，此碑直書爲“吐浴渾”，可爲音證。乙弗氏係乙弗敵國的姓氏。此國在吐谷渾國之北，南涼之西，蓋爲吐谷渾之別部。《北史·魏文皇后乙弗氏傳》云：“其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可爲與吐谷渾同族之證。庫氏本爲庫褥官氏之省稱。《官氏志》云：“北方庫褥官氏後改爲庫氏。”《魏書·太宗紀》：“泰常元年冬十月，徙何部落庫偃官斌先降，後復叛歸馮跋。”以此知庫氏爲徙何鮮卑，亦卽白部鮮卑。

第六，屬於東夷的姓氏有烏六渾氏。烏六渾氏出自東夷烏洛侯國。北魏時的烏洛侯，唐時稱爲烏羅渾，“洛”、“羅”、“六”音本相

同。其地在今東北黑龍江嫩江流域，關中的烏六渾氏當係其國人降魏而隨魏人入關者。

第七，屬於西域胡的姓氏有支氏、白氏。此二氏之來源說已見前，茲不贅。唯有一事應於此一提者，即此渭河北岸之白氏是否唐代詩人白居易之遠祖是也。白居易出身西域胡，似無疑義。最有力的證據即白居易之弟敏中拜相時，崔慎猷稱之為“蕃人”（注一），盧發並調之為“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注二）。對於白氏的祖源，白氏兄弟及其族人則各有其說。白居易對於白氏的淵源詳見《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注三）中。最近渭南縣渭河北出土之《唐白敏中墓誌》（注四）大致可以代表白氏家世傳統的說法，云：

“謹按白氏受姓於楚，本公子勝白邑，有大功德，民懷之，推為白公。其後徙居秦，實生武安君，太史公有傳，遂為望族。元魏初，因陽邑侯包為太原太守，子孫因家焉。逮今為太原人也。”

此墓誌與《白府君事狀》大體相同。然有不同者，則墓誌無“白公之子奔秦代為名將，乙丙已降”一段。此段當係白居易所考訂，宋代陳振孫在《白文公年譜》中已經辨別其與史實不合。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考證北魏太原太守白邕為白氏居太原之始，此墓誌則稱為陽邑侯白包，當以墓誌之白包為正。事狀、墓志、宰相表有一共同之點，即白氏先居關中，於北魏初徙居太原，至北朝末年又返居關中，此點頗足為我們注意。白氏既是西域龜茲胡，其入居之地自在關中，而不在楚，此點似無疑義。太原白氏重回關中，原因甚多，

（注一）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5《中書蕃人》條。

（注二）五代王定保《摭言》卷3《敏捷》條。

（注三）《白氏長慶集》第6帙。

（注四）墓誌原名《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致土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國太尉白公墓誌銘并序》。拓片存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前人未著錄。

未可一概而論，然關中渭河以北自魏晉以來白氏多散居其間，此或與白氏之重返居渭河以北有關。白氏世傳北齊時白建返居同州之韓城。傳三世至溫，徙居於華州之下邽，自此即爲下邽人。溫生鎰，爲鞏縣令，以年七十卒於唐代宗大曆八年（公元 773 年）。以此推測，則白溫之徙居下邽當在唐高宗至中宗之間。換言之，即白居易的祖先在北周時尚未至上邽。那麼武成二年九月渭北造像題名碑上的白演妃跟白居易顯然沒有什麼祖孫關係了。從居住的地方說，白居易的祖塋，據《長慶集·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襄州別駕府君事狀》在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此北原，據《白敏中墓誌》當時叫做洪義原。白氏祖塋既知，白居易的村居大致就在附近。《白氏長慶集》裏描寫渭上故居的詩賦很多。《汎渭賦》云：“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少有華，澹悠悠其可賞目。”又云：“門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可知白氏住宅距離渭水是很近的。《重到渭上舊居》一詩云：“舊居清渭曲，開門當蔡渡。”此言住宅正在蔡渡的北口。白居易曾經新建一亭台，有《示諸弟姪》詩，云：“東窗對華山，南簷當渭水。”其居住在渭濱的情況可與前述詩賦相啓發。最近華州李子春先生語我，說武成二年造像題名碑所在的紫蘭寺，在《白氏長慶集》裏叫做“紫霞蘭若”，有詩《過紫霞蘭若》一首，又有《蘭若寓居》一首，似即指此寺。然《過紫霞蘭若》謂蘭若在山頭，未知與題名碑所在地形相合否？若相符合，則北周時白演妃造像之蘭若，至唐元和年間白居易不只再三登臨，而且晝遊南塢之上，夜宿東菴之下，真是“異乎哉，紫霞蘭若與白氏世有緣乎！”紫霞蘭若後世簡化爲紫蘭寺。據當地故老云，南白村在明代尚稱爲紫蘭村。

第八，部族系屬不明者有二氏，一爲屈突氏，一爲土知勤。《元和姓纂》和《氏族略》五皆言“屈突氏本居元朔，後徙昌黎”。“元朔”

之義泛指北方而言。北魏時的昌黎郡在遼寧朝陽縣的南邊。按《唐書·契丹傳》、《張曲江文集》之《勅契丹都督涅禮書》及《賀誅奚賊可突于狀》，屈突一作“可突”，為庫莫奚酋長的姓氏。庫莫奚原居內蒙東南老哈河流域，屬宇文鮮卑統治。晉建元二年（公元343年），慕容皝破宇文氏，徙其民五萬餘戶於昌黎，奚族中的屈突氏可能即在其中，上引書所云“本居元朔，後徙昌黎”者或以此。至慕容垂時，昌黎徙何人屈突遵為博陵令。北魏皇始元年（公元396年），拓跋珪南伐後燕，兵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唯中山、鄴城、信都三城不下”（注一）。博陵令屈突遵於此時降魏（注二）。又《唐書·屈突通傳》云：“其先蓋昌黎徙何人，後家長安。”所云屈突氏的舊籍與《魏書·屈遵傳》合。此姓人何時入關不明。北周造像題名中有屈突禰，可能與隋之屈突蓋、唐之屈突通等有關。唯庫莫奚是鮮卑，或是宇文部的別部，迄無定論，姑誌於此，以俟日後繼續研究。土知勤氏在古籍中甚為罕見，無法知其族系和淵源。

各部族姓氏的類別略如上述，現在把題名中五個大姓，即斛斯氏、撿拔氏、宇文氏、賀蘭氏、若干氏五姓居住在華州渭南的歷史略述如下：

斛斯氏的來歷，見《魏書·斛斯椿傳》。傳云：“椿，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爾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此言斛斯椿的父親原為河西牧帥，及牧子起義，椿即舉家投奔契胡帥爾朱榮，從此就做了北魏的軍官。魏孝武帝西遷，椿之鼓動最力，故入關後即拜之為尚書令。椿為尚書供職長安，然其府邸則在渭陽。本傳云椿死時，孝武帝至渭陽送葬，可以為證。椿有

（注一）《魏書·太祖紀》。

（注二）《魏書·屈遵傳》。屈突氏至太和年間始改屈氏。

四子，除誼爲高歡所殺外，餘皆入關。第三子徵，被賜爵城陽郡公；第二子恢，爲新蔡郡公。造像記中所云城陽男斛斯祥及祥之世子僧通，皆當爲椿之後裔。又斛斯徵爲城陽郡公，爲從第一品爵；祥爲城陽男，爲從第五品爵，二人封郡同名，其關係直接可知。其它同姓諸人皆居寺之西鄉及南鄉，與斛斯椿之居渭陽當有關係。

掄拔氏爲魏之宗室，宗室子弟隨孝武入關者甚多，見《周書·元偉傳》。元偉在孝武時爲華州刺史，又有元季海封爲馮翊王，渭北寺內造像題名多姓掄拔者當與此二事有關。周閔帝元年（公元557年）二月，趙貴等謀復辟，元氏子女被連株而誅者甚衆。至明帝踐位，始把元氏之沒入爲官口者悉免放爲平民（注一）。

西魏自大統元年（公元535年）以來，宇文泰率其將領士兵初居灊上，繼居渭南。自沙苑之役發生，宇文泰的軍隊便長期屯居華州（注二）。其閱軍地點，或在華陰（大統五年），或在櫟陽（九年），或在白水（十年，十一年）。其行台所在，即馮翊古城（今大荔縣治）。《周書·蘇綽傳》，綽爲宇文泰之大行台，卒於任所。“及歸葬武功，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此同州城即上文所說的馮翊古城。同州城距渭北造像之寺僅數十里，宇文泰及其同姓將士的家族多居於其間，是可以理解的。又造像題名中有高陵縣開國子宇文永，與宇文測父親同名。《周書·宇文測傳》父永仕魏，早亡。此蓋姓名相同而實非一人。

題名中的第四大姓爲賀蘭氏。此姓在南北面共八人，其中一人名賀蘭婁，爲師都督，六、洋二州刺史，爵永寧子。六、洋二州刺史爲現任官，爲題名中現任官秩之最大者。此姓之多分佈於下邳，似與華州刺史賀蘭祥有關。《周書》本傳稱祥於大統十六年（公元

（注一）《周書·明帝紀》。

（注二）《周書·文帝紀》：“大統元年，太祖軍灊上。二年，（沙苑戰後）太祖還軍渭南。四年三月，太祖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八月，平趙青雀亂，復屯華州。”

550年)拜大將軍,奉宇文泰命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在廢帝二年(公元553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公元554年),祥仍爲刺史。

從官爵來說,最大的官爵是都督范縣伯擒拔怡,范縣伯屬魏爵制散伯一類,爲從第三品。其次,是師都督郃陽縣開國子庫汗宗和高陵縣開國子大都督宇文永,爲正第四品。再次,是師都督六、洋二州刺史永寧子賀蘭婁,爲從第四品。再次,是師都督三原縣令華陰男屋引洛,都督白停男普屯富,城陽男酥斯祥,平原縣男趙歆相,爲從第五品。上述諸官秩,如六、洋二州刺史賀蘭婁,三原縣令屋引洛,皆爲現秩;都督擒拔怡、普屯富,師都督庫汗宗、賀蘭婁、屋引洛,以及統軍賀蘭寧、別將酥斯成也似乎都是現秩,只有先都督俟奴俟尼是舊秩。此外,還有邑師、香火主、都齋主、檀越主、都邑主、都化主、都典坐、典坐、唯那典錄等等都是宗教的官。華州渭南河北一隅,爲統治階級服務的文武官階爵銜便如此衆多,如此複雜,從此可知北朝的社會階級階層已經分化得很森嚴了。過去對於經典作家所說的“統治民族”,我們認識不夠,以爲只有皇帝和若干將相是某個少數部族,如何能說某族便是“統治民族”呢?現在從渭南河北造像題名所列官爵看來,北周一朝除了朝廷的皇帝和將相是鮮卑和雜胡的成分外,各州刺史、各縣縣令以及帶領軍隊的都督、統軍、別將,甚而至於宗教的官秩,有許許多多都是由鮮卑和雜胡充當的。因此,我們對於歷史,認識了漢族地主階級與異族的統治階級的階級聯合僅是歷史的一個方面,進一步更認識異族對漢族人民自上而下的統治,從皇帝而下至地方官吏自成一個統治集團,對其它民族進行民族壓迫,是歷史的另一個方面。從華州渭河北岸的造像題名顯明可以看出,六世紀中國北方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乃通過民族矛盾而表現出來。

## 五 渭河以北各州縣的羌民和 他們的漢化過程

前節已述漢魏以來，關中馮翊、北地二郡爲羌族各部的麤集之區。從五世紀前葉至六世紀前葉的一百年間，北鎮的鮮卑雜胡相繼移入關中，李潤羌的勢力既經削弱，而同州、華州又成爲北鎮軍官吏屬的駐紮之所。在這種情況下，馮翊郡東部的羌民不得不向西部轉移，與原來屯居在馮翊郡西部和北地郡東部的羌民集中起來出現於蒲城、白水、宜君、銅川之間，這是很自然的一種現象。北周和隋代初年渭北各縣羌民留到現在的造像碑銘約有十二幢：屬於保定年間的四幢，卽保定元年(公元 561 年)的《雷文伯造像銘》，保定二年(公元 562 年)的《邑主同瑋龍歡合邑子一百人等造像記》，保定四年(公元 564 年)的《聖母寺四面造像碑》和《同瑋氏造像記》。屬於天和年間的二幢，卽天和元年(公元 566 年)的《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記》，天和六年(公元 571 年)的《雷明香爲亡夫同瑋乾熾造像記》。屬於建德年間的一幢，卽建德元年(公元 572 年)的《邑子堂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記》。屬於北周而年月不明者二幢，卽《郭羌四面造像銘》和《荔非明達四面造像題名》。屬於隋初開皇年間的三幢，卽開皇二年(公元 582 年)的《邑主雷惠祖合邑子彌姐顯明等造像記》，開皇四年(公元 584 年)的《鉗耳神猛造像記》及開皇六年(公元 586 年)的《邑主彌姐後德合邑子卅人等造像記》。以上羌民造像碑銘共十二幢。其已見前人著錄者五幢，未爲前人著錄者七幢。造像的所在地有明文可考者五幢，卽《聖母寺四面造像碑》



和《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記》在蒲城，《郭羌四面造像記》和《雷明香爲亡夫同瑀乾熾造像記》在耀州，《甓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記》在銅川與白水間。其它六幢，雖無明文可考，按其姓氏皆當在渭河以北各地，而不在渭河以南。請參考附錄二《關於關中羌村羌姓的札記》。

北周和隋初的羌民造像亦可分爲家族造像和合邑造像兩類：前一類包括《雷文伯造像銘》、《雷明香爲亡夫同瑀乾熾造像記》、《郭羌四面造像銘》和《鉗耳神猛造像記》；其它七幢則屬於合邑造像的一類。茲先敘述後一類。

《邑主同瑀龍歡合邑子一百人等造像記》前人未曾著錄，無法推知此碑確在渭北何地。記云：“知命不常，漂流四使”（“使”疑爲“徙”之誤），頗能描述北朝末年此邑羌民諸姓遷徙流亡之苦。邑子中最多的姓氏爲同瑀氏，共六十七人，占造像人全部題名67%。荔非氏一人。以上二氏皆爲羌姓。其次，公孫氏八人，陳、田、劉、趙、吳、張六姓各一人，似皆爲漢姓。再次，呂、姜、楊、梁、齊五姓各一人，皆爲氐姓。郝姓一人，可能是盧水胡的姓氏。最後還有一些特殊的姓氏，如吐盧姓一人，普六茹姓二人，大致都是鮮卑的姓氏。《魏書·官氏志》有叱羅氏，此造像題名則確爲吐羅，非叱羅。宋鄧名世《古今姓氏辨正》十二及二十四俱作“吐羅”，不知與此有關係否？普六茹在《官氏志》內作“普陋茹”，“陋”與“六”音同。《周書·楊忠傳》，“魏恭帝初，賜（忠）姓普六茹氏，”此姓原爲代北鮮卑姓無疑。特殊的姓氏，還有析婁氏、則氏、散氏，皆不知所自出，留待專治姓氏學的學者論證之。總之，此題名碑所在的村邑是一以同瑀氏爲主的羌村，但亦雜有少數的其它羌姓、漢姓、氐姓、鮮卑姓及其它少數部族的姓氏。

《聖母寺四面造像碑》在蒲城縣東北二十里雷村。前人以碑中

有彌勒像主荔非道慶，故亦稱之爲《荔非道慶造像碑》。此碑初爲《金石萃編》所著錄，復經《八瓊室金石補正》校勘之，大體皆已認識。題名諸羌姓氏，清代考據學家錢大昕在《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內有所統計，云複姓昨和者十七人，屈南者十人，罕开者六人，荔非者三人，同蹄者二人，彌姐、鉗耳、薄地者各一人。今據上引兩書對錢氏的統計略作補正如下表：

西羌姓氏(包括羌族單姓)	人 數	錢氏統計人數
(1) 雷	28	0
(2) 昨和	19	17
(3) 屈南	9	10
(4) 罕开	8	6
(5) 寔	7	0
(6) 荔非	3	3
(7) 同蹄	3	2
(8) 鉗耳	2	1
(9) 彌姐	2	1
(10) 地連	1	1
共 計	82	41

題名中“郡主簿地連敦”，此人姓地連名敦，錢氏誤以爲姓簿地，毛鳳枝在《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9中已有更正，當從毛氏。前後統計數目不同，當係所據拓本有顯脫之異，當不足怪。此碑記云造像者一百五十人，但實際可省識者僅一百二十二人。表內羌人姓氏共八十二人，佔題名全數的67%以上。它如羌姓姚氏二人，丘姓姜、蒲氏各一人，皆未計算在內。羌人姓氏多數在前面已有說明，此碑所多者爲彌姐和地連二姓。彌姐亦作“彌且”，爲西羌大姓。

《晉書·載記》，後秦有彌姐亭地等，西秦有彌姐康簿。《周書·文帝紀》有彌姐元進，為夏州酋望。地連一姓不見前人著錄，疑即漢代滇零羌的後裔。“地連”與“滇零”音全相同，可以為證。東漢時，滇零為西羌先零種之別種，移居北地郡，其盛時自稱天子，東出馮翊，遠及魏、趙。關中有其後裔是不足為異的。

此碑引人注意者，即羌姓諸人在北周時居文武要秩者獨多。武官之稱曠野將軍、殿中司馬者二人，屈男神□與雷顯榮；稱曠野將軍、員外司馬者一人，同瑋永；稱威列將軍者一人，荔非道慶；稱輔國將軍中散別將者一人，同瑋永孫。文官之封安定公者二人，昨和高儁與昨和遵；為肆安縣令者一人，罕井明孫；蒲城具法曹府者一人，昨和暢；白水郡五官者一人，雷洪達；輔國將軍、中散金曹、從事郡主簿者一人，地連敦。這些人們雖不見於史傳，但與征東將軍、洛川縣開國伯之類的人物同在聖母寺造像題名中出現，可知關中西羌的社會階級分化在北周時期已經達到最高潮了。

《同瑋氏造像記》的所在地，清代孫星衍在《寰宇訪碑錄》中云在長安，此耳食之言，不足為據。碑後題名，可省識者約一百六十多人，其中姓同瑋的八十一人，佔總題名人數的一半，可知碑銘所在地是一同瑋氏羌人的集居之區。關於同瑋氏的來源，前面已經提到，乃是東漢時的滇零等羌曾經在上黨郡銅鞮縣長期居住過的緣故。這些羌人雖然以滇零羌為主，但亦雜有武都的參狼種和上郡、西河的諸雜羌（注一）。因此而知同瑋氏羌的祖先是多元的。本來西羌的姓氏都是從同一祖源派生出來的，而同瑋氏則是從不同祖源的諸羌匯合而為一個姓氏。這種事實在民族史上頗有意義。同瑋（即同蹄）一姓在十六國時始見於著錄。前述《廣武將軍□產碑》的右側有同蹄氏三人，此同蹄羌姓之在馮翊郡；《聖母寺四面造

（注一）後漢書·西羌傳。

像碑》以同蹄爲姓者亦三人，此同蹄羌姓之在蒲城縣；唐代有《雍州美原縣頻陽府校尉同蹄武幹造像記》，此同蹄羌姓之在美原縣（富平縣東）；《新唐書·孝友傳》記同官縣有同蹄智壽、智爽兄弟，此同蹄羌姓之在同官縣（今銅川縣）；《洛川縣志》縣城西面西河鋪通鄭州的道路上有同蹄鋪，最近《陝西省行政區劃圖》洛州縣東北二十里有“桐堤村”，此同蹄羌之在洛川縣。《同蹄氏造像記》碑究在何地，雖然難於驟下一論斷，但此碑不在渭河以南，而在渭河以北，是可以斷言的。

《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記》敘述造像的所在地云：“於堯山之鄉，壙川之裡，左挾同升，右臨白徑，樹茲釋迦像一區。”堯山鄉在蒲城縣北十里，唐時稱爲堯山驛（注一）“同升”之義不詳，疑與同州有關。白徑似指通白水的道徑。蒲城縣有堯山鄉，左同州而右白水，其爲碑銘所在地無疑。銘文謂造像者一百廿八人，實際只有八十七人。題名的姓氏屬於羌姓者五：昨和氏五十八人，罕开氏六人，荔非（一人作“梨”）氏五人，屈南、雷氏各二人，共七十三人。此外尚有姚氏一人，似亦羌姓。如是在八十七人中羌姓占 85% 以上。另外姓賀蘭者二人，爲北族大姓；呂姓者二人，似一氐姓。其餘皆爲漢姓。可注意的是昨和早洛之母名屈（注二）男長資，昨和平貴之母名罕开阿□。此昨和氏與屈男、罕开二氏聯婚甚明。又有呂右妃，是一婦女名，可能也是嫁給昨和氏者。邑子中之爲顯宦者，虎賁給事中散大夫昨和富進，爲七命官；□□將軍右員外常（注三）侍都督罕开舉，爲正五命官（注四）。

（注一）宋敏求《長安志》卷 18。

（注二）《八瓊室金石補正》卷 23 作“金男長資”，誤。原文作“屈”，當爲屈字的簡寫。

（注三）上引書同卷“常”作“□中”，誤。

（注四）《通典》卷 39《後周官品》。

《邑子甞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記》敘述造像所在地云：“南臨白水，北背馬蘭，東挾洛水，西望堯山。”馬蘭山在銅川縣東北五十里，白水在白水縣南，洛水在白水縣東，堯山在蒲城北。然則此碑當在銅川、白水之間。碑陰造像人可省識者只九人，其中甞姓八人，餘一人為郭姓。有將吏頭銜者二人：一為曠野將軍殿中司馬甞□□，又一為縣主簿甞定昌。

《荔非明達等四面造像題名》，前人未著錄，拓本存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碑上無造像記及造像年月日，亦不知其出處。造像者共十二人。像主為“越公府行參事荔□□□”，名字漫漶不可辨，故以另一造像人有全名者，即荔非明達為代表以為碑名。十二造像人的姓名和官階如下：

“佛檀越主兼錄事鄉□□□□□  
 都化主荔非明達  
 都像主前□□□曹□□□□  
 都邑主□□□□□平縣□□□□  
 天宮主柱國參軍□□□□  
 開佛光明主東□城□□□□□□  
 典錄哀公記室荔非□□  
 化主同官烽帥荔非延□  
 像主越公府行參軍荔□□□  
 邑主邑義錄事荔非仲□  
 邑長大都督司鎧□□□□  
 典坐村正荔非仲祥。”

上述十二人有姓可省識者皆以荔非為姓，其為一姓荔非的羌民村落的集體造像無疑。出處何在，已不能確指。據陝西省博物館人員談，拓本似自華縣拓來，可備一說。我們所注意的，是題名中之

“越公府行參軍”一秩。《周書·明帝紀》，“武成元年(公元559年)九月乙卯，以(宇文)盛爲越國公，邑萬戶”。同書《越野王盛傳》亦記，“武成初，封越國公，邑萬戶。天和中，進爵爲王”。至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即爲楊堅所殺。造像題名中的“越公府”疑即上述宇文盛的越國公府。若然，此造像題名當在北周武成年間(公元559—561年)。題名中的柱國參軍、記室、大都督司鎧等皆北周官吏之名，可爲佐證。唯“同官烽帥”秩不見記載，大約周在同官縣(今銅川縣)東北之馬蘭山設有烽火台，置烽帥以備邊警者。

最後還有兩個合邑的集體造像碑，即《邑主雷惠祖合邑子彌姐顯明等造像記》和《邑主弥姐後德合邑子卅人等造像記》是也。此二造像記前人皆未曾著錄，從前治羌族史者以爲彌姐是羌姓中的稀姓，自此二碑一出，便知彌姐氏與上述雷氏、同瑀氏、昨和氏相同，都是西羌中的多數姓氏，在關中分佈是很廣的。前一個碑的陰面原有題名四列；因雨淋風蝕之故，上二列約包括十五、六人的題名漫漶不清，只餘下二列可辨。又碑右側的題名，有三人與碑陰重複(注一)。故題名全部只餘六十三人。在六十三人內，姓彌姐者三十五人，佔題名總數的一半以上。姓雷者十六人，爲次多數。姓鉗耳者一人。以上三姓共五十二人，都是羌族。其次，姓張者四人，姓楊者三人，姓劉、秦者各一人，可能都是漢人。此外還有一奇姓，即供氏，有二人：供鳥□，供子述。不知是何族。

後一個弥姐羌人的造像碑方式與上一碑相同，都是四面造像，四面題名。造像的人數，碑記稱爲三十人，但在唐代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村邑中的人們造像無石，把此碑陰面下方一列的題名和刻像全部磨去，就在磨去的地方把自己的造像記和題名刻在上面了。隋唐二代的字體顯然不同，前者近於北魏的隸楷，後者爲一般

(注一)三人在碑陰者有佛堂秩銜，在右側者稱邑子，故相重複。

的行書，一看就能分別清楚。因為此故，原來碑上的題名去掉三個，只餘二十七人。此二十七個造像人，姓彌姐的最多，共二十二人，佔絕對的多數。其次姓雷的二人，為次多數。此外張劉和辨不清姓氏的各一人。張姓的人是個刻字匠，題名中的“都維（那）張浮圖磨”就是他。張浮圖可能是他的姓名，此人是漢人，是西域胡，便弄不清楚了。此碑遲於前一個以彌姐羌為主體的造像碑僅二年，名字無一人相同，可知它們代表兩個彌姐羌的村邑。

以上都屬於合邑羌姓（只有少數其它族姓）造像的一類。下面再述羌姓的家族造像。

《雷文伯造像銘》形式簡單，無庸多述。以前人未著錄，編入附錄一內。

《雷明香為亡夫同瑀乾熾造像記》主要包括了雷明香母家和其亡夫同瑀乾熾家兩個家族。丈夫的家族比較簡單，翁同瑀天壽、姑夫蒙俗男為上一代。雷明香與夫同瑀乾熾為中一代。女兒四人，即同瑀貴容、貴妃、貴宗、貴女為下一代。母家的家屬比較複雜。親兄弟二人，即雷偁標和雷樹五；從弟七人，即雷顯慶、雷玉賢、雷顯暉、雷鴻遠、雷玉祖、雷洪熾、雷海傍，是一代。“外孫伏奴”和“外孫僧妙”無姓氏，繫於從弟雷顯慶等之後，應係從第一代的兒子，對於雷明香應稱“外甥”，不稱“外孫”，是又一代。

除上述兩個主要家族外，雷明香的女兒四人都已出嫁，大致是同瑀貴容配雷季玉，貴妃配雷鴻慶，貴宗配夫蒙雙養，貴女配夫蒙貴慶。後兩對夫婦之一，生一女名夫蒙榮姐，即題名中的“外孫夫蒙榮姐”。

此外還有一位荔非沙女，與雷明香的關係不明，可能是亡夫的婢妾。

從上述六對夫婦的姓氏，即同瑀、雷、夫蒙三姓，彼此之間代代

聯婚，說明他們行的是同族異姓的內婚制。

從題名官銜又可以看到雷明香的母家和夫家都是羌族中的豪族大姓。丈夫是曠野將軍殿中司馬，爲正一命官。哥哥是橫野將軍彊努司馬，爲正二命官。弟弟是宣威將軍輔朝請別將，爲正四命官。從弟雷奉昌是雲陽縣令，雷玉賢等四人爲大學生。當時的“大學生”也是一種官秩，屬於府史雜色一類，是一個起碼的小官(注一)。雷明香的一個從弟是建忠郡的大學生，又一個是宜州的大學生。建忠郡係北魏永安元年(公元 528 年)所置，在今三原縣。據宋敏求《長安志》卷 20 云，至周武帝建德二年(公元 573 年)此郡始廢，以三原屬馮翊郡。雷明香造像在天和六年，故仍有建忠郡之名。宜州的州治在華原縣，今耀州。所屬有二郡：一曰通川郡，華原、土門(富平縣西北七十里)二縣屬之。二曰宜君郡，宜君、同官二縣屬之。從建忠郡和宜州的郡縣，大致可以推測雷明香碑的所在地，或在建忠郡的三原，或在宜州的州治之耀州。

《郭羌四面造像銘》記文殘毀不易辨，上無造像年月日，亦無造像地區。唯記文中有一段云：“佛弟子平東將軍右光祿宜州從事宜君望(?)□□□□□□”前者似即郭羌的官階。按北魏官品，四平將軍與光祿大夫皆第三品。郭羌爲宜州從事，又爲宜君望□，下文不明，可能都是他的官銜。從前史志對宜州、宜君郡縣的沿革，每多糾葛，今試清理之，對於郭羌造像銘的年代問題或可得一線索。《魏書·地形志》北地郡宜君縣下云：“真君七年(公元 446 年)置。”此爲宜君置縣之始。宋敏求《長安志》卷 20 同官縣下云：“(魏)莊帝永安元年(公元 528 年)，(以同官縣)屬宜君郡。”則宜君改郡當在永安元年。與宜君有關之宜州，其建置年代一般史志亦有謬誤。唯《周書·文帝紀》下記“魏廢帝三年(公元 554 年)春正月，改北雍

(注一)以上官品命數參考《通典》卷 39《後周官品》。



州爲宜州。”宜州的治所與北雍州同，皆在華原縣，即今之耀州。《隋書·地理志》謂“華原縣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宜州。”與《周書》所記相合。西魏、北周時宜州所屬的郡縣，無直接紀錄。以隋唐兩代地志言之，北周時的宜州大致與隋義寧間和唐代的宜君郡相同，包括華原、宜君、同官諸縣，唯當時宜君稱郡，不稱縣，與隋唐有別。《隋書·地理志》謂北周宜君郡的罷置在隋初。《長安志》謂在開皇三年（公元 583 年），罷宜州則在大業三年（公元 607 年）。宜州和宜君郡的沿革既明，對於推測碑銘的年代和地點就可以發生一定的輔助作用。因爲雷香明碑內有宜州和建忠郡的記載，我們便可推測此碑在建忠郡和宜州之中。又因爲在郭羌銘內宜州和宜君郡並稱，所以我們也可以推測郭羌銘的年代在北周，其上限不能早於西魏廢帝三年（公元 554 年），下限不能遲於隋開皇二年（公元 582 年）。

我們對此碑銘感覺最困惑者，就是郭羌的部族成分問題。上一代兩個母親，一李氏是漢姓，一蒲氏，蒲即蒲，爲氐姓。中一代羌妻盧胡仁，亦係一少數部族的姓氏。弟婦白女定，似一龜茲胡姓氏。下一代外甥二人皆姓雷，顯然又是一羌族姓氏。一門親眷，氐、羌、雜胡諸姓皆備，在其它碑記題名內是少見的。以我所知，唐代以前，無論鮮卑西羌大都保持着族內婚制，不與外族通婚。只有上層人物，如貴族、達官則不在此限。郭羌家屬親眷的姓別如此複雜，是否也和他的民望土豪的身分有關呢？

隋初留到現在的家屬造像碑銘，據我們所知，只有開皇四年（公元 584 年）的《錯耳神猛造像記》（注一）。此碑的銘文曾載入《陝西金石志》卷 7，但因作者武樹善（渭南人）只看到拓本的碑陰和碑陽，沒有看到碑的兩側，所以記後的題名遺漏了一半以上。此碑的

（注一）隋大業六年（公元 610 年）的《隋錯耳君清德頌》既非造像題名，亦在隋初，不具引。

所在地不明，拓本現存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造像分四面，正面刻佛像，碑陰左上刻佛像，下面題名；兩側上面刻佛像，下面題名。碑記已著錄於《陝西金石志》，今不具引。造像的時期是開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碑名應題為《鉗耳神猛為亡姑造四面像記》。題名內包括兩個家庭的生死成員，一個是鉗耳神猛的家庭，另一個是他的姑母鉗耳女休的家庭。《陝西金石志》連造像人鉗耳神猛的家屬也未記全，更不用說姑母的家屬了。現按照次序，為之排列如下：

“猛妻甞神妃 猛母雷明姬 姪兒鉗耳神猛 息  
鉗耳方貴 妻党暉容 息鉗耳遵略（以上是造像人的家  
屬） 亡姑夫平望夫蒙鍾扶（注一） 像主亡姑鉗耳女休  
亡女夫蒙容女 亡女夫蒙女□（以上是像主的家屬）”

以上題名包括兩個家庭裏的四對夫婦和未婚的三個子女。這四對夫婦是猛父鉗耳某某和猛母雷明姬，鉗耳神猛和妻甞神妃，猛子鉗耳方貴和其妻党暉容以及姑夫夫蒙鍾扶和姑母鉗耳女休。三個未婚的子女是猛子鉗耳遵略，姑夫女夫蒙容女和夫蒙女□。從男女的姓氏，知鉗耳氏與雷氏、甞氏、夫蒙氏的互為婚姻，是一種同族異姓的族內婚制。

以上屬於家族造像的一類。

從上所述兩種造像類型，可以看到北周時的關中羌民具有下列的兩大特點：第一，在渭河以北同州、華州東部雖成為北族麇集之區，而蒲城、白水、宜君、同官（銅川縣）、宜州（耀縣）等地則仍為西羌諸姓的集中分佈所在。但這些州縣自古以來就有漢族分佈其間，故當羌族徙入之時，漢羌二族分別居住，形成漢村和羌村的犬

（注一）“扶”即“拔”的別體。

牙相錯狀態。最初有一部分漢人還迴避與羌人同居(注一)，但時間一久，相安無事，漢羌兩族逐漸產生同村雜居的現象了。北族入關也有類似的情況，最初是北族居城鎮，漢羌居鄉村，但經過一個時期以後，羌村之中逐漸也有北方的部民居住了。例如《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記》題名內有賀蘭萬吉、賀蘭延暢二人；《同瑋氏造像記》題名內有尉遲袖祭一人；《邑主同瑋龍歡合邑子一百人等造像記》有吐盧長弼、普六茹興龍、普六茹岳洌三人，皆其例證。有的村邑則漢人、羌民和北方諸族雜居一起，如《王妙暉造像記》內的彌姐婁、呼延蠻獠、賀保勝、聞獠是與漢人雜居一村，即其例證。具有各種部族成分的人們同邑而居，過着共同的經濟生活，又以信仰相同，共同建立佛像，從此自然而然引導各族人民走上了相互融合的道路。第二，唐代以前關中渭河以北各地的羌族和北方部族長期盛行同族異姓的內婚制。例如前述北魏時的《夫蒙文慶造像銘》，記載夫蒙氏的婚偶是蒙氏和雷氏；北周天和元年的《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記》，記載昨和氏的婚偶為屈男氏和罕开氏；天和六年的《雷明香為亡夫同瑋乾熾造像記》記載同瑋氏的婚偶為雷氏、夫蒙氏，可能還有荔非氏；直到隋初的《鉗耳神猛造像記》記載鉗耳氏的婚偶為雷氏、蒙氏和夫蒙氏。這說明渭北羌民的婚姻是行同族異姓的內婚制的。渭北的北方諸族也有類似的情況。北魏時的《焦延昌造像記》記載焦氏的婚偶為呼延氏，間或也和某部族以漢姓為姓的張氏相婚配；北周時的《合方邑子一百數十人造像記》記載擄拔纂的妻為“擄拔女子”，此皆可為北族實行同族內婚制的證明。擄拔纂和“擄拔女子”為婚可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擄拔纂

(注一)《太平寰宇記》卷29華州鄭縣下云：“漢京兆渭南郡所管諸縣多在渭水之南。蓋因後漢安、順間，西羌擾亂關中，縣人移於渭水南鄭縣界，繕修壁壘以居，年代綿遠，因稱為漢縣。”

和拓跋鮮卑中的某一姓女子結婚。又一種解釋是掄拔纂與同姓的一女子結婚。我看後一種解釋的理由是比較充分的。第一，碑上題名每一男女之前皆冠以本姓，故掄拔當為姓氏專名，而非指一般的拓跋鮮卑。第二，拓跋鮮卑自古有同姓相婚之習。北魏太和七年（公元 483 年）孝文帝曾下令禁止鮮卑人實行同姓相婚（注一），一時雖有成效，但隔了七十多年到北周武成二年時，掄拔纂一家又故態復萌，實行同姓相婚了。總之，不論同族異姓相婚或者同族同姓相婚，都屬於族內婚制的範疇之內。所以族內婚制是唐代以前關中渭北羌族和北方諸族婚姻的主要形態。

雖然如此，但是渭北羌民的婚姻和其它習慣在唐代以前已經有了與漢族及其它部族相互融合的象徵了。遠在十六國之時，前秦和後秦的統治階級，例如苻堅和姚萇的后妃已經有不少是漢人或其它部族成分。到北朝時，氏族已經十分漢化，在婚姻和其它習俗上與漢人幾乎沒有什麼區別。氏族以外還有一些部族成分來路不明的姓氏，例如北朝末年的郭羌，他的家族既與氏族姓的蒲氏為婚，又與羌姓的雷氏為婚，有時又與龜茲姓的白氏以及難於考證的魚氏之類的家族為婚。這樣，比較保守的羌族也有一些人們受外界的影響，慢慢衝破傳統的各自為婚的族內婚制了。不只在婚姻方面，就是其它政治、宗教以及命名方面等等，渭北羌族因與漢胡雜居，自然而然就走上了相互融合的道路。在北朝時，渭北羌族的階級分化已經十分懸殊，有不少上層社會的羌人作了北朝的高級官吏，其中文官如北魏吏部尚書鉗耳慶時（王遇），武官如北周虎賁給事中散大夫咋和富進、□□將軍右員外常侍都督罕开舉、宣威將軍輔朝請別將雷樹五等。一經為官為將，他們的生活習慣便與在村邑的羌民傳統日見脫離關係，與當時漢人胡人沒有區別了。羌族

（注一）魏書·高祖紀。

原來是信巫術的，自姚秦以來逐漸接受佛教影響，信仰浮圖，所以在北朝時與漢胡在一道建立寺宇，造像題名，蔚為一時風尚。更有趣的是北朝末年羌人的名字跟當時北族鮮卑的名字約略相同。例如男的稱醜奴、洛受、伏奴、阿胡等，女的稱洛容、蘭奴等，都類似於鮮卑雜胡的名字。這些情況都在說明羌、漢、鮮卑等族已有日趨於融合的傾向。

那末，關中渭北的羌民在什麼時候才跟漢族、北方諸族融合在一起呢？這一問題比較複雜，還需要進一步詳細研究。就碑銘所見，關中羌人在隋唐時仍很活躍，稀見的羌人複姓仍不時出現於碑碣和造像題名之內。但隋唐時的關中羌族與北朝時的不盡相同，大致具有四個特點：第一是渭北羌族的上層人物，從前的活動多限於在渭北各地，以“民望土豪”出現於各個朝代。其間雖然也有個別的朝中顯宦和外州刺史，但跟原來的家鄉始終維持着不可分離的關係。此點從渭北各州郡縣的造像題名可作證明。到了隋唐時，羌族上層人物的活動跟着隋唐政權的統一而亦逐漸擴大，在渭北以外，全國範圍內東西南北的許多州縣不時有他們的蹤跡可尋。例如馮翊郡的羌豪壹仁弘，在隋末義寧元年（公元 619 年）李淵由晉陽入關時，率兵二千多人降淵於蒲版（山西蒲州），從定長安。唐初，先授仁弘陝州（河南陝縣）總管，後又歷任南寧州（雲南曲靖縣北）、戎州（四川宜賓縣）、廣州（廣東番禺縣）都督。貞觀十六年（公元 642 年），以受賄罪，坐徙欽州（廣東欽州）（注一）。又《隋鉗耳君清德頌》初為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所著錄。碑題云：“大隋恆山郡九門縣令鉗耳君清德之頌，大業六年（公元 610 年）建。”序云：“君名文徹，華陰朝邑人。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為君長，因以地為姓。曾祖靜仕魏為馮翊太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

（注一）《通鑑》卷 196《唐紀》貞觀十六年條。

康，周荆、安、寧、鄧四州總管別駕。”鉗耳文徹，朝邑縣人，與苻秦時之部大鉗耳丁比，北魏時之宕昌公鉗耳慶時皆為同郡同姓，如何能與周代的王子晉扯到一起呢？曾祖靜的活動尚在渭北，祖父朗便向西方南秦州一帶發展了，父康隨着北周的政治勢力向關東荆、鄧等州為總管別駕。鉗耳文徹雖然係一縣令，但他遠至雁門以北的九門縣一帶，較其祖先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另外還有渭北的夫蒙氏，唐代開元中有安西都護夫蒙靈督。《王摩詰詩集》卷1有《不蒙都護歸安西詩》，此不蒙都護當即安西都護夫蒙靈督。此公原係馮翊郡“土豪”，出仕則移居長安，繼而為安西都護，往來於安西、長安之間，故王維以詩贈之。1955年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在西安市西郊郭家灘掘得一《唐左神威軍正將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輔國大將軍兼試太子賓客武威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上柱國夫蒙府君墓誌銘》，序略云：“君諱鎰，字英華，故常侍之子也。常侍累承帝命，奉詔宣威，為國之勳。□城其億，名醫既診，上藥無調，君乃抽刀投股，割肉為膳。嚴父餌之，痛瘳。尹京鄭公表聞於天，制下所司，厥旌孝行。自後階二品，邑一千，掌禁軍，匡帝業。庚辰歲十月庚辰，終於左神威之官舍，春秋四十有三。以其年十一月廿日遷殯於常侍公之塋側也。夫人潁川許氏、嗣子啊。”夫蒙鎰卒於庚辰年，當即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唐代之置安西都護四鎮節度使在開元六年（公元718年），斯夫蒙鎰之死上距夫蒙靈督之為安西都護，最多止二十二年。與序文中之鎰父常侍“累承帝命，奉詔宣威”，及邊城積勞生疾，割股醫病等事聯合起來，鎰為夫蒙靈督之子無疑。靈督父子既為京都顯宦，所以官邸墳墓俱在長安，從此與原籍馮翊便逐漸隔絕了。夫蒙靈督之在長安尚且如此，則鉗耳文徹之在恆山郡九門縣與甕仁弘之遠徙於南海欽州可以推知。在唐代的時候，關中羌族並不限於渭北一隅的活動，西至安西，北至雁門，南至廣州，無不

有其蹤跡。這是關中西羌漢化的原因之一。

第二，關中西羌的婚姻，在隋代雖然有些羌民如鉗耳神猛的家庭仍然保持着同族相婚之習，但越到後來婚姻的範圍越漸擴大，特別到了中唐以後，就是僻居在渭北各州縣的羌民，漢羌通婚已經成爲數見不鮮的風俗了。上段所述隋代恆山郡九門縣令鉗耳文徹、廣州都督覺仁弘、安西都護夫蒙靈督，他們的婚配是羌是漢，皆無可考，可以不談。《唐夫蒙鎰墓誌銘》謂鎰之夫人爲潁川許氏，許氏爲一漢女無疑。《陝西金石志》卷 13 載天寶五年（公元 746 年）的《雷詢墓誌銘》，云雷詢爲馮翊郡郃陽縣人。按其地望，當爲羌民。娶妻趙氏，亦系一漢女。《金石萃編》卷 66 載大曆六年（公元 771 年）康琬所書的《前路州黎城縣尉曹秀臻爲亡女惠寂造陀羅尼經幢》，序云，幢主曹秀臻之妻爲馮翊雷氏。經幢在蒲城縣西北的堯山鄉。幢主爲蒲城縣一漢男，雷氏爲馮翊一羌女。此又是渭北漢羌通婚之一例。此外，《太平廣記》卷 115 引《廣異記》云唐代一位羌人名鉗耳含光，出爲房州竹山縣（在湖北）的縣丞，娶陸四娘爲妻，年代不詳。長安的羌漢既已互婚，那末在外作官的鉗耳含光娶一漢女爲妻，更不足爲異了。上述諸例，或爲長安顯宦，或爲羌中望族，或爲外縣官吏，他們的社會地位比較崇高，婚嫁之事往往不受傳統習慣的拘束。那末僻居渭北各縣的羌村農民是否也跟他們一樣實行族外婚制呢？關於此點，頗關重要，我們試分析一下貞元五年（公元 789 年）《奉先縣懷仁鄉敬母村經幢》後的羌民題名便知其底蘊。此經幢後的題名，連同僧道，包括漢羌男女一百二十餘人，在毛鳳枝編的《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 2 全部給以著錄。現在我們選擇跟羌姓有關的題名照錄於下：

“大幢主扈從游擊將軍守左金吾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正員、賜金魚袋、上柱國昨和尚高□。 次生花主雷昌。 平

座主李提伽母屈氏。 郭廸母雷(氏)。 雷進。 雷昌妻呂(氏)。 党金藏。 党金逸。 □成施主昨和方妻李氏， 男文晟， 女寶心。 雷曜母章氏。 雷寂妻杜(氏)。 昨和進， 妻淨德， 女金運閣李承昂。 陳玘妻雷(氏)。 朱九娘， 孫党寶。 雷昌男嘉和。 雷寂女大娘、二娘。 楊宇絢妻和氏， 女三娘， 女賢娘。”

以上十七項內包括了建經幢男女羌民的各種親屬關係，其中有夫妻關係、父母子女關係、祖孫關係和岳父母女婿關係等等。從各種關係的姓氏可以看到，唐代在奉天縣懷仁鄉敬母村內，羌漢互婚的習俗已經十分流行了。漢男娶羌女為婦的，有李提伽之母屈氏，郭廸之母雷氏，陳玘之妻雷氏，楊宇絢之妻和氏，共四起。反之，羌男娶漢女為婦的，有雷昌妻呂氏(可能是氐人)，昨和方之妻李氏，雷曜母章氏，雷寂母杜氏，党寶之祖母朱九娘，共五起。此外，昨和進之妻淨德，是佛名，不知其姓氏。其“女金運，閣李承昂”，語義不明，疑即昨和進之女金運適李承昂為妻，或贅李承昂為婿。如果不錯，漢男娶羌女的例子又多了一起。唐代的奉天縣就是西魏北周的蒲城縣，懷仁鄉敬母村在縣東北，與唐玄宗的泰陵相近(注一)。蒲城縣自古以來就是西羌村落的集中之所，這裏的羌漢通婚既如此盛行，其它地區羌族婚俗的變化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關中羌族的稀有複姓，從唐代起逐漸改變為漢式的單姓。在唐代以前，特別在西魏、北周時期，羌族和其它北方諸族一樣，原封不動地保留着原來的複姓。到了唐代，各部族的複姓雖然一部分仍然保留着，但有許多複姓，隨着漢族與非漢族之間的經濟合作、婚姻相通以及其它共同生活的交往日密，逐漸簡化為漢式的

(注一)宋敏求《長安志》卷18 蒲城縣。



單姓了。在上述經幢的題名內，羌族原來的複姓已經改變為若干簡化的單姓，例如李提伽之母屈氏，應是羌複姓屈男氏的省稱；楊宇絢之妻和氏，應是羌複姓昨和氏的省稱。這種變化恰巧發生在漢姓較多、羌漢互婚的懷仁鄉敬母村之內，而且發生在羌女嫁漢男的場合之中，所以其簡化的單姓往往與當時社會上所流行的單姓相合。據我所知，少數部族複姓簡化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一種最普通的方法就是在原來複姓的基礎上，減去一個或幾個複音的字，留下一個在漢姓中比較常見的單音字，作為簡化的單姓。這種方法在唐以前的幾百年，魏孝文帝簡化代北複姓為漢式單姓時已經實行過，效果顯著。關中羌民用這種方法改複姓為單姓的很多，例如屈男氏改為屈氏，昨和氏改為和氏，罕开氏改為井氏，夫蒙氏改為蒙氏，同埽氏改為同氏等等。在唐代我們只看到上述屈男氏之改為男氏，昨和氏之改為和氏。又一種方法，可能是因為在原來複姓內找不到一單字與當時流行在關中的漢姓相同，於是產生了另一些方法：一種方法是捨棄了複姓中的任何一字，只取其一音與漢姓相同或近似者作為它們的單姓。例如開元時關中夫蒙氏之改姓為馬即其一例。《唐書》中的《高仙芝傳》、《封常清傳》和《突厥傳》都稱安西都護或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督為“夫蒙靈督”，但《李嗣業傳》、《段秀實傳》則稱之為“馬靈督”。《舊唐書》也有類似的記載，在《李嗣業傳》、《段秀實傳》、《劉全諒傳》皆稱“夫蒙靈督”為“馬靈督”。從此可知開元年間關中羌姓夫蒙確有改為漢化單姓馬的事實。另一種方法是並無音與義的根據，以某些偶然的理由，取漢姓中的一個單姓作為他們的姓氏。《新唐書·孝友傳》有一段故事，關中同官縣有同蹄智壽和智爽兄弟二人，其父為同族內的仇家所殺，兄弟二人為父復仇，爭相自首。《舊唐書·孝友傳》亦記載這段故事，此智壽、智爽兄弟不姓同蹄，而姓周。此周的姓氏顯然是從同蹄複姓簡

化而來的。但爲什麼以周爲姓呢？我有一個簡單的想法，就是同歸之“同”，字形與“周”相近，所以就以“周”代“同歸”。這是一種不邏輯的理由，但一經用，便成舊例，至今銅官縣有很多的人們姓周姓同，我想至少有一部分姓氏起源於羌姓的“同歸”。

最後關中渭北的羌民還有一個特點，即第四特點，即隋、唐二代渭北州縣的農民起義和部族戰爭很多，有的羌民離開鄉里，參加外地的農民起義，不能回村；有的羌民在本州縣起義，被統治階級派官兵來屠殺鎮壓；有的羌民因參加部族戰爭，結果發生死亡和流亡現象，這樣就使原來定居在渭北羌村內的羌民分崩離散，流落各方，後來這些羌村遂成爲外來漢族農民的新居村落。欲說明此點，我們可引隋開皇六年（公元 586 年）《邑主弥姐後德合邑子卅人造像記》的所在村落爲例。在隋初開皇年間，此村的居民以羌姓弥姐氏爲主。前文我們已有統計，在二十七個造像人中姓弥姐的共二十二人，姓雷的二人，姓張、劉和辨不清姓氏的各一人。此村顯然是一個羌村。隔了八十年到唐代乾封元年（公元 666 年），村裏的居民以造像無石，就在原碑上作記題名。後次的題名和隋初開皇六年的題名大不相同。後次題名共二十五人。其中姓氏可省識者，二十二人。姓氏極爲分散：雷姓二人，弥姐姓一人，爲羌姓。此外，任、張二姓各三人，楊姓二人，康、孫、紀、鬲、李、元、鄧、王、梁、韓、房諸姓各一人。隋初弥姐羌姓爲村裏的主要姓氏，到乾封初年，由主要姓氏變爲孤姓，其它羌姓亦逐漸減少。區區一村之內，二十餘家便有十六姓以上，這是外地雜姓農民移居於此新建一村之象徵。村裏的弥姐羌爲什麼向外遷徙呢？主要原因恐與隋末唐初渭北的農民起義和官軍的出兵鎮壓有關。據文獻記載，隋代末年孫華起兵於同州，白玄德起兵於土門，蒲城人郭子和率衆起兵於榆林。上述三事或在同、華二州之內，或與二州有關。較遠者如劉

企成之在慶州，荔非世雄之在涇州，亦率領漢羌割據一方，與渭北羌衆亦不能沒有影響。到了乾封年間以後，又經過安史之亂和其他戰爭，而党項、羌渾、奴刺諸族又趁機南下，羌村所在的馮翊、澄城、華原(耀州)、富平、同官(銅川)諸縣無不被其殘擾。在這種情況下，渭北羌民之分崩離析，流落四方，更是無法避免的。雖然如此，渭北的羌民在唐代中葉以後總是一天比一天的漢化，最後與漢人融合爲一族，彼此之間無所區別。在宋代明代，關中雖然仍有党、雷、井、屈、和、同、蒙等姓，但他們都是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已經看不到有絲毫羌族的因素了。

## 附錄一 關中北魏北周隋初未著錄的 羌村十種造像碑銘

### (一) 《夫蒙文慶造像銘》

“神龜二年歲次戊戌□月戊申朔十五日，夫蒙文慶爲亡父亡妹七世父母、因緣眷蜀，造立石像一區，減割家珍，雇良匠，仰感帝王覆被之恩，迨所生顯育之重。奇形異容，□□□明工不能加其巧，是釋迦數法，豈非極聖姿□之形容？信徒禮敬，莫不啟悟。願使龍年三會，恆在初首。佛弟子清信士比丘光姬，願使生天妙朗，國土无□，略受□□。若墮三徒(注一)，速得解退。

像主夫蒙文慶

母雷男昏

父名道明

妻壹□□

祖名□□

曾祖名屈闌

□平縣令

建□將軍宜□□□

高祖名南地□□

高祖母名□昏拔

合家大小善願從心，功廣成就：

---

(注一)“徒”爲“塗”之譌。

妻清信士雷豐供養佛時

蒙文慶供養佛時

佛弟子息祖□供養佛時

佛弟子息道郎供養佛時

親信女照宜供養佛時

親信女和如供養佛時”

## (二) 《雷漢王等造像記》(殘)

碑陽刻佛像，碑陰記文漫漶過甚，不能辨識。記後云：“□州建忠郡安□縣侯，年七十六，今□忠部太守。永安二年十一月朔十日。”題名額上書“建左□□□□封授□廣威鼓六角東都督諸軍宗海生”。下題名，像主名不詳，像主的家屬有：

“祖雷支油，北地郡□令。

伯父雷漢。

父雷漢王字人起，雲陽令。

弟雷衆熹，弟安王，弟安慶，弟□祖，息伯外，息外周，息□□，息定周，息羊奴。

伯父雷漢仁。”

## (三) 《雷樹等五十人造像銘》

“□榘(注一)五十人等減割家珍，專心罄□，採石買山，延媯巧匠，造像一區。□□皇帝□□(以上在碑陰左側末行)

□□□□□彌勒□□龍花三會□在初首所願如是，一心奉□。

前將軍左銀青光祿淮州苻壘縣令汝南郡丞假懷州刺史都督雷樹  
邑子雷申生(以上在碑正面右側)

(注一)“榘”是榘的簡寫。

邑主雷但生	香火雷保安	邑正雷万度	唯那雷阿智
平望雷周生	錄事雷僧胤	侍者雷武勇	典坐王萇命
忠正雷龍文	邑子雷清光	邑子雷彗侯	邑子雷榮真
邑子雷万生	邑子雷萇洛	邑子雷伯蚪	邑子雷桃樹
邑子雷伏念	邑子雷龍樹	邑子雷虎子	邑子雷道生
邑子雷周光	邑子雷阿昌	邑子雷豹魚	邑子雷胤受

(以上在碑正面)

邑子趙郡功曹雷伏敬 邑子雷石龍 邑子魯陽郡守雷□  
周(以上在碑左側)

邑子雷文照 香火雷阿□ 侍子雷阿牛 典坐雷文伯  
宗正邑子雷元豐 邑子雷阿胡 邑子雷彗拔 邑子雷  
豐□ 邑子雷衆怙(注一) 邑子雷川伯 邑子雷豐  
邑子雷雙豐 邑子雷衆略 邑子雷阿□ 邑子雷定□  
邑子雷興□ 邑子雷黃伯”(以上在碑陰,最後一行即碑記)

#### (四) 《邑主儁蒙□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記》

“□□□□薩雲表誕世之容,妙法開敷,波若闡擁惠之音。如  
來□□□□殊遷祀像法隆隆床宗者尠,是以大代永熙二年□□□  
月戊子朔八日乙未,北雍州宜君郡黃堡縣邑主儁蒙□娥合邑子卅  
一人等,自慨丕踰流轉无竊,故減割家珍,聘□□□□大路顯敬之  
處敬造石像一區。功就成訖,令國祚永隆,□□□治,下願慶七世  
永超八難。神縣福堂,濟生死之苦,願諸□□□蒙揀衆患,消□□  
願初首書人夫蒙顯達。(以上在碑右側)

比丘僧郭僧景名豐洛 沙彌夫蒙僧貴 邑主清信儁蒙

(注一)“怙”是“懷”的簡寫。

文姬 邑主清信龔姬娥 邑謂清信同瑋雲□ 邑謂清  
 信同瑋定姜 維那清信□扶達 維那清信同瑋彌弱  
 彈官清信夫蒙妙朱 彈官清信同瑋矢姬 邑正清信同瑋  
 娥媚 邑正清信朱阿儻 典錄清信同瑋阿美 典錄清  
 信同瑋阿陵 香火清信王蘭小 香火清信同瑋磨忸  
 邑子清信□□□ 邑子清信□□□□ (以上在碑陽)  
 亡邑主清信僕蒙阿護承 亡邑主清信王歸香 亡惟那  
 清信龔姬香 亡惟那清信同瑋龍姜 亡邑子清信同瑋文  
 姬 亡邑子清信田文姜 邑子同瑋□男 邑子夫蒙連  
 花 邑子同瑋□貴 邑子夫蒙祿花 邑子龔俗男  
 邑子荔非貴姬 邑子同瑋道如 邑子王俊男 邑子同  
 瑋顯妃 邑子同瑋妙花 邑子子(?)向妃 邑子夫蒙  
 照男 邑子雷貴姬 邑子同瑋明月 邑子劉雙□  
 邑子□想姬 (以上在碑陰)  
 邑子清信同瑋軒朱 邑子清信同瑋妙娥 邑子清信同瑋  
 眞朱 邑子清信同瑋樹姬 邑子清信龔亭□ 邑子清  
 信同瑋樹姬 邑子清信成定姬 邑子清信同瑋照姬  
 邑子清信楊(?)妙□ 邑子清信夫蒙白伏 邑子清信鉗  
 耳支誠 邑子清信同瑋枝達 邑子清信同瑋鳳凰 □  
 □□□□□男姬 □□□□□□伏男 □□□□□□  
 姬 □□□□□□□”(以上在碑左側)

#### (五) 《雷文伯造像銘》

“□眞容隱，輝妙亭響，太空遼闊，目非通權，无以狀其悞。是  
 以雷文伯減割家珍，爲亡父造石像一區，及七世前亡后死，速離三

塗，早得解脫。有(注一)爲國主永康，陆(注二)徒父母，一切衆生，咸成斯願。

保定元年歲次辛巳七月乙□朔廿九日癸酉功訖。”

(六) 《邑主同瑯龍歡合邑子一百人等造像記》

“□□□□□□□□邑子一百人等進不值三光之照，退不遇八音之諧。知命非常，灑(注三)流四使。故採石名山，雕磨拭瑩。減割家珍，樹長生之果；刊削衣□，脩越苦之業。止爲皇帝羣僚、七世所生，法界有□，咸脩十地，成无□道。

周保定二年歲次□□□□□□□□。(以上在右側下方)

都邑主同瑯龍歡 比丘僧演 香火同瑯智達 香火公孫合達 像主同瑯鳳樹 像主同瑯延綱 邑正同瑯猿生 邑正呂道萇 唯那同瑯黑奴 唯那同瑯景業 典錄同瑯世珍 典錄同瑯种扶 化主同瑯珍國 化主同瑯合和 典坐同瑯男真 典坐同瑯榮儁 邑諸同瑯神和 邑諸同瑯妙洛 齋主同瑯紹儁 洽伴同瑯□達 邑子同瑯雙海 邑子同瑯龍樹 邑子同瑯樹達 邑先同瑯屈朱 邑先同瑯方周 邑先同瑯元樹 邑先同瑯馬生 邑先程廣香 邑子同瑯慶安 邑子同瑯神歡 邑子荔非景暉 邑子吐盧長弼 邑子郝子哲 邑子同瑯子亮 邑子姜景儁 邑子同瑯洪顯 邑子同瑯景珍 邑子楊元景 邑子同瑯思和 邑子同瑯元智 (以上在碑陽)

(注一)“有”爲“又”之誤。

(注二)“陆”爲“師”之俗字。

(注三)“灑”卽“灑”。



像主同瑀清奴 香火同瑀由洛 邑正同瑀雙扶 邑長  
同瑀顯亮 邑長則景通 化主同瑀□□ 但官(注一)  
同瑀□稚 但官公孫永興 邑子同瑀神祭 邑子析婁  
道生 邑子胡歸生 邑子同瑀顯宗 邑子公孫海慶  
邑子公孫□興 邑子同瑀清席 邑子同瑀子祭 邑子  
公孫祥嵩 邑子公孫子義 邑子同瑀伯隴 邑子田子  
祥 邑子公孫壽壽 邑子公孫始達 邑子同瑀榮族  
邑子同瑀族昌 邑子同瑀合暉 邑子散延福 邑子趙  
伏明 邑子劉元集(以上在碑陰)

邑正同瑀龍慶 邑主同瑀□□ 像主同瑀□□ 香火  
同瑀僧祭 邑謂普六茹興龍 化主同瑀伯洛 化主梁  
景和 邑謂梁多郎噲 邑子齊景悅 邑子同瑀□□

邑子同瑀太伯 邑子同瑀樹□(以上在碑左側)

邑子同瑀龍世 邑子同瑀光生 □□□□□和 邑正

同瑀伏□ 香火同瑀雙□ 香火普六茹岳洵 化主吳

僧和 邑子同瑀阿□ 邑子同瑀阿僧 邑子同瑀安定

邑子□□屯王 邑子同瑀□□ 邑子同瑀胡奴 邑子

張安貴 邑子□□□通”(以上在碑右側造像記的上方)

### (七) 《雷明香爲亡夫同瑀乾熾造像記》

“夫冲元虛家，妙趣理幽，應難尋悟，□□□□，□金鏤木以表  
眞容，毋令佛弟子雷明香知世非常世，減割家珍，爲亡夫同瑀乾熾  
敬造石像一區，願亡夫託生西天，無量壽國，衆恣(注二)崩消，万善

(注一)“但官”即“壇官”的俗寫。

(注二)“恣”是“惡”的俗字。



□□三□同□□□□□□”(以上在碑左側)

名如次：

“像主郭羌 妻盧胡仁 父五王 母李羅妙。(以上在碑陽) 母蒲寄疆 叔父趙王 叔母王毛女 弟都督洪慶 妹羌女 弟雙娘 妹僧妃 弟思恆 姪万石 外生雷輝慶。(以上在碑陰) 弟婦白女定 弟婦楊先妃 弟婦魚阿貴 姪女郡好 姪女明化 外生雷廣□ 兒方遷 兒廣□”(以上在碑右側)

(九) 《邑主雷惠祖合邑子彌姐顯明等造像記》

“夫冲元虛邃，妙趣理幽，應迹難尋，悟之者罕。是以金田不種，珍粟難收，□不行檀 劫回得白馬還宮者哉？然今諸邑子彌姐顯明□□□□□人等識世非□□□內□□□滅割已珍，採石名山，造四面像一區，和好□明□□罕有。藉此微功，願帝祚永隆，三寶常繼。又願諸邑子等老者延年，少者益壽，男孝女貞，禮義備足，門風痒序，恆脩功德。復及法界倉生，普同斯慶，等成正覺。

開皇二年，歲次壬寅，九月壬寅，朔廿三日甲子訖。

邑主雷惠祖 化主雷金相 香火張顯極 香火彌姐道遵 邑謂彌姐顯佛 唯那彌姐慶昌 唯那張□記 典坐彌姐義昌 邑子彌姐孝□ 邑子彌姐暉熾 齋主楊神義 佛堂主都督彌姐珍 開明主雷貴 邑子彌姐暉祥 邑子彌姐慶暉 邑子彌姐嵩禮 (以上碑記、題名在碑陽)

邑子彌姐相貴 邑子彌姐洪慶 邑子彌姐貴慶 邑子鉗耳暉遠 開明主彌姐后進 邑子彌姐陸□ 邑子雷道暉 邑子彌姐仕祭 邑子彌姐射暉 邑子彌姐景

周 邑子雷仕僧 邑子張小安 邑子張文通 邑子雷道祭 邑子彌姐五虎 邑子彌姐子產 邑子彌姐仕產 (以上題名在碑陰。碑陰原有題名四排,現僅餘二排,餘皆泐患不識)

邑子劉石生 典錄都督雷元儻 邑子楊石養 邑子彌姐子暉 邑子彌姐長儒 邑子彌姐彭儻 邑子雷光超 邑子雷洪慶 邑子雷道勝 邑子雷元熾 邑子彌姐仕貴 邑子彌姐仕遷 邑子雷元亮 開明主彌姐葺貴 邑子雷元榮 邑子供烏口。(以上在碑左側)

像主彌姐儻和 典坐彌姐舍明 邑子雷歡慶 邑子楊莫問 邑子楊神義 邑子彌姐義遠 邑子彌姐琛 邑子彌姐后進 邑子彌姐彭櫛 邑子彌姐嵩業 邑子彌姐長洛 邑子彌姐玉祭 邑子雷雙熾 邑子彌姐子方 邑子雷暉榮 開明主秦顯和 邑子供子述。” (以上在碑右側。題名中彌姐琛、楊神義、彌姐后進皆重見,前見者有佛銜,後見者稱邑子,當係一人)

(十) 《邑主彌姐後德合邑子卅人等造像記》附唐乾封元年改造佛像記

“夫真如大覺,萬行俱備,像法垂風,有緣斯觀。自非口斯憂田,仰尋聖迹者哉。是以鑄金漏(注一)木,以表聖容。然今都像主彌姐後德合邑(注二)卅人等,識世非常,感情內發,迭相勸化,採石名山,造四面像一區。其功以(注三)就,願國祚永隆,三寶常續。

(注一)“漏”爲“鑿”之譌。

(注二)邑下漏一“子”字。

(注三)“以”爲“已”之譌。

又願合邑子等老者延康，少者益壽。愜(注一)及法界倉(注二)生，緣此微因，等成正覺。

開皇六年歲次丙午六月□□朔八日丁亥成。

北面像主雷香香 邑子弥姐阿醜 邑子弥姐神安  
邑子弥姐雲慶 邑子弥姐明貴 邑子弥姐洪暉 邑子  
弥姐煥見 邑子弥姐貴昌 邑子弥姐魯熾 (以上碑記和  
題名在碑陰中段，碑記占一大方，題名兩段，下一段被唐代乾  
封元年的村民磨平，另造碑銘，詳後)

南面像主□□□□□□□□□□□□弥姐祖慶 都像主  
弥姐后惠 邑子雷男姐 □□□□弥姐□遷 像主弥  
姐景和 香火弥姐子暢 (以上在碑陽，分三列，每列題名  
二名)

□□□□□□□都督弥姐顯祭 都維張浮圖磨 邑子弥  
姐栻(注三)惠 邑子弥姐顯周 邑子弥姐興國 (以上在  
西側面。分三列：上、中列各一人，下列三人)

東面像主□□□□ 邑子弥姐阿妃 邑子弥姐僧熾  
邑子弥姐□ 邑子弥姐明達 邑子劉良貴 邑子弥姐  
葺生” (以上在東側面。三列：上列一人，中、下列各三人)

此碑陰面下段被唐代乾封元年(公元 666 年)的村民鬲苟子等磨去原造像人的姓名和刻像，又在上面刻一碑記和題名，原文如下：

“余以真如大覺，萬行具備，佛法有緣，□如斯觀，憂尋聖迹，惟念福田。是以漏石鑄金，出離生死。然今都像主鬲苟子

(注一)“愜”爲“復”之別字。

(注二)“倉”應作“蒼”。

(注三)“栻”當作“栻”，與“拔”同。

合邑子廿五人等識行表蹟，咸發□心，上爲皇帝聖主，下救三塗，共誓此心，願成□德。其□等□已□□粧嚴此像。其功以了。又願合邑子等老者□□，少者延長。復爲蠢□倉生，永除三□，同入法門，□成正覺。

乾封元年歲次景寅正月八日庚辰朔成。（以上碑記在左方）

都□□輕車都尉彌姐□□ 都化主武騎尉武文□議檢□□

大齋主飛騎尉楊師邑主任□□ 香火主武騎尉武威等

事張□□ 像主楊士宗 像主孫玄德 像主康阿難

像主張醜仁 大像主紀□軍 都像主鬲□□ 邑子李

德 邑子雷師緒 邑子雷神帥 邑子元神壽 邑子

任僧奴、男恩九 邑子張玄儉 邑子楊石生 邑子鄧

胡馬 邑子王道政 邑子梁宏士 邑子韓阿果 邑

子房仁表 邑子□□敬 邑子□□□”（以上題名在右

方）

## 附錄二 關於關中羌村羌姓的札記

古今文獻之談關中羌村、羌姓者甚夥，一時無暇編組爲文，茲就觀感所及，略爲摘錄如次。

古詩人之咏羌村者，以杜少陵爲最著。當天寶末年，詩人初徙家屬於奉先縣（今蒲城縣），繼而轉徙白水縣，後又播遷至鄜州。上述州縣自古爲羌村分佈最多的地區，詩人往返其間，不可能不與羌村發生關係而在詩歌中流露出來的。《彭衙行》一詩是他回憶在白水（白水縣古稱彭衙）時受到故人孫宰的款待情狀。內二句云：“小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蘆子關在延州，詩人欲將出關之靈武，此與羌村無關姑不論。而白水縣之同家窪，我想就是同蹄羌居住的村落，漢人孫宰居此村中，正可證明唐時羌漢雜居是很普遍的了。到鄜州後，詩人的家屬寄居在羌村，今鄜州北鄉距城三十里尚有羌村，可能就是詩人家屬所居的村落。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他自鳳翔返鄜州後，有《羌村三首》，敘述與老妻子女悲歡離合之狀，至今尙爲人們所傳誦。所可異者，三首內許多地方是敘述與村鄰往還酬酢之情，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歎歎”；“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爲什麼絲毫沒看出關於羌人的消息呢？杜詩有些篇什對於羌人的衣飾特點是反映很鮮明的，例如《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云：“受詞太白脚，走馬仇池頭；羌父豪豬靴，羌兒青兜裘。”同谷在成州，難道是由於成州一帶的羌人尙留守許多部族特點，關中之羌自中唐以來便多數漢化了嗎？

唐代文人敘述羌姓者亦多，如《王摩詰詩集》中之《送不蒙都護

歸安西詩》，此不蒙氏卽夫蒙氏。又如《元氏長慶集》有“白紵嘯歌黛，同蹄墜舞釵”。原注云：“同蹄樂人名。”實際上同蹄是羌姓，此句乃指同蹄羌婦女之作歌舞者。可知在天寶以後關中羌人的民族風格尙未盡泯，只是不大顯著罷了。最突出的是顏師古注《漢書·趙充國傳》時謂關中羌之姓罕开，云：“而今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爲姓耳。”此姓在東漢時分爲罕、开二姓，直至十六國前秦時尙未合而爲一。至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4年）《聖母寺四面造像銘》，原來的罕开二氏此時已合爲一。唐時顏師古的推論，謂罕开是罕與开合而言之，完全是對的。此外，唐宋人有些著作，如《元和姓纂》、《廣韻》、《姓解》、《通志·氏族略》等對於關中羌姓多少都有些敘述，成爲現代人研究關中部族姓氏的重要文獻。

近世記述關中羌村、羌姓的文獻，主要是陝西的縣志。然近世羌村與古不同。古代的羌村多爲羌姓，村名與姓氏大體上是一致的。近世有的羌村只有其名，而無其姓，村名因此而改變者很多。羌姓不一定住在羌村，姓羌姓的人們已經不自知其原爲羌族，有的且諱言自己的祖先是羌族。從這些現象都可說明，從唐代中葉以後，關中的羌村和羌姓都已經發生變化了。雖然如此，但近代現代關中的縣志上和地圖上仍然有不少的羌村和羌姓。從這些遺迹，我們還可以推測古代羌人在關中分佈的面貌。

羌村是因村里的羌姓而命名的，羌姓的變化自然也就引起了羌村之名的變化。原來單音的羌姓變化較少，例如甕氏只變爲党氏，雷氏和姚氏仍是雷氏和姚氏。複音的羌姓，例如夫蒙、同瑋、荔非、彌姐、罕开、屈男、僂蒙、昨和、鉗耳、地連等等，一般有單音化的傾向。簡言之，卽羌人的複姓多變爲單姓。例如夫蒙氏之爲馬氏或蒙氏，同瑋之爲同氏或周氏，彌姐之爲彌氏，罕开之爲井氏，屈男之爲屈氏，僂蒙之爲蒙氏，昨和之爲和氏，鉗耳之爲王氏……，有的



我們還沒有詳細調查研究過。

現以清代和民國時所修續的陝西省縣志爲主，再參考近年來出版的各種陝西省分縣地圖，試分述各縣的羌村羌姓如次。有的縣志有氏族表，對於羌姓統計很有用處，抄錄於後：

(一)清乾隆《蒲城縣志》、光緒《蒲城縣新志》、《蒲城縣新志·建置志》

東鄉：井家，蒙家，党家莊，党家，党家溝，腰党村，雷家坡，雷家前頭，党家灣，蒙家坡，蒙家新村。

西鄉：屈家老堡，雷家，井家東村，井家西村，雷李堡，雷家南阜，党定李家，党家，雷家，雷坊村，前雷家，後雷家，中雷家，雷家，大雷村，小雷村，雷家，党家。

南鄉：坡底雷家，東家豐井家，西安豐井家，井村張家，井家，党睦鎮，井馮家。

北鄉：屈家，屈家堡，東党前村，東村，党家，罕井鎮，彌家，井家原，井家堡，井家河，井家塔。

《新志·堡寨志》：

南鄉：井家堡。

《新志·市鎮志》：

南鄉：党睦鎮，鉗鉞鎮。

北鄉：六井鎮，罕井鎮。

按蒲城縣自古爲羌村、羌姓分佈最多的地區。党、雷二姓分佈在東西鄉。蒙姓爲夫蒙氏的簡稱，分佈在東鄉。井姓最多，分佈在南北鄉。北鄉並有罕井鎮。“罕井”原爲“罕升”。“升”的古音，漢

代應劭注爲羌肩反(tɕ'ia̯)。後开亦讀 tɕ'i, 與“其”同音。最後則訛爲“井”, 讀“d'ɸin”。關中姓井者很多, 至少有一部分與罕开有關。顏師古注《趙充國傳》, 謂唐代文獻已變开爲井。實則十六國前秦和北朝的碑銘已經變开爲井了。蒲城南鄉有鉗耳鎮, 北鄉有彌家村, 彌家當爲彌姐家之省稱, 二者皆爲西羌著姓。

(二)清順治《白水縣志》、乾隆《重修白水縣志》、《白水縣志·鎮堡志》

雷衙鎮, 縣東北二十里。 雷村鎮, 縣東南三十里。 馮雷鎮, 縣東十五里。

同書《古蹟志》中雷衙亦作“雷牙”, 云: “雷牙, 縣東北三十里, 傳雷祥造器處。”

同書附縣輿圖, 縣東二、三里有鉗耳溝、馮雷莊、雷公墓。縣東北有南井頭, 縣北有北井頭。

《重修白水縣志·建置志》:

(甲)會賓鄉: (1)通遠里, 有雷村鎮, 距城三十里。

(2)文化里, 有小北乾耳, 距城五里; 南乾耳(內一部分屬懷德里); 馮雷莊(內一部分屬寧化、先進兩里)。 (3)侍均里, 有大雷公村, 距城十五里; 扶蒙村(內有屬文化、修義兩里), 距城二十里。 (4)臨川里, 有小雷公, 距城十五里。(以上七羌村在縣城的東面和東南面)

(乙)長寧鄉: (1)寧化里, 有北井頭, 距城五里。 (2)先進里有雷衙鎮, 距城二十里; 北乾耳, 距城二十五里; (3)守信里, 开家窪, 距城十五里。(以上四羌村在縣城的東北面)

(丙)慶雲鄉: (1)歸敬里, 有南井頭; 井兒, 距城二十里。(以上一羌村在縣城的南面)

按白水縣也是羌村，羌姓分佈最多的地區。除大量的雷姓外，有南乾耳、北乾耳、小北乾耳等村，此“乾耳”爲“鉗耳”之異譯無疑。此乾讀如千，與鉗同音，不讀干。又有扶蒙村，即夫蒙村，在縣東二十里。升家窪，升讀如“泝隴”之“泝”，音 tɕ'ia̯，與罕升之“升”同音。村名仍保存古音升爲“羌肩反”的遺音。除升家窪之外，尚有南井、北井、井兒諸村，疑與罕升皆有關。

### (三) 民國《澄城縣志》

《澄城縣志·建置志》云縣南有雷莊鎮、党家巷。縣志附載《里村莊道路》：

- (1) 陽城里：趙党原， 党家河， 雷家窩。
- (2) 通賢里：白家雷莊， 劉家雷莊， 索家雷莊， 雷張家雷莊。
- (3) 新其里：党家原，在縣南十五里。
- (4) 伏龍里：南社党家村，在城東南二十五里； 雷家河，在城東南三十里； 雷家圪塆，在城東南四十里。
- (5) 遵教里：和家樓，在城東南四十里； 雷家溝，在城南五十里。
- (6) 寺前里：党家莊，在城南四十里； 南党前村， 南党後村，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 (7) 玉善里：雷家河，在城西北七十里。
- (8) 武定里：北雷村。
- (9) 太慶里：雷家河， 雷家窩， 雷家莊，在城東北三十五里。

按澄城縣北朝時爲李潤羌故地，羌姓繁多，自不待言。但近世縣志所載，羌村只雷、党、和諸姓，可知古今變化很大了。許多原來

是雷姓的村落，近世變爲白家雷村、劉家雷村、索家雷村、雷張家雷村等等，可知其變化之一般。

#### (四)明萬曆《邵陽縣志》、清順治《邵陽縣志》

縣志輿圖繪載：縣城東有東蒙寨；縣城西南有和家莊、北党村；縣城西北有甘井鎮。

按東蒙寨當爲夫蒙羌村落。甘井鎮當卽罕开鎮。古代“甘”與“罕”同音，故甘井卽是罕开。

順治《邵陽縣志》有北伏蒙、南伏蒙、東伏蒙，俱在縣東境。

按“伏蒙”卽不蒙或夫蒙之異譯。北、東、南三伏蒙村，當卽萬曆志中之東蒙鎮所屬各村莊也。相互對照，夫蒙改爲蒙氏之說益爲可信。

#### (五)民國《大荔新志·建置志》

- (1)洛西鄉：雷寨舊名雷村。
- (2)埧洛鄉：雷寨村舊名雷家寨。
- (3)賀鍵鄉：党石村。
- (4)漢鏞鄉：党客村。
- (5)衛翼鄉：北党， 北党灣， 雷家。

#### (六)清順治《洛川縣志》、民國《洛川縣志》

順治《洛川縣志》：

同蹄鋪在縣東北。志云：其郵傳，西河鋪通同蹄鋪。

按今《陝西省行政區劃圖》，銅蹄作“桐堤”，其音同而字異。

民國《洛川縣志》附各鄉輿圖：

- (1)自治鄉分圖，有屈家溝， 屈家峁， 後屈家河。

(2)和平鄉分圖，有党家原， 雷家岌， 上桐地， 下桐地。

(3)大同鄉分圖，有東井村， 荆雷村， 侯井村。

#### 《行政區劃》

集成里有進蒙鎮。

按上下桐地，即上下桐堤，亦即上下同蹄，在北鄉，都是古代的羌村和羌姓。“進蒙”疑為“僂蒙”之訛。“僂”原作“僂”，《集韻》云，同“俊”。後簡化為“僂”。“進”(tçian)音與“僂”(tçiun)略同，故《洛川縣志》把“僂蒙”訛為“進蒙”。

#### (七)清道光《重修鄜州志》

《鄜州志》列鄉村里距：

(1)西南鄉：雷金村，距城三十五里； 党亥，距城五十里； 彌家川，距城六十里； 雷家原，距城七十里。

(2)西鄉：姚家原，距城二十里； 屈家溝，距城一百五十里。

(3)西北鄉：鉗兒，距城二十五里。

(4)北鄉：同家咀，距城三十里； 羌村，距城三十里。

(5)東北鄉：折家塄，距城四十里； 党家莊，距城五十里； 屈家灣，距城七十里。

按州志彌家川，彌家即彌姐家省稱。 鉗兒即鉗耳之音變。同家咀，即同瑀家之村落。 折家塄中之折家頗堪注意。《元和姓纂》與《氏族略》皆以莫折氏為關西複姓。北魏秦州羌帥莫折念生據城反魏。折氏疑是莫折氏的簡改。縣北三十里之羌村，可能就是唐代詩人杜甫在鄜州時所居之羌村。

**(八) 民國《黃陵縣志》**

《建置志》有二羌村：

(1) 橋山鎮有党家溝。

(2) 太賢鎮有阿覺村。

《戶口志》附氏族：

(1) 白姓八十八戶； (2) 党姓四十六戶； (3) 雷姓四十五戶； (4) 屈姓八戶； (5) 周姓二十三戶。

**(九) 民國《宜君縣志》**

《城堡》，雷原鎮在縣城東南九十里。

**(一〇) 民國《同官縣志》**

《建置沿革志》：

(1) 中山鎮(城關及近郊)有北雷、南雷。

(2) 黃堡鎮(南鄉)有阿党河。

(3) 文明鄉(西鄉)有党家原。

(4) 紅土鎮(東鄉)有党家塄、党家塔。

(5) 陳爐鎮(東南鄉)有雷家坡。

(6) 金鎮鎮(東南鄉)有雷家溝。

《氏族表》：

(1) 井姓六人；紅土鎮五人，金鎮鎮一人。

(2) 同姓四十人：中山鎮十六人，石柱鎮十五人，陳爐鎮四人，金鎮鎮五人。

(3) 和姓一百八十八人，在陳爐安愈村(即干峪)、南窪里、羅寨等村。

(4) 屈姓十八人：中山鎮四人，黃堡鎮十人，紅土鎮四人。

(5)党姓六百九十人：中山鎮六十六人，文明鄉八十五人，黃堡鎮二百三十七人，紅土鎮二百七十六人，金鎮鎮二十六人。

(6)雷姓二百六十六人：中山鎮二十五人，文明鄉十四人，石柱鎮一百零八人，黃堡鎮三十五人，陳爐鎮十人，紅土鎮四十三人，金鎮鎮三十一人。

(7)周姓二百二十五人：中山鎮三十九人，文明鄉十九人，石柱鎮十五人，黃堡鎮三人，陳爐鎮十人，紅土鎮一百三十人，金鎮鎮十四人。（按總數為二百三十人）。

按《新舊唐書·孝友傳》，同官同歸氏亦作周氏，故志中周姓亦採入計算之中。

#### (一一)清乾隆《續耀州志》

南鄉開家坡，有四十九戶。

#### (一二)清乾隆《富平縣志》

(1)東鄉：呂党村。

(2)北鄉：雷古鎮。

(3)西鄉：党家堡，雷家堡。

(4)東北鄉：党家堡，党堡，東井、西井堡，党東堡，油党堡，党堡，党北堡，西党堡，東党堡，北党堡，南党堡，雷北坊，党家山。

#### (一三)清康熙《三原縣志》、光緒《三原新志》

《建置志》內有雷家巷，在東門內北渠之南。又有雷官里，在縣城東三十里。

《三原新志》附縣輿圖，縣城東鄉有圪塔雷，東南有雷遜三堡。

又東鄉河北岸有雷家。縣東北角有雷家溝、党家溝。

總之，從上述十三縣的十八種縣志之資料可以看到古代近代渭北各縣的羌村是很多的。羌族的姓氏，由上述資料所提示的，有雷氏和党氏，占最多數。其次，有鉗耳氏、夫蒙氏、罕井氏、僂蒙氏、同蹄氏、屈氏、和氏、彌氏、折氏、同氏、周氏、姚氏、蒙氏、井氏等等。同氏和周氏是從同蹄氏演變而來的。井氏出自罕开氏，蒙氏出自夫蒙氏。此外，屈氏為屈男氏的省稱，和氏為昨和氏的省稱，折氏為莫折氏的省稱，在《關中部族》中大體都已論述。近世羌姓諸族皆已漢化，羌村已成為歷史上的遺跡，故明、清縣志及一般輿圖皆不加考察，順便以一、二同音字代之。例如夫蒙氏，《郃陽縣志》稱為“伏蒙”，《重修白水縣志》稱為“扶蒙”。鉗耳氏，《重修白水縣志》稱為“乾耳”，《重修鄭州志》稱為“鉗兒”，《蒲城縣新志》稱為“鉗鉗”。罕开氏，《蒲城縣志》稱為“罕井”、“井氏”，《重修白水縣志》稱為“开家”，萬曆《郃陽縣志》稱為“甘井”，《續耀州志》稱為“开家”。同蹄氏，《同官縣志》稱為周氏，民國《洛川縣志》稱為“桐地”，《重修鄭州志》稱為“同家”，今陝西行政圖稱為“桐堤”。僂蒙氏，民國《洛川縣志》稱為“進蒙”。這種演變可能越來越多，直至原來的名稱消滅為止。

從羌村名稱的分佈言，党、雷二姓的村名主要集中在洛水中游的東西兩岸。罕开氏多在蒲城的南北和白水縣的東部。夫蒙氏多在蒲城、白水、郃陽三縣。鉗耳氏多在白水、蒲城、鄭州。同蹄氏多在銅官、白水、洛川和鄭州。它如僂蒙氏之在洛川，折家之在鄭州，彌家之在蒲城、鄭州，屈家之在蒲城、黃陵、銅川，和家之在澄城、銅川，都有一定的歷史根據，可用以推測古代羌姓在關中的分佈狀態。



## 校後補記

原稿是在 1963 年初夏寫成的。由於從前不曾到過耀縣，所以對稿中應屬於耀縣的九個碑銘，只作了一般的推測，而不能確指它們在何縣何村。1965 年 7 月，我從延安參觀回來，到耀縣參觀了文化館，始知《夫蒙文慶造像銘》、《雷樹等五十人造像銘》、《雋蒙顯達造像銘》、《雷文伯造像銘》、《同瑋龍歡等造像記》、《雷明香造像記》、《郭羗造像記》、《雷惠祖等造像記》、《弥姐後德等造像記》九碑都在館內的東西走廊。此外，碑廊內還有西魏大統元年（公元 535 年）的《毛遐及邑子二十八人造像記》、大統四年（公元 538 年）的《邑子雷并州等造像記》、北周保定五年（公元 565 年）的《比丘僧和識達造像記》，以上三碑皆與少數部族造像有關，應該補入原稿之內。

在參觀前後，訪問了縣裏七十多歲的宋仁三先生，並讀了從前人的某些著述和紀錄，於是對各碑的所在地有了進一步的理解。《雷文伯造像銘》、《雷明香造像記》、《雷惠祖等造像記》、《弥姐後德等造像記》四碑，是 1927 年本縣土豪軍人雷天一（吼）派兵在各處搜羅而來的，原來在什麼村落，皆不可考。後來他又派人在各處搜集，在 1934 年搜到的，有《夫蒙文慶造像銘》，是在坡底村搜到的；《同瑋龍歡等造像記》，碑石在文正書院，本院在塔坡，是聖德寺的遺址，碑石可能是該寺的舊物；《雋蒙顯達造像銘》，是從縣城東南漆河的沙灘上運來的。以後又繼續搜羅，計在 1935 年從雷家崖移回《郭羗造像記》，在 1940 年從沮河沙灘移回《毛遐等造像記》。原來沮河在縣城的西郊，漆河在縣城的東郊，每當山洪暴發時，兩河沿岸的建築物為暴洪衝擊，損失甚大，碑銘造像隨洪流而下，最

後多淺濶在城南兩河匯流的沙灘之上。其中有些碑石原在兩河沿岸的廟宇中的，有些碑石則豎立於村落附近的大路旁邊。關於後者，如《儁蒙顯達造像銘》，原在漆河上游的“大路顯敞之處”；《毛遐等造像記》則原在沮河上游的大路旁，如碑記所云“立在迪衢”是也。至於兩碑在兩河的哪一段落和河之東西，就無法知道了。

這裏附帶說明一下北朝關中民間造像開始於何時的問題。寫稿時我採用《關中金石志》之說，以為關中民間造像始於北魏太和十二年（公元 488 年）的《大代暉福寺碑》。自從在耀縣參觀以後，便知從前的論斷錯了。耀縣文化館現存始光元年（公元 424 年）的《魏文朗等造像銘》，早於《大代暉福寺碑》六十四年，且在魏太武滅佛運動以前，這是目前所知北魏民間造像最早的一石了。其次，近年興平縣出土的皇興五年（公元 471 年）造像碑，現陳列於陝西省博物館，亦比《大代暉福寺碑》早十七年。由此一端，可知個人對事物的認識是很有限的，不只對未發掘的東西認識不到，就是已經擺在面前的東西也還認識不夠。補記於此，以贖前愆。

1965 年 7 月 6 日補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5

作者=

页数=1000

SS号=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